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

[日] 矢代梓 著
叶婷 译

学林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 /(日)矢代梓著;叶娉译.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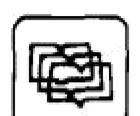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730-742-6

Ⅰ.二… Ⅱ.①矢… ②叶… Ⅲ.思想史-世界-20世纪-年表 Ⅳ.B15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059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8-089 号

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



作　　者——(日)矢代梓
译　　者——叶　娉
责任编辑——叶　刚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6.5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0-742-6/B·41
定　　价——2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二十世纪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世纪，也是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期。本书以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的重大活动、重要作品为线索，通过对蕴藏于历史表层下之具体事实的发掘和描写，在不大的篇幅中完整地勾画出二十世纪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清晰脉络。

本书的特点，一是善于捕捉历史事件的细节，二是善于从事实的联系中自然地引导出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基于这两个特点，本书可以说是一部二十世纪思想史的入门书，又兼有工具书的功用，值得向广大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的学习者、研究者推荐。

本书入选日本著名的讲谈社学术文库。

本书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授权学林出版社，
在中国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DG

作者简介

矢代梓，日本著名的西方思想史学者。本名笠井雅洋，1945 年生。毕业于横浜市立大学文理学院，专攻近现代德国社会思想史。毕业后进入中央公论出版社，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编辑。矢代梓在致力于编辑工作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专业研究，在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及艺术史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著有《现代思想的源流》、《近代德国精神史》、《启蒙的反讽——围绕哈贝马斯的论争史》等，均具一流学术水准。1999 年 3 月，因患癌症不幸去世，终年 54 岁。

译者简介

叶娉，1997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1997 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2006 年获得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主要译作有《航海王》等。

出 品 人：曹维劲
策划编辑：叶 刚
装帧设计：周剑峰
学林出版社

PDG

《Nenpyou de Yomu Nijyuu-seiki Shisoushi》
© Kasai Ichiko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目　录

前　　言

笠井《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的妙趣所在

今村仁司

笠井雅洋（矢代梓）所著的《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乍读之下读者也许会觉得，此书无非是将一些枯燥的事实进行了简单的罗列而已。有人甚至可能感到不满：这不过就是在普通的编年体年表中穿插了文化事件以及人物罢了。当我们对于历史上曾发生的鲜活、真实的往事缺乏充满知性的关心时，产生如此印象也不足为奇。然而如果我们能够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去阅读这些看似乏味枯燥的事实的罗列，我们将会恍然发现这份年表所蕴涵的无穷趣味，进而对于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亦能心领神会。我认为，这份年表中其实蕴藉着重要的内涵。据我推测，笠井雅洋君是希望通过"提示事实"这种形式，向读者传递一种关于如何认识过去的事实的独特方法。以此推测为依据，在下文中我将尝试进一步探求作者的写作意图。

1 对于细节的关注

作为文化专栏的专栏作家

现在，我面对着笠井君的《年表》，不由得怀念起他生前的一言一行。我希望能够尽我所知地描绘出他的形象，以此追悼逝去的笠井。我认为，笠井所著的《年表》正折射出他的人格与品质。

当我看着这部年表，似乎能直接感受到笠井本人。如果仅就表象而言，读者的最初印象也许是："他竟然知道这么多零散琐碎的东西啊！"在很久之前，我就曾经和笠井进行过无数次的谈论、闲聊，从他那儿，我了解了许多从未知晓的事实。他也曾告知我过一些重要的书籍，那些书籍并不仅仅是日语书籍（包括日本人所著的书籍以及翻译书籍），还包括了英语、法语，尤其是德语的原版书籍。在某些方面他的确堪称无所不知。

我曾经有幸去笠井府上拜访，他带我参观了他的藏书室。那真是一个浩瀚的书籍的海洋。藏书室里摆满了海内外的各种书籍，足有我所藏书籍的数倍以上。正是这些汗牛充栋的书籍造就了他的通晓古今与博学多识。而那绝非是一些陈旧过时的知识。最初我也曾诧异，一个忙于出版社编辑工作的人为何如此致力于书籍的收集以及知识的吸收呢，那恐怕是出于对书籍的热爱吧。但是，我渐渐理解了，并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在他身上有着与"书痴"截然不同的某种特质。在此我想记录下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所逐渐了解的情况，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我个人的某些揣测。

笠井著有一本名为 *feuilleton critique*（批评专栏）的书。书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 feuilleton 指的是西欧报纸上的文化专栏，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化专栏本身，而是负责撰写此栏目的人所持的态度以及特征。撰写文化专栏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专栏作家，以前似乎类似于连载小说的作家，但渐渐的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肩负起了足智多谋的文化批评家的角色。有一个时期笠井君也曾立志要成为一名文化专栏作家。他的这种意愿，在他的这本书的书名中亦有迹可寻。那一时期，笠井君常将文化专栏这个词挂在嘴上。作为一名身负批评家重任的文化专栏作家，仅有聪明才智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具备高度的知性以及渊博的知识，同时对人性有着深刻的了解，与日本报纸的专栏作家性质迥异，我记得笠井君曾反复地强调过这一点。他当时好像曾将某位西欧的作家视为榜样，现在我已记不清那位作家究竟是谁了，真是让我感到遗憾。

我一边写着这篇文章，一边极力地回想已袅袅远去、朦胧不清的记忆深处与笠井之间曾有的对话，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依然记得的是一个他经常以充满尊敬与向往的口吻念叨的名字，那就是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现在我只能猜想，笠井君心中的偶像恐怕正是这位瓦尔堡。笠井君那种对于细微事实的关心、竭力探索那些不为人知的事件或人物、努力从精神上深入事物的内部等研究方法，与瓦尔堡的作风可谓一脉相承。瓦尔堡的座右铭——“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也正是对笠井努力探求事实真相的行为所作的最好诠释。的确，我曾无数次从他口中听到过这句话。顺便提一下，将瓦尔堡的重要性告知笠井君的好像是林达夫先生。我

觉得,在林氏的精神中,存在着和笠井君的精神的某些共鸣之处。

因此,从外部观察笠井所做的工作,你会发现他的思想是专注于上帝所栖息的细节之中的。所谓上帝意味着真实,意味着存在于事实、事件或人物中,存在于事物联系性之中的作为事实真髓的真实。通过对事物的分析追踪,希望将犹如伊壁鸠鲁(Epicurus)的灵魂一般隐藏在事物及其联系性之中的真实大白于天下,这正体现了细节探求者的真正价值,对于其本人而言,这种探求无疑是一种充满知性的妙趣。

勇猛的细节探求者

身为具有批评精神的文化专栏作家或者作为一位细节探求者的笠井君,对某位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理所当然抱有关心与兴趣,然而与此同时,他对于往往会从普通的观察中遗漏的细节——诸如人物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乃至人与事件的相遇方式等,产生同等程度甚至是更热切的关心与兴趣。我认为他藏书的真正动机,与其说是收集自己喜爱的书籍(当然也包含此因素),不如说是将其作为工具,希望在证据充分的前提下彻底查明一个人思想形成的背景或者思想与社会背景(从人际交往的意义出发)之间的关系。一旦开始这样的研究,那么汗牛充栋般的多种多样的图书,简直是一种宿命般的必然。而且,在我参观了他家书库之后,他的图书数量必定又呈几何倍数增加。仅仅凭借好奇心,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点的。他的藏书行为显现了一种由知性的理念所支持、堪称勇猛的探求精神,正是出于此种精神,笠井才孜孜不倦地在书籍中进行探索,并发掘蕴涵在事实之中的

精神结晶。

从某种观点来看，笠井似乎是好奇心的化身。但是他身上蕴藏着某种超越了好奇心、超越了理性的特质。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那究竟是什么呢？

或许可以说那是一种勇于深入事物内部进行探索的精神吧。对于普通人而言，事物也好事件也罢，听过看过后便会转瞬忘却。总之，那只不过是些生活的布景而已、是些不过如此的东西。然而，对于细节探求者来说，事件以及事物或者是过去的人际关系等等，绝对不是“不过如此的东西”。可以说这些都是被注入了神秘的气息，换而言之，都是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对于笠井而言，不存在着任何消亡了的事物与事件，一切的事物、事件、人物及其所有的关联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无论相隔多么遥远的时代或地域的事物、事件，在他看来都鲜活地存在于眼前，它们作为一种有灵魂的存在正在向他娓娓倾诉。

笠井的精神内涵恐怕正在于此吧。他是一个大声讲述的人。即便面对近在咫尺的人，他也会将其视为与自己远远离开的对象，大声地与其对话（他的声音实在是令人有震耳欲聋之感，我经常被他的大声震得双耳疼痛。顺便说一下，从骨相学上来说，笠井君的嘴巴是咀嚼能力强大的大嘴，正是它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当他从本职工作中解放出来、拥有享受孤独的时间之后，他会选择把自己关闭在只身一人的室内，欣然面对书籍这个伴侣，并与蕴藏其间的、活生生出现在眼前的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与事物对话，那时想必他也会不由自主地提高声量。即便是正在默读书籍，在一片静默中，他也一定会发出洪亮的声音。这响亮的声音将会唤醒沉睡在书籍中

的、那些属于过去但却有着鲜活生命的东西，至少笠井相信这声音拥有神奇的力量。

笠井用自己的声音飞越了时间与空间，在浩瀚无垠的时空中任凭自己的精神自由翱翔。只要阅读他的《年表》的任意章节，你就能明白这一点。每当他说起柏林、巴黎、维也纳，都犹如身临其境，而且那不仅仅是对事物的外部观察而已，当他说起生活在西欧某个城市中的，比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普鲁斯特(Proust Josep hlouis)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宛如与他们相交甚笃。至少，在他"隐秘的精神"领域中，那些属于过去岁月的人物都与他成为同一时代的人。

白天，他是一名出版社的编辑，夜晚，在充满幻想色彩的私人图书馆中，他却成为一个与过去展开梦幻般交流的对话者。在我的想象中，笠井就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若非如此，便无法理解他对于过去那种永无止境、全身心投入的研究究竟是出自何种原因。在夜晚幻想的空间，笠井化身为布拉格的卡夫卡(Franz Kafka)、巴黎的本雅明、维也纳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每一个瞬间对他而言都是至大的幸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幸福人生吧。

这是凭借想象力构建起来的又一个人生。能够驱使这种想象力的绝对不是成人，而是最美好意义上的"孩子"，把童话世界当作现实并生活在其中。在童话世界中游乐的孩子，这大概就是笠井君的另一个侧面吧。笠井的《年表》正是这种精神世界而产生的一个童话。

在十字路口玩耍的孩子

“孩子”的感受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对此能够稍有理解，我想不妨引用柏林的本雅明的话加以说明，同笠井一样，他也是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孩子”。

“不加修饰的、充满噪声的柏林，劳动的城市、商业的首都柏林，不逊色于其他都市，甚至超过其他都市的是，这个城市中有无数的场所与瞬间证明着死者的存在，同时利用死者弥补了自身的完整性。面对这样的场所与瞬间所产生的朦朦胧胧的感觉，比起其他事物来，更具有一种性质，它在幼年时代的回忆中，如同被遗忘了一半的梦境，虽然难以掌握，却同时充满了诱惑，令人倍感痛苦压抑。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幼年时代，即便面对着生命也无法掌控。当孩子面对着向生者的世界引颈张望的死者的国度时，就如同他面对生命本身一样，显示出一股装模作样的亲近（当然是一种不亚于它的、谨慎的）态度。”（本雅明《柏林年代记》）

所谓细节探求者的精神，正是本雅明文中的“孩子”所具备的精神。已经身处成人世界的人要成为这样的孩子，需要经过知性的训练。仅仅依靠想象上的精神所作的空间、时间的移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成人仅凭如此就能成为“孩子”，那只有在神话中才能实现。所谓的知性训练，指的是利用自身的才智磨炼提升知性，将视线的位置下降到孩子的视线。这绝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实现这个目标相当的困难。因为成人无论怎么看都无法恢复到孩子的视线的位置，这是成年人的宿命。但是，对于细节探求者来说，如果无法获得孩子的视线，那就难以展开研究工作。日复一日的训练至关重要，依靠这样的训练才能够逐渐地、艰难地、一点一点地接

近已经远远消逝的孩子的视线。对笠井君而言这种训练意味着在孤独的私人书库中每日与书籍相伴，也许他认为这是一种最切实可靠的训练方法。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的《年表》中。

前文中我提到了本雅明的名字，可以顺便提及的是，细节探求者自身必须要彻底成为拱廊街(passages)。所谓拱廊街不仅意味着接近事物以及人物的通道，还包括那些无数的小巷交集汇聚而成的十字路口以及岔路口。道路纵横交错，但就在这纵横交错的道路之中，常常隐藏着一条难以辨明的、无法称得上是路的通道，这正是细节探求者所追寻的道路，如同隐藏在被一文不值的破烂所覆盖着的贵重的结晶体。正是在这错综复杂的交叉路中潜藏着值得人们探求的宝贵细节、上帝栖息其中的细节。总而言之，道路越是多，发现上帝所栖息的细节的可能性就越高。

而笠井的《年表》正是力图探求这条通道。

2 隐藏的通道

等待解释的空白

粗略地浏览笠井的《年表》，看起来似乎是将琐碎的事实进行杂乱的罗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有如此这般的事实、存在着如此这般的人物，书中所写的内容仅此而已。没有任何针对事实以及人物相互关系的说明。所谓年表就是这样，附上了解释说明反而显得奇怪，找出其中关联的应该是读者。

至于作者自身，无需赘言，他在记录事实的同时头脑中一

PDG

定有着某些清晰的关联。作者将这些关联留在了书籍的空白处。作者虽然选择了沉默,但是其隐藏的意图以及构想,可以说清楚地体现在了字里行间乃至余白之中。因此,笠井的《年表》是由铅字以及空白构成的。空白也是内容的一部分,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必须解释这些空白。普通的年表仅仅是按照年代一一提示客观事实。但是,笠井的《年表》远非如此。它虽然采取了客观提示的形式,但却在沉默中揭示出"主观意图"。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主观的"年表。我认为这正是显示出了笠井《年表》的独树一帜的特点。

可以说,作者是将一种暗示隐藏在事实之中。阅读这部年表的人就如同在进行一次探宝之旅,或者是在参加一场由笠井精心设置的猜谜游戏。我们一边仔细阅读作者笠井君排列出的单调的事实,一边探索隐藏在各个事实中的联系性。

"马克思与瓦格纳之后"的二十世纪

让我们随意地举出若干例子,尝试着进行解读。

笠井的《年表》以 1883 年马克思与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去世拉开序幕,以 1995 年德勒兹、列维纳斯(Emmanual Levinas)辞世为终结。自死亡开始又以死亡结束,可能只是希望达到首尾呼应的效果,但是也许其中另有玄机。请允许我大胆揣测,可能作者想要暗示:一个时代在十九世纪末期拉上了帷幕,而我们却进入了思想上的现代,但是这一现代思想在二十世纪的末期也面临终结。

事实上,马克思与瓦格纳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消亡。以黑格尔哲学为开端的十九世纪的思想,经历了黑格尔左派

运动及其解体、从各种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理念发展到现实的实验、工人运动的高涨、西欧各国的革命以及改革的尝试等等，与其说它是一种学者式的理论，不如说它是以化身为现实的理论形式不断发展着的思想。另一方面，发源于启蒙主义和浪漫派的艺术思想以及运动，虽然在瓦格纳身上呈现出一种较为个人的偏颇和倾向，但不可否认也达到了顶峰。瓦格纳可谓这一时代总体的缩影，同时也是一条通往下一个时代的路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某种马克思的后代”以及“某种瓦格纳的后代”的时代。

既然如此，笠井的《年表》之所以自 1883 年开始，也就具备了充分的理由，而并非是出自随意的安排。作者通过事实的提示，暗示一种对历史的看法。假设年表是从 1900 年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理论学研究》开始的，诚然，这也是一个有充分理由的开始方法，但是这样一来将会遗漏相当多的历史事件。而这部年表也很有可能沦为一部狭义上的哲学思想年表。据我推测作者努力地希望回避这种危险性。

“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之后的着眼点

在我看来，笠井的《年表》是通过了两种方法将事物间的联系进行了排列。第一种方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与事实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时代洪流的深处事实却间接地联结在一起。另一种是事实与人物的直接关联，特别是人物的直接的、相互的关联。前者是一种提示方法，读者必须利用历史知识进行二次组织；而后一种方法读起来往往非常生动有趣，令读者感觉受益匪浅。前面我所举出的马克思的死以及瓦格纳的死就属于这种虽然两者毫无关系、但通过时代这一媒介却

发生了相互关联的提示方法。关于后者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做说明的呢？让我们任意举出一例，稍稍加以考察吧。

例如，我们可以选出1933年的条目来进行解说。

这一年突发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希特勒政权的成立等），对于文化以及思想而言，也是值得注目的一年。地点巴黎，高等研究院中，亚历山大·科耶夫关于黑格尔的讲义开始了。此时此地，科耶夫的经历与业绩并非关键所在。而聚集在他课堂上的人物群体才真正令人觉得颇有趣味。科耶夫是一个从俄国流亡至巴黎的留学生，按照制度，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具备授课资格的，但他又是怎样站上讲台的呢？那是由于同为俄国人的知名哲学史家亚历山大·科亚雷（Alexandre Koyre）的恳请（为了令人际关系变得更为有趣，我添加了笠井君未曾触及的事实：据说科亚雷与科耶夫在俄国时就相识，但是两人并非普通的友人关系，科耶夫与科亚雷的侄女订有婚约，因此为了调查科耶夫的人品身世等，科亚雷代替其侄女与科耶夫进行了会面，两人由此结识。科亚雷与科耶夫见面后立即就说：我那平庸的侄女怎么瞧都无法配得上这样的天才。随后科亚雷解除了他俩的婚约才得以实现的。

由于科亚雷必须前往美国出差，因此拜托科耶夫代替自己讲授“宗教哲学”的课程。也许是因为课程的内容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课堂上聚集了众多日后声名显赫的人物。笠井的《年表》仅仅举出了其中极为有限的一部分名字，即便如此也能充分显示出这堂课的历史意义。战后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几乎齐集一堂（萨特除外——萨特没有出席），拉康（Jacques Marie Emile-Lacan）、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德桑蒂(Jean-Toussaint Desanti)、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科宾(Henry Corbin)、费萨尔神父(Gaston Fessard)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学生名单上有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以及冈本太郎的名字,但不知道这两人是否真的出席了)。

战后的法国,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浸淫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论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然而实际上,这个名叫科耶夫的人的存在(除了讲义与著书之外,他特异的人格使其具有超凡魅力)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法国人从科耶夫那里了解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虽然从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uhl)开始,一直到让·华尔(Jean Wahl)以及科亚雷对黑格尔的研究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科耶夫独特的思想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巴塔耶与拉康的哲学如果离开了科耶夫的思想基础就根本无法成立(两人都承认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出发,科耶夫从 1933 年开始到 1939 年结束的关于黑格尔的讲义堪称活跃在现代法国、尤其是战后法国的独创思想的诞生源泉。换言之,战后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如巴塔耶、拉康,或者大学者丹纳、德桑蒂,此外还有科耶夫讲义结束之后的一代,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无一不深受其影响。他的讲义与其说是论述黑格尔自身的哲学,不如说是讲述如何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解放出来、如何创建与其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毫无疑问这是一门充满了斗争历史的讲义。因此,作为 1933 年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及人物,笠井的《年表》举出了科耶夫讲义

的开始以及听课者的姓名，不仅仅是一种极为正确的处理方式，而且也证明了作者独具慧眼。

巴黎的擦肩而过——被隐藏的历史联系

关于人际关系的有趣之处以及人与人如何阴错阳差地擦肩而过，我们可以试举出以下事件。

阅读 1937 年的条目，你会发现这一年的年末，在巴黎盖-吕萨克大街上一家书店里，召开了"社会学研究会"(Collège de Sociologie)的第一次集会。这个研究会是由巴塔耶、莱里斯(Michel Leiris)、凯洛依斯(Roger Caillois)、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等人组织的。他们在这一时期使战后业已开花的思想进一步结出果实，并且通过相互之间的接触或者发表各自的意见，令这种思想的果实加速发展。这也是在考察现代法国思想时无法忽视的一幕。但是，令人觉得有意思的是，由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而不得不流亡的德国知识分子也出现在这个研究会上。不久之后出现了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团体，而这些出席集会的德国知识分子正是创建此团体的主要成员。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是其中的两位，之后本雅明也参加了这个学派。据说事实上是本雅明先来到巴黎并与研究会的成员们接触交往的，经由本雅明的介绍，霍克海默与阿多諾才出席了此次聚会。两个团体虽然会过面，但是也许由于政治状况的不稳定，最终无法达成深入的相互交流与沟通。本雅明在巴黎生活的时间最长，并与巴塔耶有着长时间的交往，但是无论是从巴塔耶一方来看还是从本雅明一方来看，似乎都缺乏一种相互触动的效果。虽然如此，由于两

人平时依然维持着友好关系，因此留下了不少趣闻逸事，例如，巴塔耶曾替本雅明保管贵重的手稿（《巴黎拱廊街论》的一部分），并将其保存于国立图书馆。

德国与法国的这两大思想集团对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西欧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们就如此地碰面了，应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偶遇。但是另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这次邂逅在历史上几乎无迹可寻。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每一个都是巨匠级别的人物，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反而变得难以实现。可以说这是发生在巴黎的历史上最大的“擦肩而过”事件。

以上，我尝试着拾取笠井《年表》中某些意味深长的事实加以简单的解释，不知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笠井君的意图，是否在他堆砌的事实中真的发掘出了“宝物”。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部《年表》之中的确存在着他所埋下的“被隐藏的联系性”，这一事实即便是通过上述简单的考察亦可一目了然。

笠井的《年表》无疑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性质，读者可以通过如上我所尝试的方法或者其他别的方法进行解读，凭借每个人的能力挖掘出、引导出某些东西，读者与作者之间一边进行知性的互动，一边体会阅读的乐趣。这部年表是一部充满“思想性”的年表，作者所留下的空白由读者一一填补，从而使其更加完整。

3 现在的思想状况

生者从生死簿中开启了什么

笠井的《年表》附于书籍的附录中（《现代思想的冒险者

们》系列第01卷《现代思想的源流》)，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有页数的制约。每个年度所发生的事件以及人物关系，也有许多没有列入年表之中。最后几年的记录内容相对较少，也许就是由于页数的限制吧。作者也曾考虑加以补充，使这部年表更加完善。然而突如其来的病魔将这种可能性永远地夺走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作者完成这份补充工作。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希望能够作出一些略微的补足。

笠井《年表》的后半部分好像是一连串思想家的死亡记录。有名的思想家接二连三地去世，如同巨星一颗颗地陨落，曾经闪耀炫目的光芒一点又一点地熄灭。这暗示着一个时代即将终结，作者也许是抱有这样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思想年表犹如一本生死簿，在一个侧面表达了一种充满追悼怀念的记录。

代表着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家就这样一一辞世，而活着的人们回顾他们的足迹，开始思考这些思想家原本的目标究竟何在。现在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因此，法国陆续出现了众多的传记以及评传。例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传记、阿尔都塞的传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传记(关于福柯，不仅法国，海外也陆续出版了许多传记)、拉康的传记、巴塔耶的传记、科耶夫的传记等等。想必不久之后列维纳斯的传记以及德勒兹的传记也将面世。每一本都各有自己的长所。也有些人在自己有生之年预先写好了自己的传记，其中包括阿尔都塞的自传、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回忆录(对谈形式)、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回想录》。在德国此类书籍也层出不穷，英美等国亦然。现在，是一个回顾的时期。

PDG

暴力与死亡的世纪所遗留下的问题

然而，这其中存在着众多仅凭回顾无法解决的紧要问题，那就是人类的伦理问题。作为思想的主题，是一种正义问题。正义可分为法律哲学意义上的正义问题以及论理学意义上的正义问题，而同时这两者又有若干交集。目前在欧洲，很多学者同时提出了这两种正义问题，围绕它们展开讨论。在法律哲学方面进行正义论革新的是美国的罗尔斯，围绕着罗尔斯，法律学者、社会哲学者以及伦理学者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至于伦理学意义上的正义问题，法国的列维纳斯以及德国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阿佩尔(Karl-Otto Apel)正致力于赋予正义与责任的理论以全新的时代意义。德里达对于列维纳斯的正义与责任的伦理学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批判性的接受，他将视线进一步转移到法律权利、正义以及责任伦理方面。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讨论"伦理学虽然在许多方面与罗尔斯的理论重叠，但作为新的民主主义理论正在日益发展。

这些并非单单是思想上的论点向实践哲学的转向，而是社会以及历史的现实要求如此。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但同时也意味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暴力并充斥着暴力死亡(非正常死亡)的时代。二十世纪与以前的世纪相同，或者可以说由于杀戮技术的高度发展，这个世纪的人们较之以前任何一个世纪，都更加恐惧地生活在死于非命的阴影之下。而且这也是一个战争与难民的数量以天文数字激增的时代。即便是冷战时期终结之后，在海湾战争以及巴尔干半岛民族纷争中，我们依然看到非正常死亡以及难民的数量相互催生、持续攀升。在西欧各国中，虽然规模不大，但各

种民族纷争不绝如缕；阴暗的暴力斗争，在市民社会乃至学校之中屡有发生。纳粹主义的余孽蠢蠢欲动，巴勒斯坦难民的苦难似乎永无尽头。在亚洲，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展开了开发核武器的竞争。哪里才有和平的净土？

这恐怕是生活在历史与社会之中的现代人类的呐喊吧。它通过充满无助与悲哀的呐喊声来表现人类向思想提出的切实的“疑问”。那是真实而发人深省的疑问，是直击人心的呐喊与疑问。不让这个疑问永远成为一个疑问、用语言将其表现出来，这正是思想所承担的任务。将大声疾呼的疑问转换为思想的语言时，“疑问”就变身为一个“问题”。所谓思想，站在思考者的立场而言，即是一项将时代提出的“疑问”转换为理论问题的工作。只有提出能够以首尾一贯的语言进行讲述的问题，思想家们才能加以回答。

无论是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还是哈贝马斯-阿佩尔式的讨论伦理学，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并不仅仅将时代的呐喊作为疑问而“承揽”到自己身上，而是不断努力将这些疑问转换成为可以解答的理论问题。

不管是法律哲学还是伦理学都在致力于解决正义论这一二十世纪的未解难题。作为以高度抽象的哲学构想为基础、同时又是紧迫度极高的实践性思想，正义论问题正在被广泛地进行讨论与研究。

凡例

一、本书的原稿，1999 年 9 月由讲坛社刊行。

二、此年表按照年代追溯了《现代思想的冒险者们》（讲坛社，今村仁司、三岛宪一、鹫田清一、野家启一编、全 31 卷）

PDG

中思想家们自 1883 年起至 1995 年止所发生的思想领域的相关事项以及艺术事件。

三、在每一年年末摘记了世界上发生的主要政治、社会事件。



1883—1900

瓦格纳、马克思之死与世纪末的巴黎





18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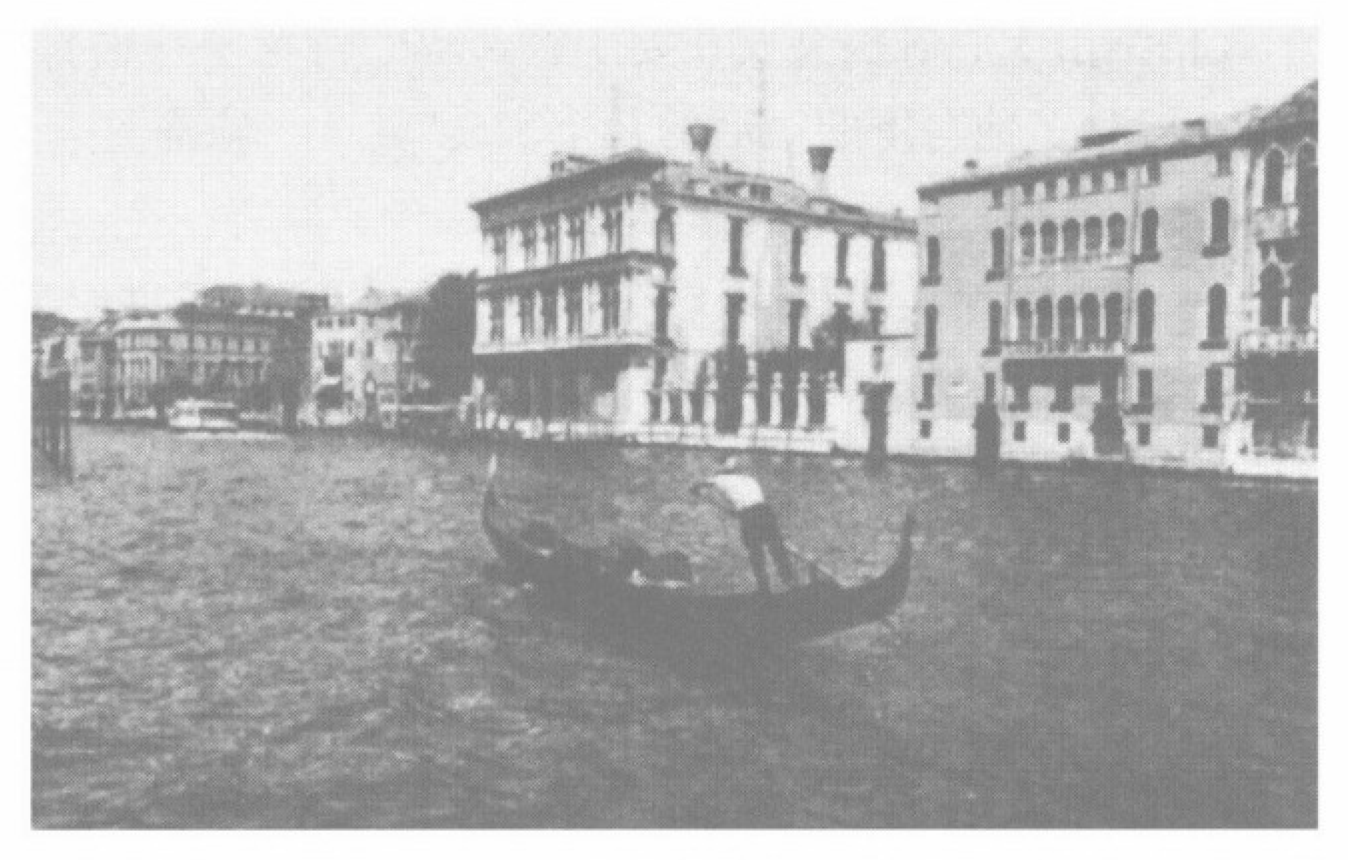
2月13日 在威尼斯的温德拉敏·卡拉基宫中，理查德·瓦格纳由于心脏病突发在妻子科西玛的臂弯中与世长辞（享年69岁）。他写下的最后的几个字是“爱——悲剧”。2月18日，葬于拜罗伊特万弗里德别墅的庭园中。

3月14日 卡尔·马克思在位于伦敦的家中去世（享年64岁）。17日，下葬于海格特公墓其夫人的墓地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等，大约三十位马克思生前极为亲密的友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加入了1882年创立的心灵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SPR），直至去世（1898年）的前一年一直是该会的会员。刘易斯死后，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夹杂在《心灵思想的光与影》、《魔术哲学》、《心灵的世界》等书籍中的SPR的内部杂志，共计十一册。

作为《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十一卷，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的小说《妇女乐园》在*Gil Blas*报上连载后，正式出版。这部小说以巴黎的乐蓬·马歇百货商店为原型，如书名所示，描写了“女性们的幸福”以及“可以愉快购物的价廉物美的商店”，即女性们对消费的欲望与资本主义市场力学之间的亲和性。女主人公黛妮丝初来巴黎，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些让她沉迷其中、美轮美奂的百货商店的橱窗，时至今日依然能够栩栩如生地令读者真切地体会到“购物的诱惑”。左拉曾写道：这部作品也许能够成为“现代生活的诗篇”。这部作者以彻底细致的观察和严密的研究而创作小说，

预见了即将到来的高度消费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堪称一部具有先驱意义的作品。



温德拉敏·卡拉基宫中央　现在冬季为市营赌场，夏季为展览会场

1884

J-K 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逆流》出版。根据于斯曼自己的回忆，这部作品“如陨石般坠落在文艺市场，让人们为之震惊、愤怒”。然而，后人这样评价它：“不仅仅是于斯曼自身继《逆流》之后所写的作品，还包括让·洛兰(Jean Lorrain)、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王尔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在内的所有颓废派作品，都萌芽自这部《逆流》”(马里奥·普拉兹(Mario Praz)所著的《罗曼蒂克的痛苦》)。

1885

1881 年 11 月 18 日，“黑猫”酒馆在巴黎蒙马特的罗什舒

阿尔特大街 84 号、画家罗道尔夫 · 萨利斯(Rodolphe Salis)的画室中开张了。为了避免妨碍当地有权势的人,于 1885 年搬迁到了拉瓦尔街(1896 年又再次迁移到维克多 · 玛萨街)。直到 1897 年 2 月"黑猫"被关闭,它的营业时间长达 15 年,是世人皆知的巴黎艺术家们的社交场所。建筑物的正面装饰着多只巨大的黑猫,大堂里悬挂着"人啊,怎可不摩登!"的铭文,二楼有专供"香颂歌手"们表演用的大厅,三楼配备了放映"皮影戏"的设备。1895 年后,迅速发展的"活动摄影",也屡屡在三楼的屏幕上放映。1888 年,萨利斯雇用了 22 岁的埃里克 · 萨蒂(Erik Alfred Leslie Satie)作为第二钢琴演奏者,可萨蒂不久之后离开了"黑猫",去了"阿贝尔勒 · 第 · 库路"餐厅,并在那里结识了德彪西(Claude Achille Debussy),两人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8 月 同年 3 月出版了《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的沃尔特 · 佩特(Walter Pater)陪伴两个妹妹从牛津迁居至伦敦的肯辛顿。直至 1893 年再次搬迁到牛津,他在肯辛顿前后大约生活了 9 年时间。佩特时常在伦敦的宅邸举办晚宴,邀请年轻一代的文学家前来参加。其中有奥斯卡 · 王尔德、阿瑟 · 西蒙斯(Arthur Symons)、乔治 · 爱德华 · 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等人。

秋 由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布吕克(E. W. von Brucke)的推荐,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前往巴黎留学。在当时的精神病研究的中心——萨尔佩特里埃医院师从让-马丁 · 沙可(Jean-Martin Charcot),让-马丁在癔病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令弗洛伊德深感钦佩。翌年 2 月,他自巴黎返回,途经柏林,在巴金斯基(Baginski)的指导下,学

习儿童医学，之后回到维也纳，4 月在维也纳作为一名神经科医生开业。

1886

5月—6月　保罗·克劳代尔(Paul Claudel)在 *la vogue* 杂志上读到了兰波(Arthur Rimbaud)的《灵光集》。之后在9、10 月又读到了他的《地狱的季节》。这两部作品给了 18 岁的保罗以惊雷贯耳般的冲击，同年的圣诞节，在巴黎圣母院中，他突然犹如听到了神的召唤，重新皈依了基督教。翌年，他开始参加斯特芳·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于 1877 年左右在巴黎罗马大街 89 号的宅邸中举办的"周二沙龙"。此时的"周二沙龙"已经聚集了爱德华·迪瓦尔丹(Edouard Dujardin)、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egnier)、居斯塔夫·卡恩(Gustave Kahn)、让·莫雷阿斯(Jean Moreas)等日后作为"象征派"登场的年青诗人们。那一年马拉美 44 岁。不久之后，通过皮埃尔·路易斯(Pierre Louys)的介绍，1889 年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891 年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也相继出席了"周二沙龙"。

9月 18 日　《费加罗文学》(*Figaro. Littéraire*)上发表了让·莫雷阿斯的《象征主义宣言》一文。"我们已经提出象征主义这一称呼，将其作为唯一能够确切表达现今艺术领域具有创造精神的潮流的代名词。……在象征主义艺术领域，无论是自然的形象，还是人类的行为，所有的具体现象，并非将其自身进行视觉化，而必须通过主观感觉能够认识的各种线索、通过孕育着根源性观念的隐秘的亲和力，作为象征，将其表现出来。"

1887

巴黎,安德烈·安东尼(André Antoine)创办了"自由剧院"(持续至1896年),以这种形式对抗那些只上演已经成名作家的作品的大型商业剧场,堪称以舞台上的写实主义为理想的、前卫的小剧场运动的先驱。自由剧院不仅上演由左拉、龚古尔的自然主义小说所改编的戏剧,而且积极地介绍易卜生(Henrik Ibsen)、比昂松(Bjornstjerne Bjornson)、托尔斯泰(Leo Tolstoy)、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等其他欧洲各国同时代的自然主义戏剧。更纯粹地从艺术的目的出发,举办各种各样的实验性演出,结果产生了反自然主义的象征主义戏剧,自由剧院无疑是功不可没的。1890年保尔·福尔(Paul Fort)创建了"艺术剧院"(持续至1893年),之后继承了其理念的吕尼埃-波埃创建了"制作剧院"(1892年),这一系列活动催生了诸如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的《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1892年)等象征主义戏剧的杰作。此后,直至世纪转换期,在欧洲各地掀起了为数众多的小剧场运动。

1888

虽然为时很短,鲁道夫·史代纳(Rudolf Steiner)担任了澳大利亚《德意志周报》的总编。当时,年方27岁的他受到了"格林斯坦"咖啡馆常客弗雷德里奇·艾科修泰(Fridrich Eckstein)的赏识。艾科修泰虽然是一家化学工厂的经营者,但是却富有学识,是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Josef Anton Bruckner)与胡戈·沃尔夫(Hugo Wolf)的资助人,是当时维也纳最优秀的神秘学研究者。史代纳从他们那里学习到许多超自然学、神秘学的知识。同年,他在维也纳的歌德协会发表

了名为“新美学之父——歌德”的演讲，并以此为契机于1890年移居魏玛，在“歌德·席勒文库”工作，同时潜心研究歌德的自然学。

11月1日 艺术工艺展协会[沃尔特·克莱恩(Walter Crane)为会长]在伦敦摄政王大街的“新·画廊”举办了第一次展览会，会上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作了题为“壁挂织与机械织”的演讲。在此次展览会上，展出了壁挂织挂毯“阿瑟王之死”以及其他众多莫里斯商会的作品，莫里斯的书法展品也广受瞩目。

1889

1月3日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意大利都灵的卡洛·阿尔贝托广场上昏倒。10日，被送往巴塞尔的精神病院。医师维拉(Ville)的诊断是“进行性麻痹症”。17日，在母亲的陪伴下，尼采被送入耶拿大学医院的精神科进行治疗。1900年8月25日在魏玛与世长辞。28日下葬于故乡勒肯。

春 巴黎万国博览会举办。象征着“新工业世纪”的埃菲尔铁塔拔地而起。此次万国博览会上介绍的回教寺院，柬埔寨的佛教寺院，充满中国特色的塔楼，大溪地(Tahiti，又译塔希提岛)岛民们的舞蹈以及越南、爪哇的东亚风情音乐，强烈地影响了德彪西，同时也成为高更(Gauguin)大溪地之行的诱因。

1890

布罗瓦·沃拉尔德(Ambroise Vollard)在巴黎蒙马特尔

自己日常起居的阁楼上开了一家小画廊。1893 年又在巴黎当时被称为“绘画街”的拉斐特街上开了一家规模稍大的店铺，著名的《地下室的晚餐》正是出自那里的地下画室。

1891

4 月末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与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初次见面。霍夫曼斯塔尔在此前一年以罗利斯·梅里科夫（Loris-Melikov）的笔名在 *Precce* 报的附录上发表了数篇十四行诗。3 月，《现代展望》杂志上刊载了他所写的关于巴尔的戏剧《母亲》的评论。巴尔阅读了罗利斯的诗篇以及评论，将作者想象成为一名临近暮年的退职外交官。然而，自称罗利斯的霍夫曼斯塔尔是一个年仅 17 岁的少年。当时，他是文学咖啡座“格林斯坦”的常客，12 月，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偶然与正在咖啡店中读书的霍夫曼斯塔尔攀谈起来。据说格奥尔格迅速地接近霍夫曼斯塔尔，但霍夫曼斯塔尔对于这种热烈的接近方式感到犹豫迷惑，最终给对方寄去了拒绝的信件。

波兰派的塔迪·纳塔松（Thadée Natanson）在巴黎创办了 *La Revue Blanche* 杂志。以这本杂志为中心，他与妻子密希亚（Misia Natanson）共同构建了一个以画家、文人、音乐家、批评家为主的社交圈。1894 年以后，费利克斯·费内翁（Felix Feneon）出任主编，1903 年之前为月刊，之后以双月刊的形式发行。投稿的作家包括儒勒·勒纳尔（Jules Renard）、马拉美、迪瓦尔丹、易卜生、普鲁斯特、瓦雷里、纪德、雅姆（Francis Jammes）等一系列代表法国世纪末时代的文学家。

德尼(Maurice Denis)、博纳尔(Pierre Bonnard)、维亚尔(Edouard Vuillard)等纳比派画家使用独特新颖的图案装饰杂志的封面,不仅如此,还绘制了销售宣传用海报的草图。并在与 *La Revue Blanche* 编辑部相邻的空地上举办了纳比派画家以及图卢兹-洛特雷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作品的小型展览会。画展上响起了德彪西的乐曲新作。

1892

3月10日 画商杜兰·鲁埃(Paul Durand-Ruel)的家中,约瑟芬·佩拉当(Joséphin Péladan)在埃里克·萨蒂悠扬的小号乐曲中举办了"玫瑰十字展览会"(沙龙)。第一届展会的资金是由发起人安托万·德·拉·洛希福考伯爵(Antoine de La Rochefoucauld)提供的。虽然入场费价值不菲,但依然观客云集,展览会大获成功,到1897年为止共举办了六届。"艺术家啊,你们是祭司。艺术是一个庞大的密教,当你们的钻研修行结出丰硕的果实、产生了伟大的作品之时,神圣的光芒缓缓投射,犹如落在祭坛之上。……艺术家啊,你们是王者。艺术就是真实的王国。……艺术家啊,你们是魔术师。艺术是一项巨大的圣礼,也是不死的证明"(选自佩拉当所作的第一届展览会目录的序言)。

11月5日 柏林的"造型艺术家协会"主办了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绘画展览。但是12日却史无前例地召开了会员总会,并且在会上决定立即关闭画展。为了抗议此举,11月下旬爱德华·舒尔德(Eduard Schulte)在杜塞尔多夫的艺术沙龙中展出了55件蒙克的画作,12月,此次画展在柏林继续顺利进行。以此为契机,1893年成立了以马克

斯·克林格尔(Max Klinger)以及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等人为中心的“自由艺术家协会”,1898 年“柏林分离派”诞生。

1893

在芝加哥举办了世界博览会。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为此次世界博览会提交了一份令人耳目一新的策划书,然而他的计划被否定了,最终采用了模仿欧洲中世纪风格的另一项方案。为此美国错失了成为当时新近代建筑运动先驱的良机。沙利文在博览会召开之际断言,“现在,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中,建筑已死。……本届世界博览会所带来的众多损害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事实上,虽然拥有沙利文及其弟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等天才,但是直至 1930 年,由于纳粹政权的上台而导致大量欧洲一流的建筑家流亡到美国,那之后美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建筑。

1894

4 月 奥博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与西蒙斯(Arthur Simons)共同创办了季刊《黄面志》(*The Yellow Book*)。这本杂志总共发行了十三期。之后,他们作为共同发行者又在 1896 年参与了季刊《萨沃伊》(*The Savoy*)的发行。但是,比亚兹莱的健康状况急速恶化,于 1899 年去世,当时他年仅 25 岁。

同年,法国军队中的一名大尉——犹太人德雷福斯(Affaire Dreyfus)被逮捕,罪名是涉嫌向德军泄露军事机密。所谓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此拉开序幕。巴黎的社交界以及言

论界中一时之间出现了两大泾渭分明的对立派系，一方坚信德雷福斯的清白并坚决支持犹太人，另一方则强硬地认定他的罪名成立，并发布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当时的情形在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等文学作品中有着生动的描写。左拉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对此次事件的真伪进行了调查，1899年，在*L'Aurore*报上发表了著名文章《我、弹劾》，立证德雷福斯大尉的清白。左拉由于其批判反犹太主义的言行而被告发，不得不逃亡至英国，1899年德雷福斯大尉案件的二审开庭，左拉回到了法国，但是1902年9月29日不幸暴卒，因此他再也无法得知1906年德雷福斯大尉终于被宣判无罪获释的消息。此次事件是象征19世纪末期欧洲各国反犹太主义高涨的代表性事件。

1895

5月5日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被聘请讲授维也纳大学新设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现在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的课程。马赫1838年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奇鲁里兹(现在的捷克境内)，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与物理学，1861年取得物理学教授资格，1864年担任格拉茨大学的数学、物理学教授，自1867年起至1895年在布拉格大学担任实验物理学的教授。其间，公开发行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力学史》(1883年)、《感觉的分析》(1886年)、《通俗科学讲义》(1894年)等等，在移居维也纳后又相继发表了《热学诸原理》(1896年)、《认识与谬误》(1905年)等。代表“流体的流动速度和声音在该流体内传播的速度之比”的马赫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赫被认为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一元论科学哲学的代

表，作为经验批判论的评论家，与苏黎世的理查德·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共同占据了维也纳大学学术领域的指导性地位。由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其进行了批判，因此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的不合理的忽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疑是受到了马赫思想的启发，并且他对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也不容抹杀，因此现在学术界正在对他作出重新评价。此外，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向柏林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卡尔·斯图姆夫(Carl Stumpf)提交的名为“马赫理论对于价值评论的贡献”的博士论文，以及作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的作品《梦游的人们》(1932年)中也都明显带有马赫思想的色彩。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窥见马赫哲学在维也纳的巨大影响力。1898年，马赫突发脑溢血，中风而导致半身不遂，无法再公开讲课，1901年他辞去大学的教席，1916年死于慕尼黑郊外的哈尔。

读书爱好者杂志 *PAN* 在柏林创刊。这本杂志介绍了众多年轻诗人的作品，同时还介绍了包括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奥托·艾克曼(Otto Eckmann)、古斯特·恩德尔(August Endell)、瓦尔特·莱斯提科(Walter Leistikow)、约斯夫·塞特勒(Joseph Sattler)在内的许多年轻艺术家的独创画作，是一本极为新颖独特的杂志。

1896

3月 杂志《青年》与(*Jugend*)《简单》(*Simplicissimus*)创刊。1892年，先于柏林，在慕尼黑以弗兰士·凡·斯达克(Franz von Stuck)为中心成立了分离派，这是一个以反对由

“画家大公”弗兰茨·冯·伦巴赫(Franz von Lenbach)的喜好所支配的“艺术家同盟”为宗旨的艺术家集合。他们的目的是实现比“艺术家同盟”更优越的画展条件。为此，寻求与欧洲艺术直接联系的团体不久之后又从分离派中独立出去，创立了“慕尼黑艺术家自由协会”。《青年》杂志是由曾经担任《慕尼黑新报》主笔的格奥尔格·希尔特(Georg Hirth)所创办的，正如他在卷首语中所写的“我们介绍美的事物、善的事物、有特点的事物、时尚的事物——总而言之，只要是真正的艺术我们都希望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为当时的前卫艺术提供活动据点的杂志。德语圈世纪末艺术被称为“青年风格派”，正是来自这本杂志的刊名。此外，由 F · A. 朗格(Albert Langen)创办的杂志《简单》，托马斯·特奥多·海涅(Thomas Theodor Heine)为其封面绘制的红色虎头狗形象非常出名，这本文学杂志的最初销量只有 1 500 册。但是由于陆续刊登了讽刺诗、楷模诗文、专访等以充实杂志内容，又采用了 T · T. 海涅、爱德华·提尼(Eduard Tenny)以及稍后的奥纳夫·古尔布兰生(Olaf Gulbransson)等个性鲜明的画家所绘制的插图，因此销量直线上升，1904 年左右达到了八万五千册的惊人数字。1893 年来到慕尼黑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自 1898 年起担任这本杂志的校对兼原稿审查的工作，在此期间他执笔撰写了《布登勃洛克家族》一书。在曼创作初期的短篇作品中描写了当时慕尼黑的氛围，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897

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旧译涂尔干)的《自

杀论——社会学研究》出版。1895 年,《社会学方法的标准》公开发行,遭受众多"实体论者"和"唯物论者"批判的他,翌年就任波尔多大学新设的"社会科学"课程的正教授,那一年他38 岁。这门课程是法国首次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同年,迪尔凯姆归纳总结了自 1888 至 1890 年在波尔多大学曾经讲授过的自杀问题,并且结集出版。此书将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标准》一书中所明确化的属于经验科学范畴的比较社会学的统计学手法运用于自杀现象,堪称划时代的业绩,显示出与早期的孔德(Auguste Comte)、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截然不同的近代社会学中"范围理论"的具体形态。迪尔凯姆用于推论的统计学手法相当不完善,得出的推论也多少有些牵强附会,然而,在现代社会学的黎明期,诞生了这样一本充满革新精神的书籍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并且,在此后的一年,迪尔凯姆还出版了成为他学派基础的《社会学年报》。

1898

意大利都灵举办了美术博览会。在实现近代化较晚的意大利,长期以来文艺复兴风格以及巴洛克风格一枝独秀,受其压倒性的影响,世纪末艺术的产生也稍稍落后于其他国家。但是自 1898 年起,意大利世纪末艺术的发展终于步入正轨。在意大利最为显著的是通过布鲁塞尔和米兰之间的直通列车,英国的自由风格以及比利时的凡·德·威尔德(Henry van de Velde)等的设计进入了这个国度。自将莫里斯的设计进行商业化的自由风格开始,意大利世纪末艺术也被称为"花的样式"。自由风格在 1902 年的都灵博览会上大获成功,从

那时开始，直至 1906 年的米兰博览会，是意大利新艺术运动最繁盛的时期。

11 月 12 日 前一年成立的、由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担任会长的“奥地利造型美术协会”(维也纳分离派)，在同年 4 月 28 日开始建造新协会的大楼——分离派会馆，大楼由约瑟夫·玛利亚·欧尔布里希(Joseph Maria Olbrich)设计，11 月 12 日正式竣工。建造大楼的大部分资金由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父亲、工业家卡尔·维特根斯坦(Karl Wittgenstein)提供。在这幢大楼中召开了第二届分离派画展，科罗曼·莫塞(Koloman Moser)、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卡尔·莫尔(Carl Moll)以及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等众多分离派系的美术家参加了此次画展。此外，发行了以批评家赫尔曼·巴尔为顾问的分离派内部杂志《神圣的春天》，直至 1903 年。与世纪末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众多杂志一样，《神圣的春天》也登载了许多分离派画家们的绘画作品。1899 年 4 月，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创办了讽刺杂志《火炬》(Fackel)，至 1936 年 2 月总共发行了 922 期。

1899

柏林与莱比锡的舒斯特和罗福乐出版社(Schuster & Loeffler)首次发行了以帆船为标帜的杂志《岛屿》(*insel*)。发行者为奥托·尤利乌斯·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阿尔弗雷德·瓦尔特·荷美尔(Alfred Walter Haimel)以及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Rudolf Alexander Schröder Schroeder)3 人。施罗德在第一期杂志序文的“策划书”中作

了这样的宣言："形成近代本国文学以及一部分外国文学中充满艺术感、有价值作品的集散地，通过版面设计、通过精心甄选出的近代书籍装帧的应用，以及通过质量上乘且具有耐久性的纸张的使用，让对这些年来在德国也日益进步、极具美学感的书籍印刷的关心得到满足与促进。另一方面，应该保证出版时机已成熟的手稿能够获得有品位的出版体裁。"这段宣言可以说清楚地表明了该杂志希望引进书籍制作艺术，重视所有印刷品的装祯设计的意图。

1900

春 巴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1895 年，萨姆尔·宾(Samuel Bing)开办了名为"新艺术"的现代装饰艺术品商店，展示和销售比亚兹莱、加莱(Émile Gallé)、蒂梵尼(Louis Comfort Tiffany)、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等世纪末美术的画作以及工艺品，在此次世界博览会上，他也在荣军院广场开设了私人展馆。展馆共占据了七个房间，室内都别出心裁地用摇曳缠绕的植物图案加以装饰。法国十九世纪末的工艺美术之所以被称为"新艺术"，是源自宾商店的店名。在世界博览会入口比奈门附近的香榭丽舍大道上，上演着新奇独特的戏剧以及舞蹈表演。灯光聚集在长长的、翩然翻飞的裙裾上，充分利用观众视觉余像效果的洛依-富勒(Loie Fuller)的梦幻般的舞蹈，以及穿着如同从川上贞奴的浮世绘中飘落的、充满异国请调的服饰轻盈起舞的舞蹈，备受人们的关注。

7 月 19 日 连接巴黎东西两端(马约门—梵森门)的地铁一号线开通。赫克托·吉马德(Hector Guimard)在 1900 到

1913 年间，共设计了 140 个地铁入口。如同两条昂起镰刀形脖子的眼镜蛇般、上方相互缠绕的铸铁灯柱以及悬挂其间的黄色标识，标识中棱角分明的黑色粗体文字，这些新颖奇特的造型被称为“地铁风格”，作为新艺术运动的代表性设计而广为人知。



1901—1910

卡巴莱歌舞与俄罗斯芭蕾舞的黄金时代





1901

1月18日　恩斯特·冯·沃尔楚根(Ernst Von Wolzogen)买下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分离派剧院”的经营权,开设了“多彩剧院”。当晚演出了根据前一年曾编辑出版了《德意志香颂》的奥托·尤利乌斯·比尔鲍姆的诗作所改编的诗歌剧《快乐的丈夫》(作曲是剧团专职作曲家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持续上演了半年之后,入场券依然一票难求。这是柏林艺术卡巴莱的起源。

4月13日　慕尼黑,包括奥托·法尔肯贝尔格(Otto Falckenberg)在内、名为“11个死刑执行人”的团体对位于特鲁肯大街28号的一家啤酒馆进行了改建,更名为“金鹿亭”,并开设了同名的卡巴莱歌舞表演场。在这个店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表演者莫过于玛丽亚·德尔瓦尔(Marya Delver)。她“瘦长纤细,一脸冷漠,表情丰富的面孔、浓密丰厚的黑发、美丽的眼睛——天性悠然从容,对于任何事情都毫不拘泥”,是当时德国摩登女性的典型。TH·T.海涅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位居11个恶魔之首的玛丽亚的剪影,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1902年冬,这个卡巴莱歌舞剧场上演了魏德金(Frank Wedekind)的《地神》第一幕,在戏剧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当时,剧作者本身扮演了画家舒瓦茨,法尔肯贝尔格则扮演了舍恩博士。

11月4日　在柏林郊外的斯特格利泽的市政厅地下室,聚集了父兄5人(1人为医生,其余4人为作家)以及另外五个青少年(其中4人20岁,1人17岁),他们将“学生旅行委员会”命名为“候鸟”。此团体的创始人赫曼·霍夫曼-费鲁卡萨

姆布(Hermann Hoffmann)1900 年 1 月离开了斯特格利泽之后，卡尔·费歇尔(Karl Fischer)成为继任者，继续领导 25 名成员。“候鸟”这个名称源自 17 岁的沃尔夫·迈恩(Wolfgang Meyen)的提议。他回忆起在这一年的夏季与朋友们一起前往古纳森林远足，途中经过了达勒姆教堂入口左侧的墓园，在已故的柯特·布兰科(Kaethe Branco)的墓碑上曾经看见过的一句短诗：“你们，都是候鸟啊。”迈恩对同伴们提起了这句短诗。之后，在费歇尔的领导下，候鸟运动急速扩展。它标志着年轻人对于隐藏在父亲—家庭以及教师—学校这种观念背后的威廉帝国传统君主专制统治的反抗。

1902

8 月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发表了《一封信》(又名《(查德斯的信)》*Chandos-Brief*)一文。从 16 岁起(1890 年左右)就陆续创作了一系列抒情诗、韵文剧以及寓言等的霍夫曼斯塔尔，在这篇文章中记录下自己创作行为的转变过程。在查德斯寄给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这封虚构的书信中作者坦言从原理上他不再相信一直以来决定他创作的、象征主义的万物照应的世界的存在。文中霍夫曼斯塔尔言及了“写诗的不可能性”，不仅包含了从根源上对“诗的原理”进行的责问，而且还暗示出“语言本身的秘密”。从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到马拉美一直延续下来的“从诗中的音乐夺回财富”的主题，因《查德斯的信》一文而面临了重大的困难。甚至连音乐都无法彻底解开语言之谜，查德斯这一绝望的认识超越了诗歌的问题，作为开拓通往十九世纪先锋艺术运动之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霍夫曼

斯塔尔自身创作活动的中心，自这一时期起，就开始渐渐倾向于和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Georg Strauss)共同创作歌剧方面。

1903

10月4日黎明 维也纳"黑色西班牙馆"(Beethoven-Haus，贝多芬1827年在此去世)的一个房间里，奥图·魏宁格(Otto Weininger)开枪自杀。时年23岁。同年5月他的作品《性与性格》出版，距离他的死仅五个月。这本书发行的时候并未引起什么反响，由于作者的自杀，销量急剧攀升。截至1940年共翻印了30版，在欧洲被竞相翻译成各国文字。魏宁格从曾经接受过弗洛伊德治疗的友人赫尔曼·斯瓦波德(Hermann Svoboda)那里听说了弗洛伊德的某些想法，即"每一个人都同时拥有男女两方面的特性"，受此触动，他断定"女人只不过是满足男人性欲高潮的工具，化身为男人的性欲就是女人的命运"，在《性与性格》一书中他大肆宣扬女性蔑视论，认为"女性要么具有母性，要么具有娼妇性，不存在第三条道路。而且母性也无非是一种变形的娼妇性，男性要离开女性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生殖行为"。这种主张对于当时维也纳耽于逸乐的性风俗进行了揶揄、批判，但是身为犹太人却对自己的出身充满自我厌恶的魏宁格，在书中也强调了犹太人的劣等性，认为他们是"不知虔诚为何物的物质主义者，俨然一个娼妇的样子"。如此蕴含了悲观主义的"向死亡倾斜"的观念论，与以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为盟主的"青年维也纳派"可谓一脉相承。同时，犹太人自身提出反犹太主义论调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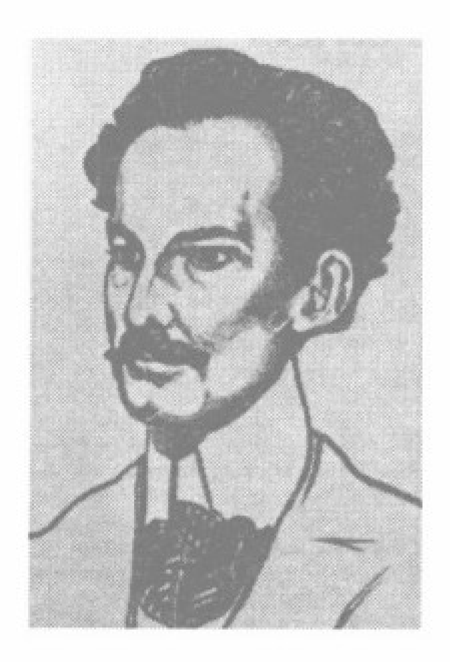
11月 维也纳，以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为中心的“维也纳生产同盟”成立(1933年解散)。当时，在维也纳的歌剧院正对面的咖啡馆中，霍夫曼、奥托·瓦格纳等人经常与青年艺术家们围坐一堂，长时间地谈天说地。某一天，一个名叫弗瑞兹·华恩多夫(Fritz Warndorfer)的人来到了咖啡馆，此人在英国时对以麦金托什为首的格拉斯哥派以及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深感兴趣，之后他从英国回到了维也纳。华恩多夫所讲述的英国新设计运动的动向让维也纳的艺术家们倍感兴奋。华恩多夫与他们相约由自己提供金钱方面的援助，希望在维也纳也发起一场与英国相同的运动。就这样成立了以霍夫曼与科罗曼·莫瑟(Koloman Moser)为领导、以C·O.茄修卡(Carl Otto Czeschka)以及达戈贝尔特·佩谢(Dagobert Peche)为助理的“维也纳生产同盟”。这个生产同盟充分发挥了莫里斯的理念与格拉斯哥派的实践经验，创作出众多丰富多彩的设计。建筑、家具、日用器具以及餐具、室内装潢、装饰品以及时装、建筑设计，乃至书籍的装帧等，各种精彩的作品陆续亮相，犹如恒河沙数，令人目不暇接。“维也纳生产同盟”的工作，是将维也纳的世纪末艺术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装饰艺术衔接起来的最为重要的工艺美术运动。

12月 美国莱特(Wilbur Wright)兄弟成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动力飞行。

1904

1月10日 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i，本名鲍里斯·尼科露维奇·贝加夫，Boris Nikolaevich Bugaev)与亚历山

大·勃洛克(Blok,Aleksandr Aleksandrovich)初次会面。那一年两人同为23岁。1900年别雷在哲学家乌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Vladimir Soloviev)去世前不久曾与其会面。其后一年,以莫斯科大学理学部学生为中心,成立了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的团体"Argonautai"(意为寻找金色羊毛的冒险者们)。他们不仅进行西欧象征派的研究,还深入文学领域,探讨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以及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等。1902年,别雷结交了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jkovski,Dimitri)及其妻子吉皮乌斯(Zinaida Nikolaevna Gippius),后者出版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一书。此外,在"艺术的世界"派的展览会上,别雷又结识了谢尔盖·佳吉列夫(Serge Diaghilev)。他的第一篇论文《艺术的形式》发表在《艺术的世界》杂志上。阅读了这篇文章的勃洛克给别雷写了一封信。就这样,代表俄罗斯象征主义的两位诗人开始了交往。但是,两人关系的发展绝对不是一条康庄大道。1903年,别雷爱上了勃洛克的妻子,即化学家门捷列夫(Mendeleev Dmitri Ivanovitch)的女儿柳博芙,就此展开一段充满悲剧色彩的三角关系。1906年8月8日,勃洛克接受了别雷的挑战,两人在莫斯科"普拉格"餐厅中进行决斗。虽然这场决斗最终并未上演,但是开始对神秘主义采取讽刺态度的勃洛克与越来越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别雷之间的分歧日渐加深。1908至1910年期间,别雷醉心于鲁道夫·史坦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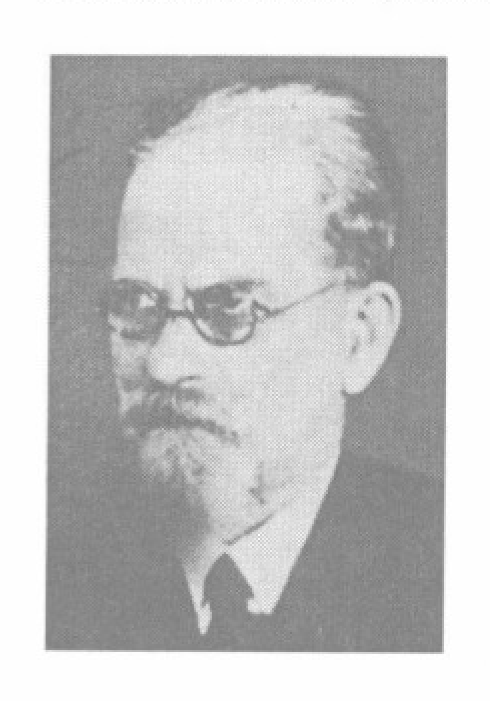


别雷

(Rudolf Steiner)的人智学,1912 年,他拜访了在科隆进行讲学的史坦纳。之后,参与成立了史坦纳的人智协会(1913 年),1915 年之前,一直在瑞士的多尔纳赫过着冥想与研究的生活。

1905

夏 在蒂洛尔阿尔卑斯山的疗养地塞费尔德,埃德蒙德·胡塞尔与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的众多学生,共同举办了研究会。会场上,胡塞尔首次提出了"现象学的还原"(epokhe)这一想法。1900 年出版了《逻辑学研究》、离开哈勒大学被招聘到哥廷根大学(从 1901 年开始)的胡塞尔,由于对心理主义激烈的批判以及对于语言意义深入彻底的思考,引起了若干文化团体对他的关注。尤其是在T. 李普斯(T. Lipps)指导下的慕尼黑大学小组的J. 道伯特(J. Daubert),于 1903 年特地前往哥廷根大学拜访了胡塞尔。次年 7 月,在他的努力下,实现了胡塞尔的慕尼黑之行。塞费尔德的研究会也是应道伯特等人的希望举办的。在此次研究会上,"现象学的还原"的想法还只是个不甚明确的概念,直至 1907 年夏季学期的"事物论"讲义开始,在最先讲授的五堂课上才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形态。时至今日它作为"现象学的理念"已广为人知。在那之后,"现象学的还原"这一根本思想,在胡塞尔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1913 年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部中所讲述的结构



胡塞尔

意识的超越论现象学的构想，正是对于“现象学的还原”论的具体实践。胡塞尔自身向超越论现象学的转变，加深了他与慕尼黑现象学派之间的隔阂。他们始终对批判个别科学学问基础的、严密的“作为方法的现象学”抱以厚望，对于现象学作为哲学、独自构成超越论领域的这一发展方向不得不采取批判性的态度，并与之保持距离。两者之间的鸿沟，由于1916年胡塞尔转任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而逐渐显现。

1月 俄国发生流血的星期日事件

6月 爱因斯坦发表了“特殊相对性理论”

1906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汉堡成立了“一元论者同盟”。海克尔原本凭借其《一般形态学》(1866年)以及《自然造化史》(1868年)等著作而为世人熟知，是一位知名的进化论生物学家。海克尔1899年出版的《宇宙之谜》成为畅销书籍，自此确立了他作为自然科学启蒙家的地位。海克尔所倡导的“一元论”，是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吸收了法国的孔德以及英国的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为了与当时世俗的唯物论区分开来而采用的一个概念。海克尔认为，宇宙中所有的不解之谜都可以运用“物质原理”、“能量原理”以及“进化论”这三个原则来阐明。这种主张，意味着他与当时在德国思想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理学家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的怀疑主义的不可知论展开了正面交锋。当然，对于海克尔的过激主张，反对者们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们借用了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名字，成立了“开普勒同盟”(1908年)。此后，“物理化学”创始

者之一的威廉·奥斯特瓦尔德(Friedrich Wilhelm Ostwald)从莱比锡大学物理化学研究室退职隐居,全身心地致力于自己的"能量一元论"哲学的普及,自此之后"一元论"的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扩展。奥斯特瓦尔德在《能量》(1908年)一书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一元论世界观,他认为"非生命体"、"生命体",以及其他所有精神的、社会的现象都可以通过物理学的能量原理来进行解释说明。此外,他在1907年创立的"德意志制造联盟"也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奥斯特瓦尔德致力研究如何通过化学方法合成染料,为奠定工业设计的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1907

10月6日 响应原普鲁士贸易局工艺美术部主任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的倡导,德国建筑家们在慕尼黑成立了"德意志制造联盟"。此联盟的目的在于超越一直以来坚持"one and only"纯手工制造的"维也纳生产同盟"的制造方法,让艺术家尽量能够提供符合工业化生产的设计。联盟成立初期的主要成员有美学家特奥多尔·菲舍尔(Theodor Fischers),当时在普鲁士建设局供职的建筑家汉斯·珀尔茨希(Hans Poelzig),原籍比利时、1902年应邀来到魏玛创立了工艺美术学校的(1906年)画家凡·德·威尔德等人。其中,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成为创立者的一员令人颇感意味深长。以此联盟为范本,1910年澳大利亚、1913年瑞士也各自成立了制造联盟。这些组织的目的与拉斯金(John Ruskin)以及莫里斯的理念相反,它们致力于实现制品的规格化,使德国工业制品的流通得以进一步扩大。当然,在组织内

部也存在着"主张推进机械化与规格化的派系"(穆特修斯)与"始终希望尊重艺术性的派系"(凡·德·威尔德)这两大激烈对立的派系。这个问题其实是工业设计的根本性问题,与现今的生产制造也紧密相连。1914 年在科隆召开的联盟展览会,作为设计领域现代风格的初次登场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08

11 月 15 日 "新法兰西评论"(NRF)第一期发行。在这一时期的巴黎涌现出众多号称"明日文学的草稿"(莱昂·保罗·法尔格(Leon-Paul Fargue))的小型杂志。例如由卡尔曼-拉出版社复刊的《巴黎评论》(*La Revue de Paris*)、阿尔弗雷德·瓦利特(Alfred Valette)发行、刊登了雷米·德·古尔蒙、勒纳尔以及雅里(Alfred Jarry)的作品的《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等,都是维持了较长时期的杂志。经常向这些杂志投稿的六个年轻人,在批评家欧仁·蒙福尔(Eugene Montfort)的帮助下,创办了一本新的杂志。杂志名(NRF)出于蒙福尔的提议。但是,对于六个年轻人而言,第一期杂志的质量令他们深感不满。蒙福尔擅自登载的邓南遮论以及马拉美论,在他们看来都是与杂志主题相去甚远的评论。他们决心独立地选择杂志的内容。在位于阿萨斯大街、面向卢森堡公园的让·施伦贝格尔(Jean Schlumberger)的公寓中,满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齐集一堂,其中有雅克·科波(Jacques Copeau)、安利·盖恩(Henri Vangeon Gheon)、米歇尔·阿诺(Michel Arnaud)以及安德烈·纪德。

翌年 2 月出版的第 2 期上登载了纪德的作品《窄门》(第

一部），这一期杂志的内容完全符合了他们的要求。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保罗·克劳代尔、雅克·里维埃尔（Jacques Riviere）、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 Jammes）、爱米尔·凡尔哈仑（Emile Verhaeren）等众多文人纷纷投来稿件，*NRF* 的发行量虽然不大，但却成为一本拥有声望与影响力的杂志。1910 年 12 月，已经发行了 24 期的 *NRF* 决定设立专门的出版部门，杂志初创时期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负责此出版部门的是科波的友人、一位著名绘画收藏家的儿子、25 岁的加斯东·加利玛尔（Gaston Gallimard）。这也是加利玛尔出版社的起源。

10 月 福特 T 型汽车诞生。

1909

2 月 20 日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在法国日报《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创立宣言》。此后不久，马里内蒂在自己担任编辑的杂志《诗歌》（*Poesia*）第五卷第一、二号上发表了这篇宣言的意大利语版，在从 1 月 15 日起上演其作品《女人多变》的都灵阿尔菲耶里剧场中，马里内蒂亲自朗读了这篇宣言。之后的 3 月份，适逢意大利进行总选举，马里内蒂为此制作了海报以及宣传印刷品。其后被称为《未来派第一政治宣言》的文章正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成的。翌年的 1910 年 2 月 11 日，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卡拉（Carlo Carra）、鲁索洛（Antonio Russolo）、塞弗里尼（Gino Severini）共同署名起草了《未来派画家宣言》，并于 3 月 18 日，在都灵切瑞拉大剧院召开的“未来派晚会”上宣读。此外，同年 10 月 11 日，由普雷特拉

(Francisco Balilla Pratella)起草了《未来派音乐家宣言》,1911年1月11日,马里内蒂自己起草了《未来派戏剧宣言》。就这样,未来派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了文学、绘画、音乐以及戏剧等各个领域,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先锋艺术运动。不仅如此,他们的造型理念具有先见性地指明了现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了室内装饰、时装、摄影的蒙太奇照片,有意识地使用视觉语言、令人耳目一新的凸版印刷术、纺织品的纹样以及日用器具新颖独特的设计等,未来派对于现代主义产生的影响可谓无可估量。这场运动的范围波及欧洲各国。

5月19日 谢尔盖·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 Russes)在巴黎初次登台。原本是一位一流舞蹈的佳吉列夫将宽敞但却陈旧不堪的夏特蕾剧院进行了彻底的改装,他邀请了被公认为是巴黎最美丽的女演员们前来观看第一场表演,并让她们坐在剧院楼上包厢的最前排座位。米哈伊尔·福金(Michel Fokine)担任编舞的"鞑靼人之舞"[鲍罗丁(Alexander Porphyrievitch Borodin)《伊戈尔王》],令观众如痴如醉。俄罗斯芭蕾舞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直至1929年佳吉列夫去世之前,俄罗斯芭蕾舞团一直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通过佳吉列夫不懈的努力,古典芭蕾成为一门现代艺术。他上演了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tch Stravinsky)、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Sergeevich Prokofiev)、德彪西、拉威尔(Joseph-Maurice Rave)、理查·施特劳斯、萨蒂、法利亚(Manuel de Fallay Matheu)、米约(Darius Milhaud)、普朗克(Francis Jean Marcel Poulenc)等人的名曲。由毕加索(Pablo Picasso)、马蒂斯(Henri Matisse)、巴克斯特(Leon Bakst)、伯努瓦(Pierre Benoit)、德兰(Andre Derain)、布拉克

(Georges Braque)、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米罗(Joan Miró)切利乔夫(Pavel Tchelitchew)、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鲁奥(Georges Rouault)等人担任舞台设计。而且,佳吉列夫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独创精神的编舞家,有福金、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Fomich Nijinsky)、列昂尼德·马西涅(Léonide Massine)、布隆尼斯拉娃·尼金斯卡(Bronislava Nijinska)、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等。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的公演给时尚界以及室内装饰设计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后,鲜明的色彩以及充满异国风情的独特设计在巴黎大行其道。

1910

春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移居位于海德堡涅卡河畔的外祖父家中。韦伯与恩斯特·特勒尔森(Ernst Troeltsch)各自占据一个楼面。1897 年由于父亲的去世,导致韦伯精神失常,他暂时辞去了弗赖堡大学的教授之职(1903 年),在海德堡充满热情地投入了写作生活。其批判历史学派经济学的《罗雪尔与克尼斯》(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 & Karl Gustav Adolf Knies)、《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等著作正是发表于二十世纪初的。1910 年夏,在到处都留有母亲的痕迹、充满古老气息的外祖父家中,韦伯迎来了施特凡·格奥尔格的初次造访。曾经沉醉于格奥尔格诗作的韦伯,虽然对于他作为诗人的才能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对于从其弟子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处听闻的格奥尔格的马克西敏(Maximin)崇拜以及富有诗意的神秘结社等行为却加以了批

判。他们的会面对于韦伯而言，能更深入地理解诗人的世界，并且能够使其成为自身的精神食粮，与之相反，在格奥尔格一方，却把韦伯对于学问认识必须严格并且具备悟性的要求认为是对想象力以及精神体验的一种压制与扼杀。两人最初和谐友好的对话，随着会面次数的增加渐渐地变得生硬紧张。1912 年的拜访成了最后一次，此后格奥尔格再也不曾造访过韦伯。在频繁登门拜访韦伯的年轻人中有乔治 · 卢卡奇(Georg Szegedy von Lukacs)以及恩斯特 · 布洛赫(Ernst Bloch)。布洛赫如同犹太教预言者般的口吻，不仅使韦伯，也令沙龙中的许多人感到极为厌烦。对于卢卡奇的美学构想及其当时所写的《关于精神的贫乏》一文，韦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至于他自己也开始构想如何书写托尔斯泰论。

12 月　至翌年 1 月，在莫斯科举办了"方块杰克社"的画展。这是一场俄罗斯现代画家与慕尼黑艺术家之间的划时代的交流展。1909 年 1 月，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担任会长，与居住在慕尼黑的俄罗斯籍画家雅兰斯基(Alexei Jawlensky)、梅勒伏金(Marianne von Werefkin)、库宾(Alfred Kubin)、穆特(Gabriele Munter)、埃贝斯乐(Adolf Erbsloh)、卡诺德(Alexander Kanoldt)等人成立了"慕尼黑新艺术协会"。由于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ch)、康定斯基、塔特林(Vladimir Yevgrafovich Tatlin)、布尔柳克(Burliuk)兄弟等俄罗斯西欧派画家的参展，"方块杰克社"的画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方块杰克社"的绘画作品与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以及 D. 布尔柳克等人出版的诗集《法官的饲养场》(1910 年 4 月)中的诗作相结合，由此诞生了俄罗斯的未来主义。



1911—1920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文化人众生相





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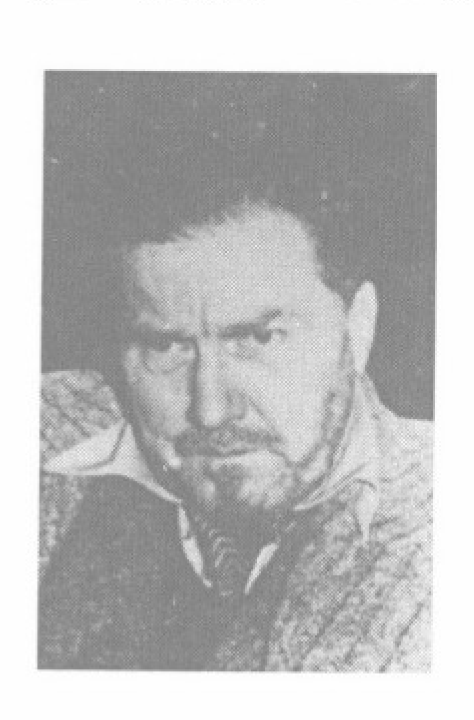
7月1日 德国出动豹式炮舰驶至摩洛哥南部的阿加迪尔港。令德法两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当时，居住于慕尼黑的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生于1880年)，以此次事件为契机，从感染了全欧洲的“战争的预感”之中获得了灵感，构思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他预测本次事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大战，在他的著作中将当时的形势类比为“古代世界的没落”，意味着由西欧各国主宰世界的局势已迎来了黄昏落日。《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在1917年初夏之前完成了排版工作，但是直至1918年4月20日才由布劳米拉出版社出版。在德国革命以及帝政崩溃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中，《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异常热销，一时间洛阳纸贵。接着的第二卷在1922年5月20日出版，出版方换成了贝克出版社。这部著作中所倡导的“世界史形态学”的观念，其构思出自于植物发芽、生长、开花、凋零的周期性变化。如同我们在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所看到的，“世界史形态学”的观念对于本世纪的历史记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成功，斯宾格勒终于获得了安定的生活，他搬入了面向伊萨尔河的宏伟的宅邸，作为魏玛共和国的保守主义理论家而占有重要的地位。1936年2月12日，斯宾格勒在慕尼黑辞世。

1912

在俄国掀起了“阿克梅主义”与“俄罗斯未来派”运动。早在1904年，俄国象征派的A. 勃洛克、W. 勃留索夫(Valerii

Yakovlevich Bryusov)、V. 伊凡诺夫(Vsevolod Vyacheslavovich Ivanov)、A. 别雷、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吉皮乌斯夫妇等人就已经出版了杂志《天秤》(1909 年停刊)。他们受到了索洛维耶夫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都带有神智学、神秘学以及弥撒亚主义的倾向。对于俄国象征派所具有的过度的观念性,阿克梅主义认为"玫瑰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颜色与香味,而并非由于它象征着什么神秘的事物",希望使用能够使可能的现实显得生动形象的具体语言来进行描述。此次运动的领导者 N. 古米廖夫创作了描写非洲风情的优美诗歌,充满了异国情趣。女诗人 A. 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以及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以明快的抒情诗而驰名文坛。

1 月 25 日　同日的《新世纪》(*New Age*)杂志上,艾兹拉 · 庞德(Ezra Weston Loomis Pound)以"T · E · 休姆(T. E. Hulme)诗集"为题,介绍了休姆的五篇诗作。庞德将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自己的诗集《反驳》时,将休姆等人称为"意象派",并写道"未来将由 1909 年被忘却的流派的后裔——意象派诗人来创造"。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象主义的诞生是在这一年的 4 月。庞德与 R. 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以及希尔达 · 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3 人提出了"意象主义诗歌创作三原则","一、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直接处理'事物'。二、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句。三、关于节奏。必须根据音乐的乐句来创作诗歌,而不依赖节拍器的机械重复。"



艾兹拉 · 庞德

2月4日 在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中上演了拉赫玛尼诺夫(Sergey Vasilievich Rachmaninov)的交响诗《死岛》。当时18岁的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观看了演出,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语句——"俄罗斯的未来主义诞生了"。

5月 《青骑士》在慕尼黑公开出版。前一年的6月19日,瓦西里·康定斯基给弗朗兹·马克(Franz Marc)写了一封信,向他倾诉了自己的构想——希望创办一本能够成为新艺术运动起爆剂的年刊杂志。最初被命名为《锁》的这本年刊杂志,由于两人都喜欢蓝色,马克想起了马,而康定斯基则想到了骑士,因此诞生了《青骑士》这个名字。当时,康定斯基听了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弦乐四重奏曲 作品第一〇号》以及《钢琴曲 作品第一一号》,对于乐曲的非调性深感触动,决定创办一本关于艺术运动的杂志,以期通过音乐家与画家这种全新形式的合作实现原始的美术、工艺与现代艺术的综合、美术与音乐的综合,以及美术与文化的综合。在这本"综合"的杂志里,登载了慕尼黑新美术家协会的作品以及塞尚(Paul Cézanne)、凡·高(Vincent Van Gogh)、高更(Paul Gauguin)、卢梭(Henri Rousseau)、马蒂斯、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作品,此外还刊登了非西欧世界的民族艺术以及德国中世纪时期的木版画、新维也纳乐派的乐谱、勋伯格自己创作的歌词论、萨福诺夫(Vasily Ilyich Safonov)创作的作曲家斯克里亚宾(Aleksandr Nikolayevich Skryabin)论等文章。俄罗斯象征主义与新原始主义的五位撰稿人参加了杂志的编创。康定斯基自身也投寄了3篇稿件,分别为阐述抽象与写实如何达到最终统一的《关于形式问题》、综合舞台剧作品《黄

色乐章》以及关于舞台艺术的论文《关于舞台构成作品》。同年,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一书出版。

8月13日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在布拉格的好友马科斯·布洛德(Max Brod)家中认识了从柏林来的菲莉丝·鲍尔(Felice Bauer)。那一年,卡夫卡29岁,菲莉丝出生于1887年,比卡夫卡小4岁。9月20日,在距离初次见面一个多月之后,卡夫卡向菲莉丝寄出了两人之间的第一封书信。当时,他正把全部的心血倾注于长篇小说《美国》的创作之中。两人鸿雁往来的信函多达四十余封,但是直至翌年3月下旬两人才在柏林再度相逢。其间的1月,卡夫卡的妹妹瓦莉(Franz Valli)与好友布洛德结婚,《美国》一书的创作不得不中断。5月中旬,他再次前往柏林与菲莉丝的双亲会面。6月中旬,卡夫卡写了第一封求婚信,次月收到了菲莉丝应允求婚的回信,但是由于卡夫卡始终没有写信给她的父亲,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10月下旬,两人之间曾经一度中断的书信往来又再次开始。11月8日至9日,卡夫卡前去探望菲莉丝。1914年1月,卡夫卡再次向菲莉丝求婚,但是这次她犹豫了。4月,菲莉丝终于接受求婚,并将婚期定于9月。6月1日两人在柏林正式订婚,然而令人意外的是,7月12日双方就解除了婚约。1917年7月初,卡夫卡与菲莉丝再次订婚。可是,这第二次婚约由于卡夫卡咳血、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而在12月25日再度取消。在这期间,卡夫卡给菲莉丝写了超过五百封的书信。而且,在1913年左右,他给菲莉丝的女性好友格蕾特·布洛赫(Grete Bloch)也写了相当多的书信。此后,1919年1月下旬,卡夫卡遇见了一位犹太人鞋店老板的女儿尤丽叶·沃利塞克(Julie Wohryzek),6月两人订婚。然而,

由于其父亲认为双方身份相差悬殊，坚决表示反对，此次婚约再次以失败告终。10 月，米蕾娜 • 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给卡夫卡寄去信函，希望能够将他的作品翻译成捷克语。翌年的 6 月末至 7 月初，两人在维也纳会面。米蕾娜是维也纳一名默默无闻的文人波拉克（Polák）的妻子。卡夫卡与米蕾娜的通信一直持续到 1921 年 1 月，卡夫卡在最后一封告别的书信中提出今后将不再与米蕾娜会面。但是，卡夫卡在 10 月初将自己的日记交给了到访布拉格的米蕾娜，并拜托好友布洛德在自己死后将他所写的一切作品都彻底烧毁。1924 年 6 月 3 日，卡夫卡在维也纳郊外的疗养院中与世长辞，当时，卡夫卡前一年结识的、在波罗的海临海学校中工作的多拉 • 迪阿曼特（Dora Diamant）陪护在他身边。终年四十岁零十一个月。直至生命的终点都没有步入婚姻殿堂的卡夫卡，在现实人生中以其曲折的恋情印证了他作品中共同的主题——“不合逻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让人不由得想起前一个世纪的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与维珍妮 • 奥逊（Regine Olsen）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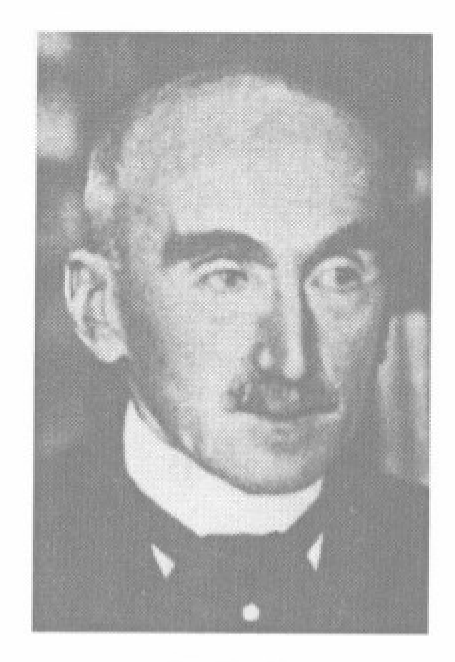
1 月　中华民国成立。

10 月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1913

5 月 28 日　亨利 • 伯格森（Henri-Louis Bergson）在伦敦心灵研究协会（SPR）进行了题为“生者的朦胧与心灵研究”的演讲。SPR 创立于 1882 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心灵主义团体，而是拥有独立的社会、知性地位的”人群的集会。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批评家拉斯金、心理学家W. 詹姆斯

(William James)、物理学家 J · J. 汤姆生(J · J · Thomson)等人都位列其中。已出版了《物质与记忆》(1896 年)、《笑的研究》(1900 年)、《创造进化论》(1907 年)等著作、担任法国国家学术学院教授之职的伯格森比之前更关心"透视"、"精神感应"等现象。阅读了他以后收录于《精神的能量》(1919 年)一书中的此次演讲稿就会发现,他批判了对于心灵学的偏见,强调存在着利用以往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所无法完全把握的深层意识领域,他认为心灵学之所以不能作为一门科学被广泛认可是由于"现代精神科学仍然处于幼年期"。伯格森预言道:如同因素论的生物学终究会被自古希腊以来的活力论生命观补充完善,心灵研究也终将成为对于人类精神研究而言不可或缺的探索领域。



伯格森

10 月　在位于德国卡塞尔南部的霍赫 · 迈斯纳丘陵,青年候鸟运动的成员们举办了大型集会以对抗在莱比锡举办的庆祝拿破仑战争胜利的盛大活动。这场青年运动不仅遍及整个德国,甚至扩展到奥地利、瑞士等地,集会希望借此机会建立名为"自由德意志青年团"的组织。本次集会也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解体的候鸟运动的最后一次大型集会。创造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思想的众多年轻人聚集在霍赫 · 迈斯纳,而后各自散去。其中包括瓦尔特 · 本雅明、K · A.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1 月 14 日　马塞尔 · 普鲁斯特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通过格拉塞出版社由普鲁斯特自

费出版。1908年夏，在贝内尔比尔度假的加斯东·加利玛尔第一次见到了邀请友人前往洲际酒店参加晚会的普鲁斯特。加利玛尔也应邀参加了此次宴会，在晚餐的宴席间，大家聊起了旅行的话题，当谈及君士坦丁堡时，普鲁斯特当场背诵出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所写的关于这个城市的文章。加利玛尔对于普鲁斯特的博闻强记赞叹不已，但是这种赞叹不是针对作为作家的普鲁斯特的，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普鲁斯特的。1912年11月，普鲁斯特给加利玛尔寄去一封书信，希望与其商谈两本"一页三十五行、一行四十五个字、共五百五十页"的原稿的出版事项。加利玛尔将这份数量庞大的原稿提交给了设立于阿萨斯大街施伦贝格尔府上的原稿审查委员会。然而，由于安德烈·纪德发表了"这份稿件不适合我们"的论断，《在斯万家那边》的出版被否定了。但是，*NRF*1914年1月号上刊登的H.盖恩的书评成为扭转事态的契机。J.里维埃尔阅读了原稿，纪德也重新进行了阅读，并向加利玛尔强烈建议出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这样，直至1927年(普鲁斯特已于1922年去世)，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追忆似水年华》一书终于由加利玛尔出版社出版发行。

8月 孙文流亡至日本。

1914

7月28日 6月28日，奥地利皇太子费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暗杀，此次事件成为导火索，当日，奥地利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斯宾格勒所预见的世界大战终于成为现实。在与奥地利保持友好密切关系的德国，街头巷尾挤满了要求政府对于此次暗

杀事件做出坚决、强硬态度的群众。起初高举反战旗帜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在面对强烈抗议 7 月 31 日俄国总动员令而极度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时，也渐渐地被大众的狂热所席卷，在 8 月 4 日的国会决议中鲜明地表示出支持战争的立场。8 月 1 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并于 3 日向法国宣战。此后，英国向德国宣战，战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美丽年代宣告终结，作为“战争与革命的世纪”的二十世纪拉开了帷幕，但是，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预见到这一点。大多数的民众在欢呼声中欢迎战争的到来。甚至连知识分子也如同在 10 月发布的“德国知识分子 98 人声明” 那样，强辩道“我们并未违法地侵犯比利时的中立……我军也并未采取残虐行为”。在这些科学家、艺术家中包括了神学家 A · V. 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作家 H. 苏德曼(Herman Suder-mann)、作曲家 E. 汉普汀克(Engelbert Humperdinck)、物理学家 W. 伦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剧作家 G. 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等。作家托马斯 · 曼对于其兄、同为作家的亨利希 · 曼(Luiz Heinrich Mann)的反战主张，认为这场战争是向“文明的各国”进行“德意志文化”的挑战，为了将这场战争正当化，开始撰写《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

8 月　英国向德国宣战。

8 月　美国的伍德罗 · 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宣布中立。

8 月　巴拿马运河开通。

1915

4 月 22 日　德军在比利时伊珀尔的作战中首次使用了毒

气。长约六公里、呈带状扩散的黄色有毒气体令 15 000 名法国士兵出现中毒症状，之后大约有五千人死亡。5 月 7 日，英国豪华客船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 U－20 击沉，造成共 1 198 人死亡，其中 139 人为美国籍乘客。战争很快发展成为世界史上第一场大规模杀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战死或者病死沙场。此外，还有由于无法直面战争的残酷现状而自杀的人。新康德主义卓越的哲学家 E. 拉斯克(Emil Lask，生于 1875 年)在这一年战死。1916 年 3 月 4 日，《青骑士》的画家F. 马尔克(Franz Marc，生于 1880 年)在凡尔登附近战死。1914 年，创作了著名青春小说《大摩尔纳》的阿兰-傅尼耶(Alain Fournier，生于 1886 年)在战火之中下落不明。梦想能将社会主义与天主教完美结合起来的 C. 佩吉(Charles Péguy，生于 1873 年)于 1914 年在马恩河大会战胜利的前一天壮烈战死。凭借风格特异的抒情诗而享誉文坛的表现主义诗人 G. 特拉克尔(Georg Trakl，生于 1887 年)参加了加利西亚的格罗德克战役，血肉横飞的场面令他精神失常，他开枪自杀未遂，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半个月后，服用过量可卡因自杀。与 E. 庞德齐名、共同开创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诗人思想家 T · E. 休姆(生于 1883 年)，在开战初期加入了军队，1917 年在比利时战死。

1916

2 月 1 日　雨果 · 巴尔(Hugo Ball)在瑞士苏黎世的镜子胡同开了一家名为“伏尔泰”的带有小舞台的艺术家酒馆。当时的报纸(2 月 2 日)上有这样的报道，“艺术家酒馆 · 伏尔泰。以此命名专为年轻的艺术家、文学者所开设的社交场所。其

目标是营造一个充满艺术色彩的娱乐中心。作为顾客而出入酒馆的艺术家，每一天相聚都会演奏音乐或者表演朗诵，邀请苏黎世的年轻艺术家们，让他们无拘无束、各抒己见，这就是这家艺术家酒馆的宗旨"。一夜之间，"伏尔泰"成为苏黎世最为轰动一时的社交场所。巴尔的合作者包括诗人 T. 查拉(Tristan Tzara)、医生兼诗人 R. 胡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建筑家 M. 扬科(Marcel Janco)、画家 H. 阿尔普(Jean Hans Arp)，以及唯一的女性——诗人E. 亨宁斯(Emmy Ball-Hennings)。当时，流亡中的列宁也居住在镜子胡同，也许他也曾经与拉狄克(Karl Berngardovich Radek)、季诺维也夫(Grigorii Yevseevich Zinoviev)等人一同前往过"伏尔泰"酒馆。7 月 14 日，在度量衡会馆召开了"第一届达达主义晚会"。同月，作为"达达主义作品发布"，出版了查拉的作品《昂蒂皮里纳先生首次天堂奇遇记》，并附有扬科的彩色木版画。9 月，作为"达达主义作品发布"的第二波，登载了胡森贝克的诗作以及阿尔普的七件木版画的诗集《幻想的祈祷》出版。1917 年，从 1 月到 2 月，在班霍夫街的克莱依画廊中举办了"第一次达达主义画展"。在画展的会场上，查拉作了题为"立体派"、"旧艺术与新艺术"、"今天的艺术"的三场演讲。3 月 17 日，在班霍夫街 19 号，达达画廊开业。自此之后，达达主义运动加深了与欧洲各地先锋艺术运动的交流，成为新艺术创造的"风暴中心"。

初夏　音乐指挥家奥托·克伦贝勒(Otto Klemperer，生于 1885 年)自 1914 年起在 H. 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的率领下，担任斯特拉斯堡歌剧院的指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作为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

正教授而走马上任。自从1885年以来，齐美尔一直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担任私人讲师，1900年，就任该大学的编外教授。1908年，M. 韦伯希望将齐美尔招聘至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作为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的继任者，但是由于齐美尔是“犹太人”、是“宗教相对主义者”，因此没有获得文化教育部的认可（但是原因并非如此简单，还存在着一股嫉妒齐美尔的成功的势力，同时他的人品问题是造成此种结果的最大因素。据说韦伯曾对妻子说过“如果他为人是那样的话，的确是叫人为难啊”）。克伦贝勒在柏林大学听了齐美尔的授课，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当时，慕尼黑的敦克尔·洪布洛特出版社将齐美尔在柏林授课期间所教授过的学生恩斯特·布洛赫的书稿送给他，请他判断是否可以出版。齐美尔将这份原稿——《乌托邦的精神》中与音乐史相关的部分底稿寄给了克伦贝勒，希望他读后能够帮助自己进行判断。克伦贝勒立即浏览了稿件，发现深有同感，他给齐美尔写了回信，对书稿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对克伦贝勒充满敬意的齐美尔向敦克尔·洪布洛特出版社建议出版《乌托邦的精神》一书。就这样，1918年夏，布洛赫的处女作出版了。自此以后，克伦贝勒与布洛赫成为终身的朋友。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版发行，对本世纪的人文诸学科产生了划时代影响的这本书籍是在索绪尔（1857—1913年）死后，由其学生C. 巴利（C. Bally）以及A. 薛施蔼（A. Sechehaye）



索绪尔

编撰且出版的。两人作为依据的讲义笔记是听了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的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第一次是 1908 年 1 月 16 日至 7 月 3 日、第二次为 1908 年 11 月的第一周至 1909 年 6 月 24 日、第三次是 1910 年 10 月 28 日或者 29 日至 1911 年 7 月 4 日)之后所作的课堂笔记与速记。在索绪尔去世后不到三年的短时期内就完成编撰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虽然在文献学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备之处,并且被众多语言学家排斥抗拒,但是却对以 V. 马希修斯(Vilém Mathesius)为中心的布拉格音韵学派、L. 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首的哥本哈语符学派以及 J · N. 库尔特奈(Jan Niecislaw Baudouin de Courtenay)的斯拉夫语言学派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并且催生出之后成为构造主义方法基础的新型语言学。1958 年,曾经在讲义中使用过的索绪尔的手稿被其家人发现,并捐赠给日内瓦的公共大学图书馆(BPU)。包括新发现的讲义笔记在内的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正由 R. 哥德尔(Robert Godel)以及 R. 恩格拉(Rudolf Engler)等人进行,但是与《普通语言学教程》相关的精密考证,作为今后的一个课题而留待后人解决。

9 月 11 日 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原理”。

1917

5 月 17 日夜 巴黎夏特莱剧院,俄罗斯芭蕾舞的演员们首次上演了芭蕾舞剧《游行》。原著为 J. 考克托(Jean Cocteau),音乐创作 E. 萨蒂,舞美设计 P. 毕加索,服装设计 G. 香奈儿(Gabrielle Bonheur Chanel),由 L. 马歇尼(Léonide Massine)担任编舞。G. 阿波里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在《游行》一剧的节目单中指出了这部作品的样式与立体主义方法之间的关联，他预言这种超现实主义“必将虏获那些走在时代尖端的杰出人物，它使全世界欣喜，是发现一连串令艺术与约定俗成彻底焕然一新的新精神的开端”。在舞台正面池座中的观众们纷纷抗议，认为这样的剧目与战时的巴黎格格不入，但是当在战争中负伤、头缠绷带、身穿军装的阿波里奈尔出现在首演的剧场中时，无疑有力地回击了认为《游行》一剧宣扬了非爱国主义精神的看法。聚集在这出芭蕾舞剧下的艺术家们以及前来观看了这部《游行》的观众们，共同开创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巴黎的装饰艺术时代。

5月29日 德国图林根州的劳恩斯泰因城中，在新浪漫派出版人 E. 狄特利希斯(Eugen Diederichs)的策划下，举办了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集会。第一届聚会自 5 月 29 日起至 31 日，第二届从 9 月 29 日开始到 10 月 3 日。狄特利希斯于 1896 年成立了出版社，出版了德国“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弗里德里希·哈根·克莱依斯(Friedrich Hagen Kreis)的众多关于一元论的著作，逐渐巩固了经营的基础。他对神秘主义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文化社会学者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 马克斯·韦伯的弟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所出版的书籍中包括了希腊、德国的神秘主义哲学，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集，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托尔斯泰、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人的著作集。在由狄特利希斯倡导而举行的此次集会中，作为共同主办者，F. 亚斐那留斯(Ferdinand Avenarius)率领的“丢勒同盟”、蒂宾根的“1914 年祖国协会”、以复兴教育思想家夸美纽斯(Johannes Amos Comenius)的理念为宗旨的“夸美纽斯协会”等组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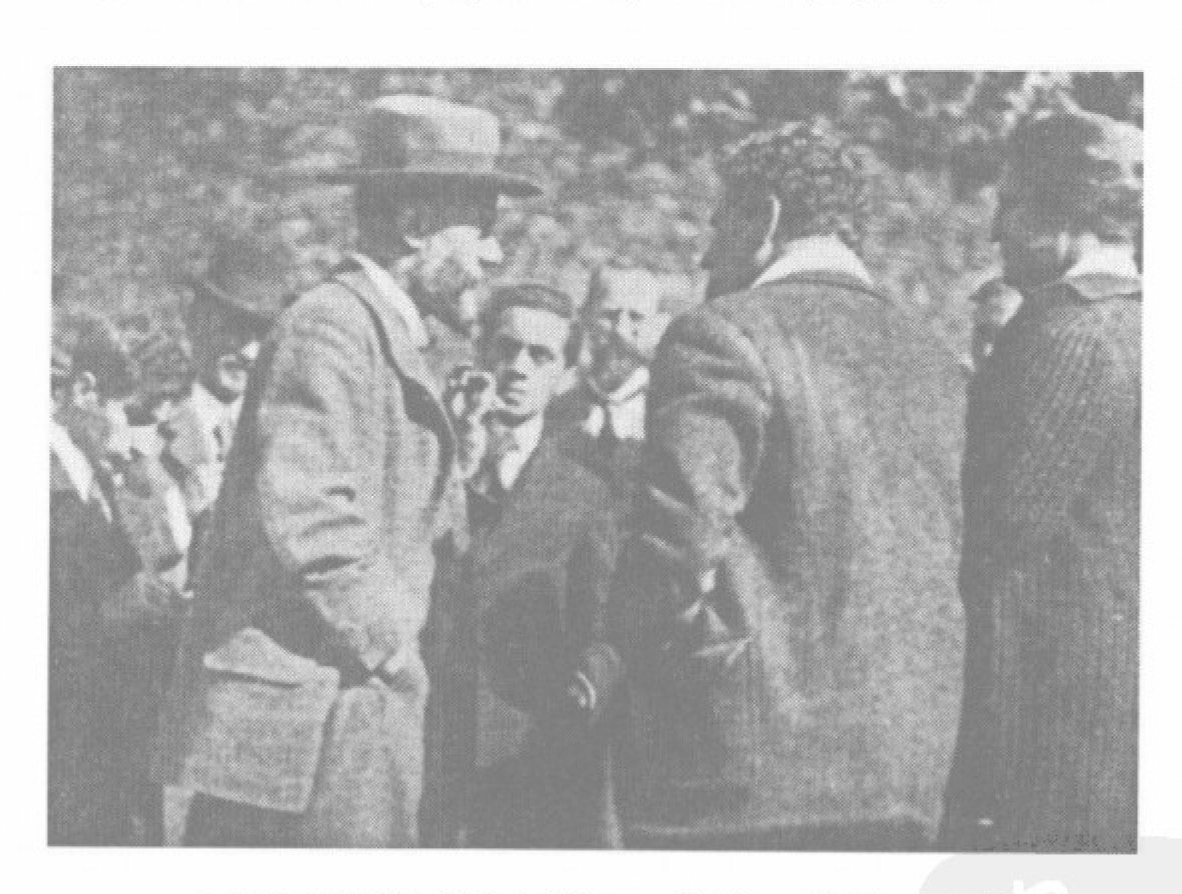
积极参与其中。在劳恩斯泰因城的集会上这些新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见到了马克斯·韦伯、克莱依斯,使得这次集会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新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与 M. 韦伯的对立与 1919 年 2 月韦伯所作的题为"作为职业的学术"、"作为职业的政治"的讲演密切相关,暗藏着显示战后魏玛共和国内政治对立原型的这一重要问题。F. 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E. 雅非(Edgar Jaffe)、W. 桑巴特(Werner Sombart)、F. 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等学者中夹杂着诗人 P. 恩斯特(P Ernst)、E. 托勒(Ernst Tollers)以及日后成为西德总统的 T. 豪斯(Theodor Heuss)等年轻人,他们同样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聚会上新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与 M. 韦伯的激烈争论。然而,战争一结束,知识分子们在政治的混乱中立刻分裂成了泾渭分明的左右两大阵营。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的《普通社会学概论》的法语版第一卷出版(第二卷于 1919 年出版)。帕雷托 1848 年出生于巴黎,是意大利流亡贵族的后裔。之后一家人移居意大利。他毕业于都灵大学数学系,又在都灵理工大学继续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在 1890 年之前,帕雷托一直在佛罗伦萨铁路公司工作,同时又积极加入历史学派经济学批判的辩论。1893 年,作为 L. 瓦尔拉斯(Walras, Marie-Esprit-Léon)的继任者,他被任命为洛桑大学法学系编外教授,翌年升任正教授,1911 年之前,帕雷托一直在该大学任职。其间的 1902 年,根据帕雷托的提案,洛桑大学新设了研究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学科。帕雷托虽然从纯粹经济学的讲义起步,但自从 1898 年将意大利的流亡社会主义者藏匿于自己家中之后,便渐渐地关注起社会主义学说。一开始他致力于研究

作为学术体系的社会主义思想，随后又将自己的学术方向转变到社会学方面。1915 年 4 月脱稿的《普通社会学概论》，堪称帕雷托的社会学研究的总结性的著作，亦是其最后的学术著作。他被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推荐为联合国军缩委员会代表，并被提名为上议院议员，1923 年 8 月 20 日去世。以前，仅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留下了“帕雷托最佳分配状态”这个概念，直到近些年，他对于社会系统论所作的贡献以及社会均衡的概念才被再次发掘研究。

3 月　俄国二月革命。

11 月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成立。



在劳恩斯泰因城中的 M. 韦伯　前排左侧。
里侧中央的青年是 E. 托勒

1918

11 月 7 日　弗拉基米尔 · 马雅可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作为纪念俄国革命一周年最为重要的活动在圣彼得堡举

行了首演[导演是梅耶荷德(Vsevolod Emilievich Meierkholid)]。于这一年的9月完成了《宗教滑稽剧》创作的马雅可夫斯基，同月27日在圣彼得堡布里克(Osip Brik)夫妇的公寓中朗读了这部作品。听众中有卢纳察尔斯基(Anitoli Vasilievich Lunacharski)、梅耶荷德以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电影、美术、音乐、戏剧、曲艺方面的各位负责人。当时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积极参与到苏维埃艺术的建设工作中去。他们一致决定上演这部《宗教滑稽剧》。在距离革命成功仅仅两个多月的极短的期间内，并且在这样一个方方面面都面临许多困难的时期，这部共产主义的戏剧顺利地完成了准备工作，在圣彼得堡高等音乐学院的音乐剧剧场进行了首演。舞美设计由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ch)负责。此次首演，虽然未必能称得上极为成功，但却成为迎来俄罗斯先锋戏剧辉煌但结局却充满悲剧色彩的艺术运动的出发点。1921年5月1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剧场举行了《宗教滑稽剧》第二版的首演。导演梅耶荷德充分发挥了其所拥有的关于即兴戏剧的知识，积极运用杂耍、曲艺中的哑剧表演等形式，成功地营造出一个令全体观众沉醉其中的集团性民众剧场的空间。



马雅可夫斯基

8月 日本向西伯利亚出兵。

11月 德国在休战协定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

秋 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在 H. 柯亨（Hermann Cohen）的弟子 F. 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的倡导下，N. 诺贝尔（N · Nobel）创立了自由犹太学院，马丁 · 布伯（Martin Buber）与 E. 施特劳斯（E · Strauss）两人同被招聘至该学院。布伯 1878 年出生于维也纳，3 岁时由于父母离婚，便和祖父所罗门 · 布伯（Solomon Buber）共同生活。祖父是一个富豪，同时也是一个在研究东欧犹太教经典《塔木德》方面非常优秀的学者，孙子布伯自幼在犹太教正统派的精神氛围中成长。1896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布伯阅读了同年出版的 T. 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著作《犹太国》之后深受感动，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是在赫茨尔突然死去（1904 年）之后，他脱离了运动，潜心钻研犹太教正统派带有神秘主义的一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不得不从学术钻研中抽身，重新关注起社会问题，并开始构思其代表作《我与你》。罗森茨威格也在这一年完成了其代表作《救赎之星》的创作。在这所学院中，布伯一方面以普通的犹太人问题为主题进行讲演，另一方面采取讲授以及共同研究的形式来处理犹太神学的各种问题。在《我与你》出版的 1923 年，布伯拒绝了虚弱多病的罗森茨威格的恳请，接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聘请，担任该大学的讲师，随后又作为名誉教授，担任了宗教学以及犹太伦理学的课程。

克鲁特 · 平托斯（Kurt Pinthus）的名为《人类的微明》的诗集出版，对德国表现主义诗歌运动进行了一个中期总结。平托斯在这部诗集的序言中这样要求到："请务必听一下在世界史上最为野性、荒凉的时代中所奏响的主旋律。"书名中的

“微明”一词包含两重意思。一方面是沉溺于这个痛苦世界所产生的没落的预感，犹如“黄昏”来临；另一方面是打破现有的道德以及社会的羁绊，获得每一个人都应具备的尊严与自由的预感，如同“黎明”，诗集共分为“堕落与疾呼”、“心灵的觉醒”、“呼唤与叛逆”、“给人类以爱”等章节，20 多位诗人的作品分别诠释了“微明”所包含的两重意味。G. 贝恩(Gottfried Benn)的《停尸房》、E. 拉斯克-舒勒(Else Lasker-Schüle)的《世界的终点》、E. 施塔德尔(Ernst Stadler)的《爱的悬崖》、G. 海姆(Georg Heym)的《死亡之时》、J・V. 霍笛斯(Jakob Van Hoddis)的《世界末日》(《人类的微明》就是以这首诗开始的)、A. 斯特兰姆 (August Stramm)的《走过黄昏》、F. 威夫(Franz Werfel)的《我们在地上都是彼此的陌生人》、G. 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灭亡》、J・R. 贝希尔(Johannes R・Becher)的《崩溃》等，读了这些收录在这部诗集中的诗便能深切地体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秩序崩溃感是如何的巨大。《西方的没落》与《人类的曙光》这两部作品被处于战后混乱状态的德国读书者竞相传阅，这充分说明了这些诗作中所蕴含的“不安与纷乱感”其实正是那个时代命运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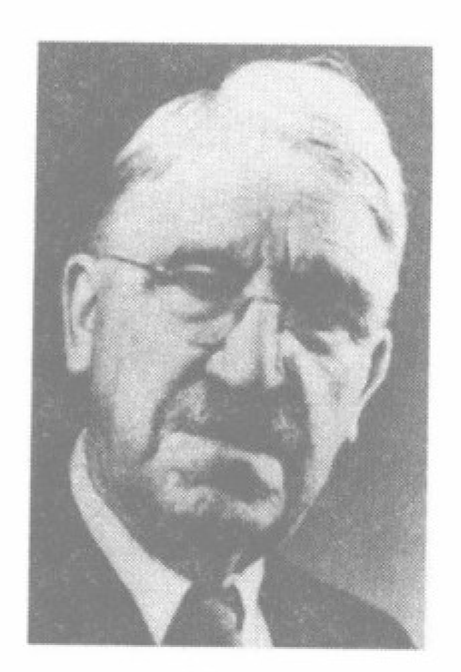
1 月　巴黎议和会议。

4 月　甘地掀起反英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20

初春(推定)　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哲学的改造》由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原型资料是其 1919 年 2 月至 3 月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中所讲授的课程。1859 年出生于美利坚合众国佛蒙特州的杜威，1894 年就任芝

加哥大学教授(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首席教授),1903 年编撰了题为"逻辑学理论的研究"一书,进一步明确了以他为中心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1910 年,随着 W. 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辞世,杜威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思想家。1922 年,他的《人性与行为》一书出版,1925 年出版了《经验和自然》一书,1929 年又出版了《追求确实性》一书,从他一系列相继面世的著作可以得知,《哲学的改造》一书精炼地归纳了杜威成熟期的思想,是一部堪称高瞻远瞩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籍。杜威高度评价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他认为人是一个有机体,把世界看作是这种有机体居住的环境,人类的思维以及逻辑等等的活动也无非都是有机体对于这个环境的适应。从这种观点出发,《哲学的改造》一书中,对于一直以来的哲学都将其作为目标的思考方法进行了再研究。杜威采用了浅显易懂的语调来讲述自己的思想观念,与德国的讲坛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存在必定有其意义与价值。虽然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日渐盛行,实用主义哲学本身的影响渐渐衰退,但是时至今日,在 R. 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和自然之镜》等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杜威的思考模式被悄然无声地继承了下来。



杜威

4 月 14 日 位于德国魏玛的包豪斯学院举办了第一次"包豪斯晚会"。1908 年加入 P. 贝伦斯(Peter Behrens)事务所的沃尔特 · 格罗佩斯(Walter Adolph Georg Gropius,生于

1883 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发表了若干论文,尝试将工业建筑与现代主义设计相结合。1914 年 7 月,魏玛宫廷内阁发出通告,决定在翌年 10 月 1 日任期期满之后,解除凡·德·威尔德的工艺美术学校校长之职。伴随着他的离职,格罗佩斯向魏玛宫廷呼吁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工艺美术学校与美术大学合并,建设一所全新的、培养综合性造型艺术家的学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在柏林成立了艺术家协会,格罗佩斯担任会长。1919 年 3 月 20 日,魏玛美术大学教授会批准了将学校更名为"包豪斯"以及任命格罗佩斯为校长的提案,并向临时共和国政府提出申请。4 月 25 日,学校工作启动,5 月 22 日,马科斯·泰蒂(Max Thedy)、W. 库勒姆(Wilhelm Klemm)、R. 恩格尔曼(Richard Enlgelmann)、O. 夫洛里希(O. Fröhlich)、L. 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J. 伊登(Johannes Itten)等人正式就任教授。就这样,现代主义设计的综合性教育设施"包豪斯"诞生了。伊登围绕教育的指导方针与格罗佩斯产生了激烈的对立,于 1923 年 3 月离开了包豪斯。1921 年 1 月 P. 克利(Paul Klee)、1922 年 6 月 W. 康定斯基、1923 年 4 月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陆续加入学院,包豪斯成为拥有众多一流艺术家讲师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中心地。1925 年 11 月,学校迁往德骚市。直至 1933 年纳粹政权上台,包豪斯不仅在教育活动领域,对于现代艺术的启蒙也一直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1921—1930

装饰主义风格时代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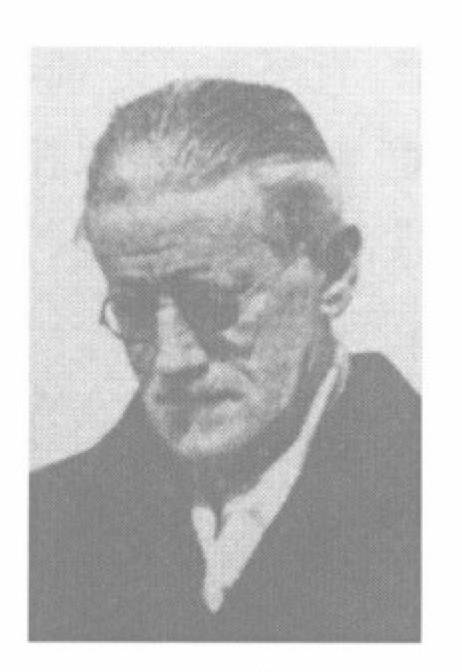
1921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布拉格发表了《俄罗斯最新诗歌》一文。1915 年创建的、以雅各布森和鲍加特廖夫为中心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以及翌年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amuilovich Shklovsky)与艾亨巴乌姆(Boris Michailovich Eichenbaum)等彼得格勒的学生们创立的"诗语研究会"成为俄罗斯形式主义批评文学的开端。雅各布森1896 年出生于莫斯科,在拉扎列夫东亚语研究所学习之后进入莫斯科大学继续深造,从事俄罗斯周边地区的方言以及民俗学的研究。1920 年,就任莫斯科高等戏剧学院的音韵学教授,同年移居布拉格。《俄罗斯最新诗歌》一文标注的创作日期为"莫斯科 1919 年 5 月",由此可见,与什克洛夫斯基的《作为方法的艺术》(1917 年彼得格勒)一文相同,这是一篇表明俄罗斯形式主义批评基本立场的论文。雅各布森在文中旗帜鲜明地主张诗歌语言的存在权,他这样写道:"所谓诗歌就是发挥美的功能的语言。因此,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换而言之就是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如果希望使文学科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那么就必须承认'技法'是自己唯一的'主人公'。"形式主义者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宣言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引起一片哗然,并纷纷发表反对意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L. 托洛茨基所写的《诗歌的形式派与马克思主义》(收录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但是,托洛茨基的批判在某些方面对形式主义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与之后一年斯大林派所作出的全面否定的评价有着根本的不同。

1922

2月2日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的著作《尤利西斯》由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出版。当天正是乔伊斯40岁的生日。莎士比亚书店的经营者西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是一位女性,1887年出生于美国巴尔地摩市。1919年11月19日当她第二次来到巴黎时,得到了位于巴黎第六区奥德昂大街七号的书店的经营者A. 莫涅(A. Maunier)的帮助,在附近的杜佩特伦大街八号开设了一家专营美国读物的书店。在1940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之前,这家书店一直是当地重要的文学沙龙之一,这就是莎士比亚书店的起源。在当时的巴黎,价格低廉的英美作家的书籍还很少见,因此,比起出售书籍,租借书籍的商店更容易经营。莫涅与毕奇的书店中可谓往来无白丁,A. 纪德、P. 瓦雷里、V. 拉尔博(Valery Larbaud)等法国作家以及G. 斯坦因 (Gertrude Stein)、E. 庞德、T·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乔伊斯和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E.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S. 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S. 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E. 威尔逊(Edmund Wilson)等都是书店中的常客。1920年夏,在某个派对中结识了乔伊斯的毕奇得知在一家名为"The Little Review"的美国杂志上连载的《尤利西斯》被美国有关部门指控为淫秽读物,因此不能公开出版发行,便决定促成《尤利西斯》在法国的出版。于是,毕琪与印刷过J·K. 于斯曼等作家著作的第戎的一家印刷厂老板达朗第埃(Maurice Darantiere)进行了商洽,决定出版此书。限定印刷1 000册,其中100册采用荷兰纸印刷、署著者名、定价350法郎,150册采用加入水印的阿诗水彩纸印

刷、定价为250法郎，剩下的750册采用普通纸张印刷、定价为150法郎。其中特别选定两册作为乔伊斯的生日礼物，2月2日被送往毕奇处。同年创刊的季刊诗歌杂志《标准》刊登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



乔伊斯

夏 德国图林根州的伊尔梅瑙，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研讨周"。引用曾经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创立倾尽全力的弗里克斯·韦尔(Felix Weil)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如果给予大家共同彻底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各种潮流的机会，就有希望能够实现'真正的'乃至'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集会。主要的与会者包括乔治·卢卡奇(Georg Bernhard Lukács Von Szegedin)、卡尔·柯尔施夫妇(Karl Korsch)、理查德·佐尔格夫妇(Richard Sorge)、卡尔·奥古斯塔·魏特夫夫妇(Karl August Wittfogel)、弗里克斯·韦尔夫妇、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等人。这周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柯尔施尚未完成的作品《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12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1923

春 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由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出版发行。1918年年末，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的卢卡奇就任3月成立的B.贝拉(Kun Bela)的革命评议会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五红军师团的政治委员。在革命政府被推翻

后，直至9月之前他一直从事地下活动，10月在维也纳被逮捕。但是由于以托马斯·曼兄弟为首的十一名社会知名人士联合署名呼吁进行“救援卢卡奇”，他在12月末被释放。《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是从卢卡奇自1919年6月开始到1922年年末所写的众多论文中选出了六篇，又专门新创作了两篇成为该书理论核心的论文(《物象化与无产阶级的意识》、《组织问题的方法论》)，然后将其结集成册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将这部著作视为“主观主义的极左冒险主义”，对其进行了集中批判，然而E.布洛赫、K.柯尔施等人也对其进行了善意的批评。从这部著作公开发行之日起，直到现代，它始终是占据“欧洲马克思主义”经典位置的重要书籍。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们也正是通过阅读这部《历史与阶级意识》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的发展。稍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W.本雅明在专栏“活下来的书”(1929年5月17日)中曾经这样写道：“(《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哲学的危机状况中把握住了阶级斗争的危机状况，在时机已经到来的具体革命中把握住了理论认识的绝对前提，不！绝非仅限于此，它的独特性更在于把握住绝对实现与最终语言之时的那种确信无疑。在德波林(Deborin，Abram Moiseevich)的指导下，共产党当局对这部著作所进行的公开的指责与驳斥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部著作的影响之深远广大。”



卢卡奇

1924

年初　18岁的犹太裔女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从加里宁格勒来到了马尔堡大学。她是为了跟随R·K. 蒲尔脱曼(Rudolf Karl Bultmann)学习神学、向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学习哲学才来此升学的。根据E. 杨·布洛赫(Elisabeth Young-Bruehl)以及E. 爱丁格(Elzbieta Ettinger)等人的研究,能够逐渐明了当时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关系,可以确信的是他们之间并非是单纯的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海德格尔之后向妻子艾尔芙丽德(Elfride Petri)坦言马尔堡大学时代"燃起了我对生命的热情",这并非仅仅是通常研究史上所说的在那段时间他完成了《存在与时间》一书的雏形,其中还包含着他与阿伦特之间如火如荼的爱情。而阿伦特之后回想起马尔堡大学时代,将其视为自己"与哲学之间的初恋",这里所说的"哲学"毫无疑问指的正是海德格尔。1925年夏,阿伦特从加里宁格勒的家中将自己的一副肖像画寄给了海德格尔,画上写下了一个谜一般的词语"影子(Schatten)"。这也许是两人分手的纪念品吧。杨·布洛赫所引用的当时阿伦特的诗作也充分表现出她浪漫眷恋的思念以及对老师海德格尔思想的憧憬和崇敬。之后,阿伦特在弗赖堡大学胡塞尔的指导下学习了一个学期,自1926年之后跟随海德堡大学的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学习并获得学位。学位论文的题目为"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思想中的爱的概念——尝试以哲学进行解释"。

6月14日　法国,由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领导的激进社会党政府成立。在5月11日的总选举中,左翼联合(社会党与激进社会党)获得了胜利,因此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首相于 6 月 1 日宣布辞职，对德的强硬报复政策至此打上了终止符。在赫里欧的领导下就任外交部长的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期望实现与魏玛共和国的和平共处。赫里欧的任期可谓相当短暂，但却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文化艺术领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与变化。曾经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被左拉的名篇《我、弹劾》感动激励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们陆续回到巴黎，纷纷站在了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以及公立中等学校的讲台上。阿兰(Alain)、蒂波德(Albert Thibaudet)等人的唯理论批评、诗人瓦列里(Ambroise-Paul-Toussaint-Jules Valéry)向文学的复归，这些都呈现出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好年代中度过自己青春的知识分子们再度结集的景象。蒂波德在其所著的《教授们的共和国》一书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触描写了这一现象。也可以认为之后法国人民战线政府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11 月　托马斯·曼的《魔山》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发行。对于托马斯而言，继他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家族》之后，1912 年他又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魔山》。托马斯与哥哥亨利希·曼(Luiz Heinrich Mann)在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上有着严重分歧，因此 1915 年夏他中断了《魔山》的创作，开始撰写长篇评论《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1919 年完成《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后，他继续《魔山》的创作，终于在 1924 年 9 月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在这 12 年期间，T. 曼的政治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战时所思》中他对于 1914 年 7 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持欢迎态度、在《腓特烈与大同盟》中他积极评价以坚韧的决断力突破强国对

普鲁士的包围圈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Be),这些作品作为"文化国度德意志"对于"文明国度"的一种抵抗,热情地赞美了战争。但是,《战时所思》受到了 H. 黑塞(hermann hesse)以及 R. 罗兰(Romain Rolland)等人激烈的谴责。这引起了 T. 曼思想上的动摇,在并无具体目标、不知何时完成的状态下,开始撰写《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这部气势宏大的论文被形容成为"军舰上的苦役",采用宏大的结构形式归纳了近代德国残酷的历史命运,堪称鸿篇巨制。T. 曼撰写了这部自我反省的作品,与哥哥握手言和,并开始对民主主义进行积极的评价,对于刚刚诞生的魏玛共和国也报以支持的态度。《魔山》的故事背景在大战前就已经被设定,年轻的主人公在达沃斯山庄的肺结核疗养院中,被启蒙精神与恶魔主义的化身所包围,渐渐意识到人类精神的真实现状。作品虽然采用了教育小说的结构框架,但却希望彻底描写出现代思想状况的全景立体图,是一部充满雄心壮志的巨著。然而,《魔山》向人们所提示的警告并未发生作用,魏玛共和国最终被纳粹主义这个巨大的、非理性的漩涡所吞噬。

1月 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

5月 美国全面禁止日本人移民。

1925

4月29日 在巴黎举办了"现代装饰·工业美术国际展览会"。这次展览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令全世界都了解了装饰主义风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艺术事件。原本计划于1915年举办的这次展览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举办期延迟了整整十年。而且,它虽然冠名为"国际",却没有邀

请德国参展，而美利坚合众国则拒绝了邀请，英国也只是小规模参展。结果，包豪斯的现代设计并未令展馆的气氛热烈起来。然而，从新艺术运动时代开始就非常活跃的P. 佛洛(Paul Foro)、M. 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以及雕刻家阿曼德·艾伯特(Armand-Albert Rateau)等人创作出深受"新艺术风格"设计影响的"装饰艺术"风格，让人们感受到似乎再次置身于"美好年代"。R. 拉利克(René Lalique)的水晶工艺品、塔身装点着由华美闪烁的霓虹灯组成的雪铁龙字样的艾菲尔铁塔、P. 波烈(Paul Poiret)停泊在塞纳河上的三艘分别名为"爱"、"欢喜"、"风琴"的船，这些都将国际展览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但是这次展览会最闪亮的明星当数香奈儿(Gabrielle Bonheur Chanel)。她凭借着自己设计的知名黑色丝绸晚礼服以及散发出微妙香氛、被称为"香奈儿五号"的香水，俨然成为法国时尚界的女王。此外，9 月 30 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的"黑人说唱表演"拉开了帷幕。她以几乎全裸的身体跳起了查尔斯登舞蹈，令观众异常兴奋，贝克在巴黎极具冲击性的初次登台，传遍了整个欧洲。



香奈儿

1 月　苏联，托洛茨基下台。

2 月　德国，纳粹党再建。

1926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巴黎的土包子》出版发

行。这部小说对于阿拉贡而言是作为末期超现实主义者的散文之一。1924年安德烈·布勒东就已经在其采用自动记述的方法创作的长篇散文诗《可溶解的鱼》的卷末附上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并由西蒙·库拉出版社出版。在书中，布勒东将超现实主义定义为"是心中纯粹的自发现象……消除了一切由理性进行的控制、在一切审美或者道德顾虑的范围之外进行的、思考的口述笔记"。1920年，与来到巴黎的T.查拉一起开展达达运动的布勒东，翌年就与查拉分道扬镳，开始摸索自身的文学运动之路，而他的最初成果就是这篇《超现实主义宣言》。《巴黎的土包子》以及布勒东的《娜嘉》(1928年)，以巴黎这个大都市为舞台，采用了当时毕加索、布拉克的绘画作品中所使用的拼贴手法，构建起一个非日常的、梦幻般的世界。特别是《巴黎的土包子》一书，描绘了由于要拓宽奥斯曼大街而被拆除的"歌剧院拱廊街"，令人印象深刻。在充斥着住宿便宜的小旅馆、价廉物美的餐厅、邮票商店、书店的冷冷清清的拱廊街上生活着一群营营役役的小人物，其中有理发师、妓女、店员、看门人，作者用枯燥无味的自动记述的笔致描述了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这部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居住在巴黎这个大都市中所经历的神话般的印象。《巴黎的土包子》、《娜嘉》堪称领先于J.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USA*(1930—1936年)以及A.多勃林斯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年)、以现代都市为主人公的、充满前卫感的"反小说"。

1927

从夏至秋 瓦尔特·本雅明旅居巴黎。本雅明在前一年

的 3 月起，也曾在巴黎逗留数月，撰写了格言集《单行道》的中心部分，但是此次在巴黎的逗留对于本雅明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阅读了阿拉贡的《巴黎的土包子》一书，此书对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本雅明一生最后十年中最大的创作《巴黎拱廊街》的构想，正是由于与阿拉贡的这部作品相逢而产生的。1982 年，才得以出版发行的《巴黎拱廊街》的遗稿第一部分，也正是从 1927 年的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当时曾考虑将该书名为“巴黎的拱廊街。辩证法的精灵的国度”。当初，在本雅明的构思中是希望将这部作品作为《单行道》的具体化文本，他生前未能完成书稿，遗留下数量庞大、堆积如山的草稿。“为了能够从根本上理解拱廊街，我们必须将它沉入梦境的最深处。”本雅明如此写道，他在《十九世纪的首都——巴黎》发现了中产阶级的梦想的原型。希望将超现实主义所追求的“梦境的自动记述的方法”运用到“巴黎神话般的寓言”中去，进行这项伟大尝试的本雅明虽然只留下了空具框架的未完之作，但是其中关于十九世纪的首都巴黎的众多引用文尖锐地反映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矛盾。《巴黎拱廊街》的草稿由于都是片断性的文稿，因此毫无疑问它是作为二十世纪的遗言转交给二十一世纪的书籍中最具分量的一部。它采用引用文拼贴的形式表现出二十世纪一直想要超越却无法超越的十九世纪神话般的面貌。该如何解读这部巨著，是留待今后解决的课题。



本雅明

12 月 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发表了测不准

原理。

1928

3月 L·E·J. 布劳威尔(Luitzen Egbertus Jan Brouwer)在维也纳作了题为"数学、科学、语言"的演讲。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友人魏斯曼(Waismann)、费格尔(Herbert Feigl)一起聆听了此次演讲。1899年出生于维也纳的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之后却远赴英国跟随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以及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学习哲学与逻辑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志愿兵加入了奥地利军队,一边服兵役一边撰写关于哲学与逻辑学的、具有彻底批判性的研究论文。这就是《逻辑哲学论》(1922年)。从战场上回归的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哲学探究的道路,先后从事过小学教师、修道院的园丁、建筑师等职业。在布劳威尔的演讲结束之后,维特根斯坦与魏斯曼、费格尔3人在一家咖啡店中围绕着对于这次演讲的评价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讨论。费格尔这样形容维特根斯坦当时的样子:"那天夜里,我亲眼看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彻底改变了维特根斯坦。……他一改常态地高谈阔论,并且开始谈论成为他后期著述开端的主要构想……那个夜晚记录下了维特根斯坦是如何重新燃起对哲学的超乎寻常的兴趣与关心。"费格尔的陈述稍显夸张,其实维特根斯坦在弗兰克·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的论文中早已得知布劳威尔的名字。这篇论文是以1925年11月拉姆齐在伦敦数学学会所作的演讲《数学的基础》为蓝本所撰写的。1929年,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大学,开始了形成他后期哲

学观的研究生活。

1929

在布拉格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言学会议。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布拉格学派创办了自己的会刊，并在第一期上刊登了有名的《论纲》。在之前的一年，形式主义学者们发表了由提尼亚诺夫（Yury Tynianov）和雅各布森执笔的《文学研究、语言研究的诸问题》（《新列夫》杂志），对于日内瓦学派确立"语言"和"言语"的概念进行了评价，并提出复兴诗歌语言研究会，将其作为一个积极引进语言研究，并进行集体讨论的场所。在同年于海牙召开的国际语言会议上，布拉格学派也与日内瓦学派的成员交流了各自的意见。以这些国际交流的成果为基础，由雅各布森、马泰修斯（Vilem Mathesius）以及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等人组成的《论纲》编写委员会经历了一个多月反复的讨论，完成了《布拉格语言学派论纲》。这篇纲领从斯拉夫语研究的视点出发，由十大项组成。其为首的三项属于一般性纲领，它强调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将语言的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的关系作为问题的关键，将构造主义思考的程序具体化，继承了特鲁别兹科伊（Nikolai Sergeevich Trubetzkoy）的理论观点，构建了音位体系的结构原理。这篇《布拉格语言学派论纲》大胆尝试以结构上共同的公分母去把握之前被划分为"诗歌语言"、"情绪语言"、"使用语言"的语言活动。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当结构主义思想在整个欧洲全面复活之时，人们又重新开始评价布拉格语言学派所提出的构想。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海特（Alfred North Whitehead）

的《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出版。以在爱丁堡大学的吉福德讲座为基础的这部巨著，出版时间介于《象征作用》(1927年)与《观念的冒险》(1933年)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默默无闻、很少受到关注。再加上页码标注不一、开本各异的美国版(麦克米伦版)与英国版(剑桥版)中有超过三百处的不一致，这也是导致此书乏人问津的原因之一。直到1978年，由D·R. 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与D·W. 舍尔伯恩(Donald W. Sherburne)两人进行了严密的文本的比较对照，新版的《过程与实在》终于出版发行了。自六十年代起，到《过程与实在》新版本出版的这一时期，是对怀海特的哲学体系进行重新评价的时代。特别是包括了宏大的宇宙论、有机体论假说的《过程与实在》，由于严密的校订版的出现，而得以重新被定位。正如怀海特自己在晚年的对话中所回想起的那样，这部作品的开始部分所言及的、应该被否认的流行哲学的九个习惯，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2月 苏联，斯大林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8月 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发生流血冲突。

10月 华尔街股市大崩溃。(黑色星期四)

1930

9月5日—7日 德国哥尼斯堡召开了关于数学基础理论的国际数学家会议。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R. 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J·V. 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A. 海廷(Arend Heyting)3人陈述了各自的观点。他们报告的内容被收录在《认识》(维也纳学派的会刊)杂志的第二期上。没有出席此次会议的维特根斯

坦向魏斯曼口述了不同于与会3人的第四种观点(《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在3人做完报告之后的讨论中，于翌年发表了第一不完备定理的哥德尔(Kurt Gödel)表现得相当活跃。

9月 德国大选中希特勒的纳粹党大获全胜。



1931—1940

现象学热潮，以及其后的托洛茨基暗杀事件





1931

1月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正式被任命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社会研究所是由主办了伊尔梅瑙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会(1922年夏)的F.韦尔，以其父H.韦尔(Hermann Weil)所设立的基金为基础，设置于法兰克福大学内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自1923年2月3日创立之日起，F.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以及霍克海默就一直致力于该研究所的运营。1929年，第一任所长C.格林伯格(Carl Grunberg)出于健康上的理由辞去了所长职务。同年，霍克海默继任所长之职，并接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邀请，主办新设的“社会哲学”讲座。在1月的就任仪式上，霍克海默作了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讲。他将社会哲学的目标定为“对于作为社会一员的人的命运作出的哲学解释”，首先关注看似与社会并无直接关系的思想体系领域的社会哲学的相关方面，对于黑格尔忽视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霍克海默认为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导致了在现代，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人们的生活中都无法看见个人与社会全体的关系，因此现在必须实现的是哲学理论与最先进的个别科学之间的辩证的相互渗透(跨学科合作)。他将此种“跨学科唯物论”的目标定位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以及其中个人心理、精神的变化，文化领域(科学、艺术、宗教、娱乐、生活样式等)中的变化——对于这三种变化之间相互关联的分析。并且将这一目标瞄准某个特定时代中特定的社会群体，希望在不久之后可以实现国际范围内的比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所谓的左翼运动有着云泥之别，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自1932年起，霍克海默创办了杂志《社会研究》，

以此作为发表该研究所成果的阵地。同时，对于德国纳粹主义日渐扩张的影响力忧心忡忡的研究所的成员们，在日内瓦设立了研究所的分所，以防日后也许不得不面临流亡的命运，并将研究所的基金秘密转移至荷兰，站在当时的立场来看，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极为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结果，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研究所依然能够维持正常运作，而《社会研究》杂志直至 1941 年，在霍克海默的流亡地美国仍能继续出版发行。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出现了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复兴运动。

1932

夏（推定） 让·保罗·萨特听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工作的友人雷蒙·阿隆的讲述，从而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萨特在勒·阿弗尔的高等中学担任哲学教授之职。而阿隆正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一边准备撰写与历史相关的论文，一边研究胡塞尔的学说。据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回忆，某个黄昏，萨特与波伏娃围坐在刚从柏林回来的阿隆身边，3 人促膝而谈。地点是蒙巴纳斯大街上的双偶咖啡馆。3 人都点了该店的招牌饮料——杏子口味的鸡尾酒。手指着侍者端上来的杯子，阿隆说道："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者，关于这杯鸡尾酒你就能够进行解析描述。那就是哲学。"萨特闻言激动得脸色苍白。阿隆所说的内容与萨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期望实现的不谋而合。能够"依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认识事物"，这正是萨特梦寐以求的哲学。"超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同时肯定意识的绝对性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存世界，这只有通过现

象学的方法才能实现”，阿隆如是说。萨特立刻在圣米歇尔大街上购买了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撰写的《胡塞尔的直观性理论》(1930 年)，并开始阅读，但是列维纳斯关于胡塞尔思想体系中偶然性的叙述无法满足萨特。萨特决定作为阿隆的后任，从这一年的秋季开始前往柏林的法兰西学院学习一年，对于现象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在柏林学习的期间，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萨特曾经拜访过居住在弗赖堡的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不过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在柏林期间萨特学习了胡塞尔的著作《观念》，并开始撰写《自我的超越性》一书。

5 月 纳粹党成为德国的第一大政党。

11 月 《唯物论研究》创刊(—1938 年 3 月)。

1933

1 月 巴黎的高等研究院，亚历山大·科耶夫开始讲授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课程。1902 年出生于莫斯科的科耶夫由于俄国革命而不得不与家人一起远离故土。但是对科耶夫而言，这一段流亡生活令他对马克思主义乃至黑格尔哲学有了批判性的认识。他在海德堡大学跟随 H. 李凯尔特学习，然而在他最为关心的黑格尔哲学方面，李凯尔特并不能给予充分的指导。无可奈何的科耶夫最终在 K. 雅斯培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俄罗斯世纪末的神秘主义思想家 V·S. 索洛维耶夫的论文，并获得学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移居到法国的科耶夫才正式开始了对黑格尔的研究。当时，科耶夫在胡塞尔的指导下学习现象学，后者同样出生于俄罗斯(1892 年)，并在索邦大学的研究所遇见了正致力于酝酿“黑格尔复兴运动”的

亚历山大·科亚雷。科亚雷之后成为一名科学思想史家，当时他对于J. 伯麦(Jakob Böhme)的神秘主义思想极为关注。1932年，反映黑格尔初期哲学思想的《耶拿实在哲学》的手稿出版，翌年关于初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公开发行。科亚雷立刻将视线投注到这方面，发表了利用现象学方法来分析《耶拿实在哲学》手稿中所发现的关于人类存在问题的论文。对科亚雷的观点深有同感的科耶夫将着眼点放在初期黑格尔与初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相近性上，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的影响下，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了独立的解释。在科耶夫一直持续到1939年的课堂上，汇聚了R. 阿隆、G. 巴塔耶、P. 克罗索夫斯基、J. 华尔、J. 拉康、M·梅洛·庞蒂、A. 布勒东、R. 格诺(Raymond Queneau)、R. 凯洛依斯、J. 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等众多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思想体系的学生。科耶夫的讲义由格诺进行了编辑，并公开出版发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科耶夫，对于欧洲经济的重建极为关心，专心致力于欧共体的前身——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的实际事务。

4月7日 纳粹德国施行了针对犹太裔公务员的《重振职业公务员法》。此项法律规定对于德国的非雅利安裔公务员进行强制性的停职处分。自从1月末掌握政权之后，纳粹党有组织地采取了一系列扑灭反对势力的举措。这部法律也是打击、抑制反对派的一环。其结果造成了众多德国知识分子流亡至英美国家。这一现象被称为“二十世纪文化大迁移”，令德语地区产生了巨大的知识文化的空白，同时一举提升了英美地区的科学文化水平。“知识分子的迁移”波及学术方面的所有领域，特别是在美利坚合众国，以在当地发展的经验科

学方法为基础的诸科学，通过与德国科学界的交融，发展成为更进一层的高级综合科学。以 K. 勒温（Kurt Lewin）为中心的拓扑社会心理学、K. 考夫卡（Kurt Koffka）等人对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认知理论所产生的影响、众多精神分析家的流亡所造成的社会精神医学的进步、以 R · V. 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J.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为首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带来的经济学革新、F. 诺伊曼（Franz Neumann）以及 H.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等学者对于政治学方法的重新审视、L. 施皮泽（Leo Spitzer）、E. 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R. 雅各布森、W. 耶格尔（Werner Wilhelm Jaeger）等人令语言学、人文科学的研究水平实现了飞跃性的提高、以 R. 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接触、A. 舒茨（Alfred Schutz）等现象学派学者在研究领域异常活跃，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这些人文科学领域，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众多研究者也来到了美国，德语地区的学术研究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其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学术领域美国一直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夏 第一届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在瑞士马乔雷湖畔、阿斯科纳的加布里埃拉公馆中举行。此次会议的创办人是 O. 弗勒贝-卡普泰恩（Olga Froebe-Kapteyn，1881 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荷兰人家庭）。“爱诺思”在希腊语中意为参加者能够陈述各自看法意见的盛宴，宗教学者 R. 奥托（Rudolf Otto）以此为会议命名。卡普泰恩希望组织一个汇集东西方才智的对话场所。爱诺思圆桌研讨会的第一位嘉宾是她最为尊敬的心理学家——C · G. 荣格（Carl Gustav Jung）。荣格在第一次会

议上做了题为“个体化过程的经验”的演讲，明确了此次研讨会的指导思想。此次会议将心理学、生物学、神话学、宗教学等领域的各种见解综合起来，追溯生命一有机体产生的根源，是一次充满雄心壮志的研究集会。将每年一次的会议所获得的成果集结成册，作为年刊发行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讨会依然继续举办，与会者的名单中 M. 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E. 本茨（Ernst Benz）、K. 凯伦依（Karl Kerenyi）、H. 科尔班（H Corbin）、G · V. 范德立乌（Gerardus Van der Leeuw）、L. 拜克（Leo Baeck）、G. 舒勒姆（Gershom Scholem）、E. 诺伊曼（Erich Neumann）、A. 波尔特曼（Adolf Portmann）、L · V. 德 · 普司特(Laurens Van Der Post)、J. 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等各领域中一流学者的名字赫然在目。1940 年，M. 梅隆(Mary Mellon、出生于 1904 年，美国匹兹堡的大富豪)参观了荣格在苏黎世郊外所建的“波林根塔楼”，不久之后她成立了波林根基金会，为爱诺斯研讨提供了雄厚的财政基础。同时该基金会还向将包括荣格自身的著作在内的、荣格派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到英语圈的《波林根系列丛书》提供经费。可以说正是通过了爱诺思研讨会以及《波林根系列丛书》才能使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神秘主义潮流具备了学术形态。

秋 汉堡大学的瓦尔堡文库迁往伦敦。出生于 1866 年的阿比 · 瓦尔堡是一位犹太银行家的长子，先后在波恩大学以及慕尼黑大学学习，1891 年年末完成了关于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学位论文，1897 年秋移居佛罗伦萨，正式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研究。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瓦尔堡把家族事业转让给弟弟经营，为了研究文艺复兴时期

的美术，他决心建立一个庞大的文库。据说之后担任瓦尔堡研究所所长的 E · H. 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在 1911 年第一次看到这座文库的时候，库内已有一万五千余册藏书。这些书籍中包括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隐身于美术背后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占星术、炼金术、犹太神秘哲学文献等等，可谓包罗万象。贡布里希说服了瓦尔堡将这些史料公开，并提议在汉堡市成立研究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汉堡大学的认可，文库成为该大学的设施。据说曾任该校校长的 E. 卡西尔(Ernst Cassirer)对于瓦尔堡藏书之丰富也叹为观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研究所发行了年刊讲演集以及研究丛书，并培养出众多研究者。1926 年，能容纳十二万册藏书的大型建筑物竣工。瓦尔堡于 1929 年去世，但研究所的活动依然正常开展。然而，1933 年 1 月纳粹掌握了政权，预想到在德国有可能无法保障文库的安全，因此，自 1928 年以来一直在文库内工作的员工E. 文(Edgar Wind)将瓦尔堡的收藏转移到了伦敦。就这样，包括大量珍贵文献在内的文库从被纳粹主义阴云笼罩的德国平安无事地转移到了英国。1936 年，文库中的书籍被正式收藏在设置于伦敦大学的研究所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瓦尔堡学派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免于遗失、焚毁命运的研究所的史料可谓功不可没。

1 月　希特勒就任德国首相。

3 月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3 月　美国，富兰克林 ·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就任总统，实行“新政”。

10 月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PDG

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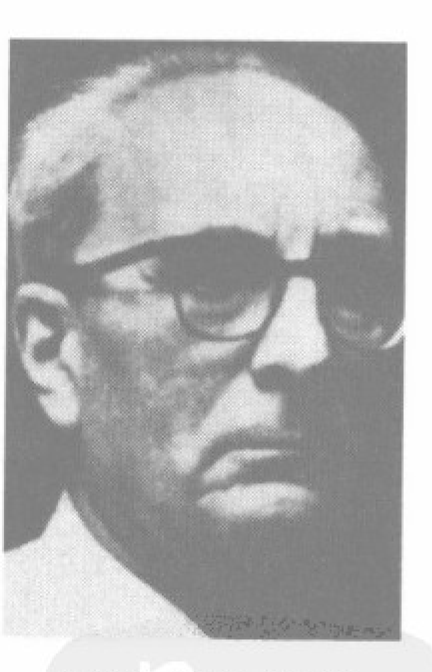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出版发行。1863 年,米德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师家庭。1888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和生理心理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听了 W. 冯特(Wilhelm Wundt)的讲课,并在柏林大学聆听了W.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H. 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F. 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G·V. 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等学者的课程。狄尔泰人文科学的倾向与艾宾浩斯自然科学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对米德之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劳动运动以及黑格尔生命论等对米德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1891 年,应密歇根大学之邀,他成为该校的讲师,并在那里结识了 J. 杜威(John Dewey),两人成为终身的好友兼同僚。1894 年,米德与杜威一同前往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任教。在新移民数量急剧增长的芝加哥,米德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保守反动势力的恶浪涌入了芝加哥大学,由于学校内部的对立令身为哲学系主任的米德不得不每日忙于繁重的事务而身心俱疲,1931 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米德生前未曾留下任何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也是由 C·W. 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根据米德的讲课记录(速记以及学生的笔记)整理出版的。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不同于 J·B. 华生(John B. Watson)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忽视意识的内部过程),他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符号操作。当时由于“文化大迁移”,美国社会心理学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而米德著名的自我结构论、I 与 Me 的动态关

系、Me 的社会规范控制 I 的冲动的所谓交往论等论说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现象学派的 A. 舒茨等人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深受米德思想的影响。J.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1981 年)在第一章“从目的行为到交往行为”中也专门介绍了米德以及迪尔凯姆的学术观点。

10 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开始了万里长征。

1935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受到当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校长塞莱斯坦·布格勒(Célestin Bouglé)的启发，前往巴西新建的圣保罗大学就任社会学教授。此前一年，在法国东北部拉昂高中教授哲学的列维·斯特劳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雷蒙·罗维(Raymond Loewy)的作品《原始社会》，对民族学以及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列维·斯特劳斯利用大学的休假，首先对卡都卫欧族以及波洛洛族的土著社会进行了为期三到四个月的考察，翌年他相继发表了使用葡萄牙语撰写的论文《波洛洛族对于印第安社会组织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在被文明化的野人族群中》。1936 年，列维·斯特劳斯离开了大学，耗时一年，对南比克瓦拉以及吐比克瓦希族等巴西西北部的原始部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研究。归国之后的列维·斯特劳斯服了兵役，在法国战败后，前往美国，通过罗维的斡旋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从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1942 年，他结识了流亡至美国的 R. 雅各



列维-斯特劳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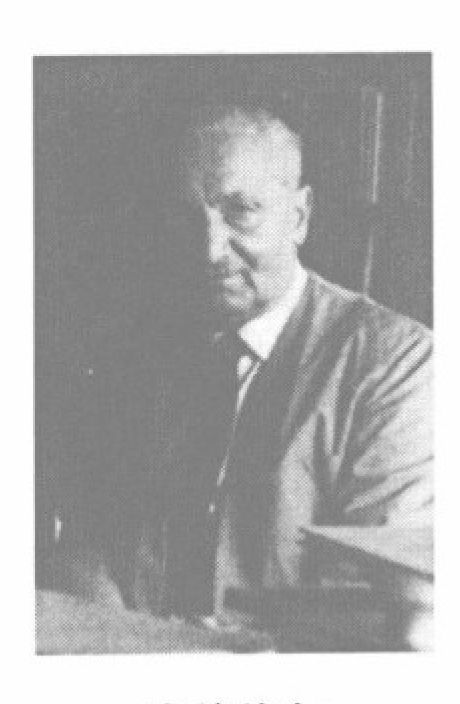
布森，进而开始关注构造语言学。从广义上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历正是"文化大迁移"中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1949年，他的第一部著作《亲属的基本结构》面世，六年之后他又出版发行了《忧郁的热带》，该书回忆了他在南美洲考察原始部落时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文章起头的"我讨厌探险与旅行。然而，现在我却想说一说自己的探险之旅"一语，时至今日依然体现出作者对人类学调查的双重含义性所抱有的、尖锐诘问的态度。

7月 法国人民阵线结成。

9月 德国，希特勒制定了《纯血统保护法》，《德国公民法》，进一步实施对犹太人的迫害。

1936

4月2日 马丁·海德格尔在位于罗马的意大利德意志学研究所中进行了著名的演讲——《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和诗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的帮助下被马尔堡大学授予教授资格的K. 洛维特（Karl Löwith）出席了此次演讲会。



海德格尔

身为犹太人的洛维特迫不得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时他获得了洛克菲勒财团的奖学金，在罗马从事研究工作。在马尔堡大学时期，洛维特以及H·G.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与海德格尔夫妇往来频繁，可谓亲如一家。但是，聆听了海德格尔在罗马演讲的洛维特给K. 雅斯培寄去书信，信中写道"诗的本质与德国纳粹党党徽（卐）究竟有何关系，

让人颇费思量”。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的诗作《面包和葡萄酒》的第七小节作为此次演讲的结束语。“贫瘠时代中诗人（＝哲学家）的使命究竟何在”，洛维特借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以此作为其后一年出版的、关于海德格尔哲学批判的著作的标题（《海德格尔——贫瘠时代的思索者》）。渐渐的，海德格尔夫人向洛维特打招呼时越来越尴尬生硬，而海德格尔自己在与洛维特交谈时也始终佩戴着纳粹党徽章。之后，洛维特远赴日本，在东北大学担任教职，他前去美国之际（1941年）写下了自己在德国时期的经历。文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本质中包含了其对纳粹主义的支持，并附上注释，称4月2日两人谈话之际，他向海德格尔说出了这个观点，而海德格尔自己也深表赞同。1933年海德格尔在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演说中所显露出对纳粹主义的支持与积极参与绝非敷衍之说。

阿瑟·O. 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存在之巨链》出版发行（哈佛大学出版局）。1873年出生于柏林的洛夫乔伊，身为牧师的父亲是美国人，他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巴黎大学学习过，自1910年起直至1938年引退之前，洛夫乔伊一直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1923年，以他为中心创立了名为“观念史俱乐部”的研究小组。主持者除了洛夫乔伊之外，还有G. 博厄斯（George Boas）以及吉尔贝·希纳尔（Gilbert Chinard），他们都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日后凭借风格独特的文学批评而享誉文坛的M. 尼科尔森（Marjorie Nicolson）也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员。这个研究小组的特色在于它旗下的成员们专业各异，包括了文学、考古学、古典学、哲学、生物学、医学史等。他

们在每月一次的聚会上讨论各种观念的发生、转变以及消亡。洛夫乔伊的《存在之巨链》也正是在这种超越了学术的分界线、认真严肃的讨论中诞生的。不仅如此，这部著作还将这个小组在研究方法上的主张——即“观念史”的有效性适用于西欧思想史，可谓是划时代的创举。他们的活动踏实稳健地进展着，1940 年，该研究小组开始定期出版题为“思想史杂志”的刊物。1974 年 C. 史基伯纳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观念史辞典》将小组多年研究所获得的巨大知识积累汇集成册，堪称集大成之作。G. 普莱(Georges Poulet)以及另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M. 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字与事》中，都对洛夫乔伊提出的知识的多重性存在进行了学术分析，其影响不容忽视。

5 月 法国大选中人民阵线派获得了压倒性胜利。

7 月 西班牙内战开始。

8 月 柏林奥运会开幕。

11 月 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12 月 苏联，斯大林制定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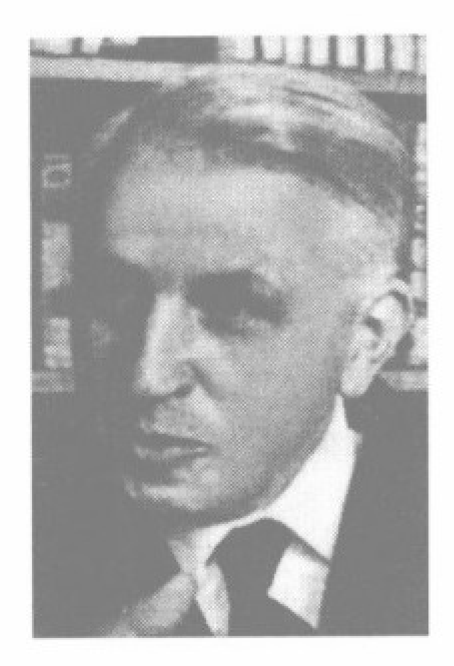
1937

7 月 19 日 在慕尼黑的施特拉赛画廊、位于王宫庭院拱廊的考古学研究所放置石膏像收藏品的狭小屋子中，举办了“颓废艺术展”。在此次展览会上，纳粹政权将从德国各地的美术馆中强行没收、查抄的现代派艺术的主要作品都贴上“颓废艺术”的标签，并以极其屈辱的形式进行了展出。而在新建的、与“颓废艺术展”的展馆近在咫尺的“德国艺术之家”中，于 7 月 18 日举办了炫耀日耳曼民族优秀性的“大德意志美术

展”，两个展览几乎同时开展。“颓废艺术展”在开展的四个月中有大约两百万人次入场参观，入场者人数是“大德意志艺术展”的六倍。展示了仅用三周、从三十二所公立美术馆收集来的、约一百二十位艺术家的六百五十余件绘画、雕刻、版画、摄影作品、书籍的“颓废艺术展”，与 1933 年 5 月 10 日在德国各地进行的“非德意志图书”的焚烧活动，被并称为纳粹德国历史上的野蛮暴行。时至今日，此次艺术展与翌年夏季在杜塞尔多夫举办的“颓废音乐展”依然被公认为是政治权利对二十世纪先锋艺术运动的扼杀。政治对于艺术创造的破坏固然在自古以来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以此种彻底极端的形式展示反体制的艺术，从而以儆效尤的做法却是史无前例的。此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这种展示的同时，对先锋艺术的镇压以及大量的虐杀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33 年 3 月 20 日，H. 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就已经建造了第一所强制收容所——达豪集中营。

11 月 20 日　巴黎盖—吕萨克大街十五号、一家书店的里间屋子中，召开了社会学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该团体的主要创始人除了乔治·巴塔耶外，还有 R. 凯洛依斯、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这一年的年初，他们在巴黎皇家宫殿附近的咖啡馆中召开了筹备会议。对于“社会学”，巴塔耶明确表示“它既不是一般社会学，也不是宗教社会学，严格地说，它是神圣社会学”，并将其定义为“是类似于疾病的某些东西，是社会整体的奇妙的感染症状，是充满嫌恶、疲劳不堪、四分五裂的社会的老人病”。从这个定义中可以明确看出该研究会所研究的神圣社会学与作为通常学术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有着天壤之别。在 1939 年 7 月 4 日之前，此研究会一直以每月两

次的频率召开会议。巴塔耶在1936年创办了带有浓厚秘密社团色彩的杂志《埃塞法尔》，其中刊登他了关于尼采以及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os)的论述。出席研究会会议的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其中有P.克罗索夫斯基、J.华尔、J.包兰(Jean Paulhan)、J.班达(Julien Benda)、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等人，还有流亡至法国的W.本雅明、T·W.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M.霍克海默等人。



巴塔耶

4月26日　德国空军轰炸格尔尼卡。

7月　中日战争爆发(卢沟桥事变)。

12月　日本军队占领南京。

1938

卡尔·豪斯霍弗(Karl Ernst Haushofer)的《太平洋的地缘政治》一书出版。所谓"地缘政治学"是结合了地理学与政治学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是"国家为了获得陆地上的生存空间而断然实行的生存竞争中的政治行动的科学基础"。而正是这"生存空间(Lebensraum)"一词给了纳粹大日耳曼主义的侵略行径以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以地缘政治学为基础的、支配世界的战略论归为单纯的、粗糙的纳粹主义政治思想。《太平洋的地缘政治》一书纵谈了自A.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以来，普鲁士德国的众多学者长期积累的关于太平洋以及亚洲各地区的见闻知

识。并且，以C. 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概念》为基础的“战争理论”贯穿全篇始终。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施米特出版了鸿篇巨著《大地的法则》，论述波澜壮阔的国际政治。书中甚至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北视为世界政治洪流的必然趋势。

赫尔曼·劳希林(Hermann Rauschning)的《希特勒语录》英语版发行。该书的德语版也于翌年出版发行。劳希林1887年出生于西普鲁士的一个军官之家，在波兰自由城市但泽经营农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泽动荡不安的形势令他颇感苦恼，劳希林加入了纳粹党，被选举为市参事会议长，但是他与纳粹党的政治战略产生了分歧，1935年流亡美国。此书包括了1932至1934年的记述。虽然作为历史性资料，书中不乏令人怀疑的部分，但是只需看一下章节的标题，如“点燃全世界”、“将整个欧洲踩在脚下吧”、“只有恐怖才能统治世界”，读者们就能充分理解希特勒乖戾癫狂的性格以及纳粹主义的暴力本质。遗憾的是，大部分英美读者并未领会劳希林的这一番警告。

1月 巴黎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超现实主义展出。

9月 慕尼黑会谈。

11月9日 德国各地的犹太人商店、犹太教堂受到袭击(“水晶之夜”事件)。

1939

尼克莱·S. 特鲁别兹科伊的《音位学原理》作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的第七卷出版发行。1890年出生于莫斯科，1916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教授资格的特鲁别兹科伊先后

在高加索、罗斯托夫、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任教，1922 年夏接受维也纳大学的聘任，主持斯拉夫语讲座。直至辞世，他一直没有离开维也纳。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言学会议召开之后，特鲁别兹科伊将主要精力投向研究音位构造一般法则的解释与阐明。他一方面认识到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别，另一方面把"语音学"作为以发声行为（言语 parole）的能指为对象的语音研究，把"音位学"作为以语言构成（语言 langue）的能指为对象的语音研究，将两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对一百九十种语言进行分析，将从中得出的、识别个别语言音位体系的各种对立归纳为普遍适用的理论。但是，不久之后纳粹的魔爪伸向了维也纳。特鲁别兹科伊预感到自己将经受疾病与纳粹统治的双重重压，他更加废寝忘食地埋头于《音位学原理》的撰写。当德国并吞维也纳之后，他立刻被盖世太保盘问调查，所藏资料均被没收。沉重的打击引发了特鲁别兹科伊的心脏麻痹症状，不得不入院接受医治。为了完成著作，直至死前数日，他都坚持口述。1938 年 6 月 25 日，特鲁别兹科伊离开了人世，在他不懈的努力下《音位学原理》还剩下二十多页即能完稿。出版这部著作成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最后的工作。因为在这一年的 3 月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样被纳粹德国占领。

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在这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 1941 年重新编写了大学的授课笔记，为《语言》一书的撰写做准备。但是直到 1963 年之后这部著作才得以出版。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之所以受到关注是由于结构主义思想的出现。

12 月 14 日 电影《乱世佳人》在原作者玛格丽特·米切

尔(Margaret Mitchell)的故乡亚特兰大举行首映式。据说MGM的大制片家D·O.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在这部作品上总共投资了约430万美元，拍摄的胶片长达50万英尺，在好莱坞也堪称是超纪录的恢宏巨制。女主角的扮演者费雯丽(Vivien Leigh)原本是英国一名默默无闻的女演员，由于拍摄了这部电影一跃成为巨星。该部影片在1940年2月的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中囊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彩色摄影、最佳美工、最佳剪辑、特别奖、最佳特技奖等大奖，毋庸置疑该片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乱世佳人》一片的横空出世，开创了所谓的“好莱坞巴比伦王朝”。自此之后，直到麦卡锡主义风行的十几年间，这是好莱坞的光辉岁月。

3月 西班牙内战结束。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发表胜利宣言。

8月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9月 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0月 日本强虏朝鲜人。

1940

2月2日 伏赛波洛多·梅耶荷德在莫斯科被处以枪决。他于一年前的6月20日早晨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涉嫌间谍活动，并于1922年参加了右翼托洛茨基主义集团，具有扰乱戏剧界的行为。但是，事实上罪名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斯大林不希望这位著名的导演、俄国先锋戏剧硕果仅存的艺术家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2月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布了最终判决，判处梅耶荷德死刑，并于1日执行枪决。

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1930年)为开端的、针对俄罗斯先锋艺术家们的肃清风暴终于波及开创了俄罗斯戏剧复兴之路的梅耶荷德。

8月20日 流亡至墨西哥的列夫·托洛茨基在自己家中被暗杀。此次暗杀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化名为“雅克松(Jacques)”的暗杀者真名叫拉蒙·麦卡德(Ramón Mercader),是西班牙共产党员加里达特·麦卡德的儿子。但是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不得而知。据说雅克松通过美国的托派分子西尔维娅·阿奇洛芙(Sylvia Ageloff)接近托洛茨基,并能够经常出入其住宅。在实施暗杀的前一个月左右,托洛茨基在自己家中曾经遭受枪击。美国的托派分子们为了确保安全,劝托洛茨基移居美国,但是他并未接受建议。托洛茨基并不希望整日战战兢兢地逃避KGB(克格勃)的追踪。20日的傍晚时分,在自己家中的书房里托洛茨基被雅克松用冰斧击倒。



流亡至墨西哥的洛茨基(前排左)

2月 日本剥夺朝鲜人的故有姓氏,令其改为日本式的姓氏。

6月 德国军队攻占巴黎。

9月 日德意三国结成同盟。

1941—1950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知识界





1941

埃里希 · 弗洛姆(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出版。1900年,他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家庭,这是一个犹太教法学者以及《塔木德经》学者辈出的世家。同年,L. 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三年之后T · W. 阿多诺相继出生于同一条街道的著名犹太人家族。E. 布洛赫经常在他家中出入,当布洛赫的第一部著作《乌托邦精神》(1918年)出版后,弗洛姆立即进行了阅读。此外,在以犹太教学者为中心的研究小组中,他还结识了F. 罗森茨威格、S. 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等人。最初,弗洛姆希望专攻法学,进入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学习。但是一年之后又转至海德堡大学改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他参加了1920年设立的自由犹太学校的活动,在那里遇见了G. 舒勒姆与W. 本雅明。1925年,弗洛姆向海德堡大学提交了题为"犹太戒律"的学位论文,其后直至1930年为止,一直专心致力于精神医学的研究,并参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活动。他还向《社会研究》杂志的创刊号投寄了自己的两篇论文——《历史与心理学》、《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课题》。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帮助下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感情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被运用于联合研究"权威与家族"以及"权威主义的个性"。但是自从迁往美国之后,研究所成员与弗洛姆之间隔阂渐深。他与美国新兴的弗洛伊德学派开始了亲密的交往,撰写了《逃避自由》一书,他认为极权主义社会的出现使顺应主义成为现代人的宿命,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部著作使用了社会精神分析的方法,阐明了纳粹体制成立的秘密,作为这方面最初的文献备受好评,弗洛姆以此确立了在美国的学术地位。

6 月 德国进攻苏联。

12 月 德国军队在莫斯科附近被苏联军队击溃。

12 月 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

12 月 2 日 芝加哥大学的冶金研究所中，E. 费米（Enrico Fermi）利用从铀氧化物放射出的中子首次成功进行了受控制的原子核链式反应试验。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量子力学的建设，微观物理学朝着解开原子核内部结构的方向不断发展。1938 年 12 月，德国的 O. 哈恩（Otto Hahn）发现中子撞击铀原子核时，一个铀核吸收了一个中子可以分裂成两个较轻的原子核，在这个过程中质量发生亏损，因而放出很大的能量。此次试验的结果通过哈恩曾经的同事、当时流亡至瑞典的 L. 迈特纳（Lise Meitner）转达给 N. 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翌年 1 月美国物理学界也得知了这一消息。这就是发现原子能的经过。当时流亡至美国的德国物理学家们纷纷担心纳粹是否会制造出原子弹这一终极武器。因此，由陆军上校 L. 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负责的"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参与该计划的科学家中有 J. 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并网罗了绝大部分当时已经来到美国的欧洲原子物理学者。此时，纳粹德国也正紧锣密鼓地研究如何将核裂变运用到武器制造中，但之后不久就改变了计划，全力研制核潜艇的原子反应炉。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美方面对此事一无所知。设置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所中，铀 235 的核裂变与钚的核裂变实用化研究同时进行着。1945 年 7 月 16 日，使用钚的炸弹终于

试制成功。“曼哈顿计划”最终导致了广岛、长崎被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所摧毁。原子弹的发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中无休止的军备扩张竞争。并且,借助巨型加速器等设备,实验核物理学的研究也拉开了序幕。这一事例从侧面反映了巨大的科学发展往往被卷入政治的漩涡。

1月 德国,万西会议上制定了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计划。

1943

让-保罗·萨特的著作《存在与虚无》由伽俐玛出版社出版发行。1932年受到阿隆的启发而对现象学产生浓厚兴趣的萨特在柏林生活了一年,其间对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36年之前,萨特一直在勒·阿弗尔的高中里教授哲学,之后转往拉昂的高中任教一年,1937年,返回了巴黎的巴斯德高中。这一年,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论自我的超越性》发表在A.科亚雷等人编辑的年刊杂志《哲学探究》第六期上,同年,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想象力》作为PUF(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新哲学全书》中的一册出版发行。之后,他又撰写了《意识的意向性结构》(1938年)、《情绪理论初探》(1939年)。1940年伽俐玛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萨特的《想象》一书,此书被认为是《存在与虚无》的先导作品。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被动员入伍。翌年6月,他跟随败退的法国军队转移时被德军俘虏,1941年,他以右眼疾病导致平衡障碍为由,获得了所谓的“平民”认定而最终获释。萨特返回巴斯德高中复职,翌年起至1944

年，他一直在孔多塞高中任教。此前，萨特相继撰写了哲学小说《恶心》（1938 年）、《墙》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渐渐崭露头角。但是，《存在与虚无》的横空出世才堪称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此书的销售量超过了伯格森的《创造的进化》，哲学界的学院派们也对此书作出了善意的评价。可以说由于《存在与虚无》一书的出版，才使得现象学在法国正式登堂入室。事实上，1945 年出版发行的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在第三部分"自为的存在和在世界上的存在"中对《存在与虚无》一书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但是这却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存在与虚无》的重要性。



1996 年，萨特和波伏娃在日本羽田机场

1 月 斯大林格勒攻防战中，苏联军队获得巨大胜利。

4 月 华沙犹太区起义。

1944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出版发行。卡尔 1886 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其父从事铁路建设行

PDG

业，他是家中次子。其弟麦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生于1891年)是一位物理化学家与科学哲学家。卡尔从学生时代起就深受社会民主主义者O.雅西(Oszkár Jászi)创立的“社会科学协会”的影响，创建了“伽利略俱乐部”，对E.马赫以及R.阿芬那留斯的学说进行研究。俱乐部的成员中有活跃在核物理学领域的E.维格纳(Eugene P. Wigner)、L.西拉德(Leo Szilard)、J·V.诺依曼等人。他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匈牙利革命，但是有别于G.卢卡奇、巴拉兹·贝拉(Béla Balázs)等人的“星期日会”，波兰尼等人采取了稍稍稳健的左翼立场。革命失败之后，波兰尼辗转至维也纳，一方面协助金融杂志的编辑，一方面担任人民大学的讲师，但是由于无法忍受奥地利政府的反动化，不得不流亡到英国。从1940年起的三年间，他在美国本宁顿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大转型》一书正是波兰尼这一时期撰写的主要著作。是否存在贯穿于近代之前的先市场社会与近代市场社会之间的社会组织原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原理又是怎样的？在《大转型》一书中，波兰尼以此疑问为主题，尝试进行解答。如此一来，以往的学术界对于市场的区分就不再适用。波兰尼试图开辟出所谓“围绕市场与社会的经济人类学”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M.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以及M.哥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对波兰尼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此外，I.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作为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等著作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波兰尼《大转型》一书的深刻影响。

6月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7月 德国发生了暗杀希特勒的事件。

10月　日本莱特湾海战。神风特别攻击队初次出击。

1945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由伽俐玛出版社出版发行。而他也凭借1942年由PUF出版的《行为的结构》与《知觉现象学》这两部著作获得了博士学位。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对现象学的存在论进行了探讨，但却带有浓厚的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理性主义的倾向。与此相对，梅洛·庞蒂的这两部著作所指向的课题却是以“身体性”的阐明为切入点，试图超越笛卡儿灵肉两分的二元本体论。《行为的结构》一书对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积极导入、《知觉现象学》一书对于K. 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以及A. 格尔普(Adhémar Gelb)的身体图式和失语症研究的援引等等，都是企图开拓现象学全新领域的创举。不仅如此，《知觉现象学》最后一章“自由”中引用了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空军飞行员》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人只不过是各种纽带的节结点，对于人而言，只有这些纽带才是最为重要的”，其中包含了梅洛·庞蒂通过参加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法国抵抗运动的切身体验所形成的、对于存在主义的强烈呼吁。其后在收录于《意义与无意义》一书中的《战争爆发了》(1945年6月执笔，发表于《现代》杂志的创刊号上)一文中同样可以明确看出作者清晰地洞察到了法国的胜利将会导致抵抗运动派的解体和分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冷战激化的格局中，法国知



梅洛-庞蒂

识分子的分裂也日益严重，在这种严峻的状况下，该如何与政治动向抗争？不久之后发生的梅洛·庞蒂与萨特因政治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的事件反映了在德国战败、巴黎解放这一时期内法国知识界的动向。

卡尔·R. 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在伦敦出版发行。波普尔预见到希特勒将并吞奥地利，于 1937 年 3 月在英国“学者援救协会”的帮助下前往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在那里，他开始撰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两部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在 1920 年前后完成了主题构思，1936 年在布鲁塞尔的友人家中第一次被宣读，其后不久又在伦敦大学 F·A·V.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过，是将其最初的代表作《研究的逻辑》适用于社会科学的一部著作。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它最初选定的书名是《错误的预言者们——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如其所示，在柏拉图对于哲人王的期待中波普尔发现了“封闭社会”构想的原型。“智者应该领导、统治，而无知者应该服从”，在近代，柏拉图认为维持此种统治以及秩序的必要条件与历史法则主义的思想相结合，产生出极权主义、权利主义思想。1943 年，波普尔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原稿寄给了美国的一家出版社，但是被拒绝出版。直至 1945 年，终于在英国得以出版发行，1950 年，该书的改订版分为上下两卷同时发行，并引起巨大反响。《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也于 1957 年获得出版。但是，这些著作中所包含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在发行伊始，并未按照作者本身的意图被理解。反而被东西方冷战格局下非理性的反共主义所

利用。波普尔的批判的合理主义理论及其实际的应用——对于被封闭社会的批判,作为同时代的、对于本世纪极权主义体制的批判,包含着必须加以谨慎探讨的问题。

4 月　美军登陆冲绳岛。

5 月　纳粹德国向盟军投降。

7 月　发表《波茨坦公告》。

8 月 15 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

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摹仿论》由瑞士弗兰卡出版社出版发行。1829 年出生于柏林的奥尔巴赫,由于他在 1929 年出版了著作《世俗诗人但丁》而被马尔堡大学聘请讲授罗马语课程。但是不久之后,纳粹掌握了政权,他被迫离开德国流亡国外,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国立大学担任教授之职长达十一年。《摹仿论》正是他在土耳其居住期间所撰写的著作。《摹仿论》从荷马(Homeros)起至 V. 伍尔芙(Virginia Woolf)止,分析了两千多年间"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摹仿论》的副标题),堪称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研究著作。奥尔巴赫在《摹仿论》出版后的 1947 年前往美国,前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耶鲁大学任职,1957 年去世。他的文学观点与 L. 施皮泽的文体学、R. 韦勒克(Rene Wellek)的文学批评史等对"新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瑞士的日内瓦大学,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了《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一书的 M. 雷蒙(Marcel Raymond)以及发行了《浪漫派的心灵和梦》一书的 A. 贝甘(Albert Béguin)就已经非常活跃。此种学术传统催生出 G.

普莱的《人类时间研究》(1950 年)、J. 鲁塞(Jean Rousset)的《法国·巴洛克时代的文学》(1954 年)、J. 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的《透明与障碍——卢梭的世界》(1957 年)等辉煌的研究成果,并诞生了"法国新批评"学派。新批评学派对于 M. 福柯以及罗兰·巴特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德国,留在波恩大学的 E·R. 库尔修(Ernst Robert Curtius)出版了其经典著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1948 年),流亡至葡萄牙的 W. 凯塞尔(Wolfgang Kayser)出版了《语言的艺术作品》(1948 年)一书。这些研究都对"结构主义革命"的批评方法造成了若干影响。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一书出版发行。1862 年,梅尼克出生于普鲁士帝国的前身——勃兰登堡的首都古城萨尔茨韦德尔,其父是一名邮局官员。1882 年,进入柏林大学求学,听了 J·G. 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的"历史学方法论"的相关课程后,深受感触。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职于普鲁士国家档案馆,1901 年,受聘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直至 1928 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讲坛,梅尼克一直在大学中从事研究工作。其间,他分别于 1907 年出版了《世界市民主义与国民国家——德国国民国家产生的研究》,于 1924 年出版了《近代史中的国家理性的理念》,作为一名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而闻名海内外。当纳粹掌握了政权之后,他立刻辞去国立历史委员会会长以及《史学杂志》总编之职,过着隐遁的生活。他在 1936 年出版了第三部著作《历史主义的成立》,该书考察了近代启蒙主义思潮是如何进入德国的,并强调了德国近代的特殊性。《德国的浩劫》是他在德国战败后,以 83 岁的高龄奋力写就的一部德意志民族的

反省之书。经历了三种不同政体的历史学家的真挚言行充满了动人心弦的力量。他被同年建校的柏林大学(之后的洪堡大学)聘任,随着 1948 年柏林被一分为二之后,在西柏林又成立了另一所柏林自由大学,梅尼克被推荐担任校长。1954 年,梅尼克离开了人世,享年 91 岁。

1947

特奥多尔 ·W. 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合作撰写的《启蒙辩证法》一书由阿姆斯特丹的库埃利特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流亡地洛杉矶完稿、准备将其作为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50 岁生日贺礼的这部著作,是在对于他们而言最为“黑暗的时代”——1939 至 1944 年春期间执笔撰写的。其中所使用的“启蒙”这个概念,含有贯穿人类历史文明化的过程的意味。《启蒙辩证法》所谓的灰暗主题,指的是它提出了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为什么人类无法跨进真正的人的状态,而落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之中?这种新的“野蛮状态”很明显是指纳粹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根据 M. 韦伯的定义,近代这一新时代的开创是“从巫术中获得了解放”,那么近代为何又再次屈服于野蛮的神话性呢?两位作者在《奥德赛》以及萨德(Marquis de Sade)的《于丽埃特》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美国亲眼目睹了“艺术已经沦为欺骗大众的工具”的文化产业,并发现其有向独裁制度发展的倾向,他们大胆地揭露了美国文化的重要特征——“金钱化”。这部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本“虚幻的书籍”。因为有关当局不批准其再版。但是,1968 年学生运动日益高涨的局势下,这部著作终于获得再版,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书籍一起成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强有力的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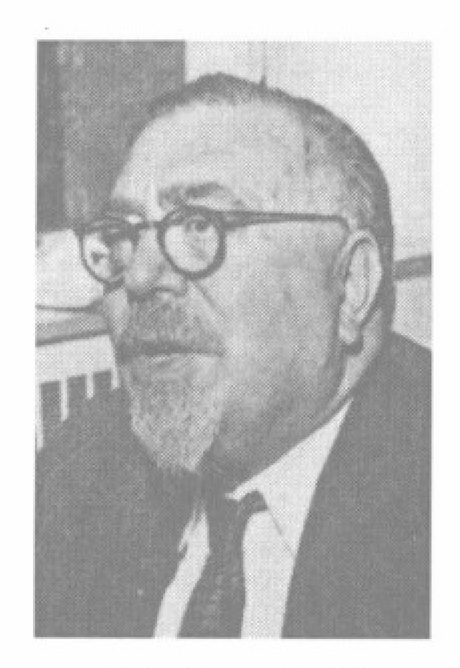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889 年出生于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克拉考尔先后在柏林大学以及慕尼黑大学学习建筑、美术史、哲学、社会科学等专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加入《法兰克福报》编辑部，担任副刊编辑直至 1932 年。最后成为柏林的该报时事评论栏的最高负责人。纳粹掌握政权之后，他离开了德国，作为一名自由作家活跃于巴黎的文坛。1941 年，克拉考尔辗转到美国，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电影资料馆任职，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从事纳粹宣传影片的分析工作。以此项工作的研究成果——《宣传与纳粹战争片》为基础，加入了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电影的分析，完成了《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一书的写作。该书从乌发电影公司的成立说起，彻底分析了《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所带来的影像革命，从中克拉考尔预感到暴政独裁者的出现，其笔触非常精彩。他试图从影像艺术中读取潜藏在社会深层的、无意识的情绪，在内容方面与同时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进行的关于“权威主义人格”的社会调查研究起到了互补作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一书将对于“电影”这一全新分析对象的阐明引入了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描写了“大众社会中政治独裁者出现”的现象，是一部具有先驱意义的著作。之后，纳粹主义宣传的影像表现中的独创性开始广为人知，作为大众宣传的技术，影像的强烈影响力也逐渐受到瞩目。

8 月 印度独立。

1948

克劳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通信的数学

理论》出版发行，该部著作堪称信息科学的奠基性论文。在他之前，也有若干科学家尝试将信息量定式化，N. 维纳(Norbert Wiener)、J • V. 诺伊曼，以及 L. 席拉(Leó Szilárd)等人也已经发现信息量的计算公式与统计力学的熵的计算公式非常相似。但是，从信道、符号化与复合化、噪声与可靠性、取样调查的逻辑关系出发，明确地将通信过程模式化的功绩无疑应归于香农的这部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W. 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在医学财团梅西基金会的资助下，向关心数理工学与生物学学界进行合作的二十余名学者发起呼吁，希望建立全新的跨学科集会组织。生态学者 G.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生理学家 A. 罗森柏斯(Arturo Rosenbluth)也感到举办这样一个集会的必要性。因此，罗森柏斯与维纳以及诺伊曼进行了商讨，并于 1946 年 3 月 8 日至 9 日在纽约贝克曼宾馆举办了集会，参加的科学家包括人类学家 M. 米德(Margaret Mead)、心理学家K. 勒温、科学史家 G. 桑提拉纳(Giorgio de Santillana)、数学家 K. 哥德尔等 21 人。这就是之后被称为“控制论会议”集会的起源。在首次集会上，诺伊曼做了关于当时正在设计之中的通用计算机的演讲，维纳则就“有目的”的机械装置及其操作方法中的反馈和信息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当然，在讨论过程中也探讨了在生命体的生理学构造中，反馈以及信息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该如何将其运用到机械方面。此外，诺伊曼与维纳分别预测了将博弈论以及无法证明也无法否定的命题(例如罗素



诺伯特 • 维纳

悖论等)引入计算机将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控制论会议之后又举行了十届。而《通信的数学理论》一书正是在此种超越了数理工学、生物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科学等专业分界的学术聚会的背景下出现的。可以说今天的计算机科学的黎明期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时期。

6月 苏联对柏林进行了封锁。

1949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学位论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出版发行。这部长达一千一百页的鸿篇巨著宣告了全新的法国年鉴学派时代的到来。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与十九世纪以来政治史占优势地位、以史实考证为中心的实证主义历史学针锋相对,强调历史认识中历史学家的主体性作用,希望树立起以对历史进行全体的、综合的把握为基础的"新史学"。这部《年鉴》自1929年起至1931年共出版了四期,其后,至1938年每年出版六期,全年出版的总页数最高约六百五十页。《年鉴》杂志由发表独创研究成果的"社论"、多位学者对于尚未开拓的重要主题共同执笔探讨的"通讯调查"、不同主题的新出版书籍·杂志论文的介绍与批评、学会新闻、新史料的介绍、各地档案馆的介绍等等栏目组成。《年鉴》杂志中蕴含了历史学和与其毗连的人类诸科学之间的合作成果。布洛赫由于参加法国抵抗运动而被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逮捕,被枪杀于里昂城郊,但是费弗尔却幸免于难。1902年出生的布罗代尔从索邦大学毕业后,1923年前往阿尔及利亚康斯坦丁的里赛—

所中学担任历史教师，除去 1925—1926 年服兵役期间，他一直在那里生活到 1932 年。这一段异国的生活经历令他将自己学位论文的题目《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政策》逐渐演变为《地中海》。其恩师费弗尔也赞成他变更研究课题。从阿尔及利亚归来的布罗代尔在十一所收藏了地中海地域资料的档案馆中积极地收集相关史料，1935 年他受聘于圣保罗大学，在那里任职的三年间依然坚持研究工作，阅读了大量史料的微缩胶卷。1937 年他回到巴黎，任职于巴黎高等研究院，此时他论文的构想已经相当清晰，终于正式执笔。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参加莱茵河战役的他被德军俘虏，在战俘集中营里度过了五年。令人吃惊的是，在战俘集中营里布罗代尔几乎全凭记忆写出了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初稿。1945 年，从战俘生涯中解放出来的布罗代尔对论文进行了最后的修改润色，并于 1947 年通过了答辩，两年后《地中海》一书正式出版。

4 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创建。

5 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立。

10 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成立。

10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

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导论》(全三卷)由 PUF 出版发行。1896 年出生于瑞士纳沙特尔的他，在当地的大学获得了生物学学位后前往巴黎，在 L. 布隆施威希(Leon Brunschvicg)指导下开始研究科学思想史，同时，跟随 P. 让内(Pierre Janet)对儿童心理学展开实验性研究。1929

PDG

年，成为纳沙特尔大学的哲学教授，自 1929 年起担任日内瓦大学理学院教授。在 M. 梅洛-庞蒂的《儿童与他人关系》一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皮亚杰的成就在于揭示了儿童的知识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他采用类似于精神科医生提问的临床治疗方法，对儿童的语言、判断、推理、数学概念的形成、空间表象等等儿童知识活动的功能性侧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努力解开儿童世界观形成的秘密。《发生认识论导论》这部著作，以其对儿童心理学的独特见解为基础，系统地论述了作者的认识论立场。第一卷为《数学思想》，第二卷为《物理学思想》，第三卷为《生物学思想》、《心理学思想》、《社会学思想》以及《逻辑学》。从广义上说皮亚杰的研究与法国认识论一脉相承。G.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横跨科学哲学与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J. 冈纪兰姆(Georges Canguilhem)关于科学史的研究成果等，作为 M. 福柯以及 L. 阿尔都塞的研究背景，近年渐渐被再次关注。

2 月 在美国上议院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掀起了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

6 月 朝鲜战争爆发。





1951—1960

美国社会学的兴盛





1951

维拉德·V·O. 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题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论文在《哲学评论》杂志上发表。通过这篇论文与1948年在《形而上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关于存在什么的问题》,奎因明确地表达了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他拒斥自希腊的素朴存在论以来的、传统的"名辞的使用是假想与其对应的存在者的存在"这一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将意义与所指混为一谈。并且引进了"所谓存在就是一个变项的值"这一准绳。如果遵循这个准则,那么柏拉图主义、物理主义、现象主义就互为相对的立场,并强调不同立场之间的宽容精神。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倡的向科学理论的现象主义图式的还原,其所具有的意义也仅仅成为一种实验性的尝试。此外,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奎因还提出R. 卡尔纳普所强调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不仅是日常语言,甚至是人工语言也不可能实现。换而言之,为了说明分析性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反过来必须以分析性为前提才能成立。这些观点对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倡的"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时,这个命题或语句才具有意义"的还原论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全书贯彻了实用主义的方法。以奎因的批判为开端,这种思想成为英美哲学的主流。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一书出版。1902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清教徒家庭的帕森斯,1920年进入安默斯特学院时准备主修生物学,但是在出席制度经济学者 W. 汉密尔顿(Walton Hale Hamilton)主讲的课程以及研究班谈论会的过程中,他渐渐对社会科学产

生了兴趣。在他大学时代所写的报告中，明确地显示了他对以社会行为为媒介的历史与文化动态的把握以及由此所进行的制度方面的分析，这一系列研究分析成为其日后的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大学毕业后，帕森斯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留学，1925 年作为交换研究员进入海德堡大学求学。他在那里接触到了 M. 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虽然韦伯已于五年前去世，但帕森斯出席了以他的妻子玛丽安娜(Marianne Schnitger)为中心的周日茶话会，与"韦伯研究小组"也常有往来。1926 年就任安默斯特学院经济学系讲师的他于 1930 年公开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英译版。此外，他还参与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设，在那里担任社会制度课程的主讲者。在 1937 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将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帕雷托、迪尔凯姆(Elime Durkheim)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与韦伯的行为理论相结合，其理论的辐射面极其广泛，对哈贝马斯的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会系统》一书以《社会行动的结构》为基础，尝试运用"适应(A)"、"目的达成(G)"、"整合(I)"、"潜在模式维系以及紧张管理(L)"的概念图式来考察行为系统的一般理论，堪称伟大的创举。1979 年 5 月帕森斯前往海德堡大学演讲，归途中在慕尼黑不幸猝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后半期的美国，他遭受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在欧洲帕森斯的理论思想却极大地影响了哈贝马斯以及卢曼(Niklas Luhmann)等人的社会理论。最近在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再次积极关注起帕森斯的社会学体系。

在此有必要论及前一年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出版的《孤独的人群》一书。可以说在美国社会学众多研究成

果中，能如这部著作一样引起如此广泛议论的例子并不多见。以自三十年代起在美国尝试进行的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M. 米德以及 R.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精神分析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从这些研究中，里斯曼推导出新的工业社会的成员、庞大的新中间层的社会性格。传统社会的成员属于传统导向型、内在导向型，与此相对，现代人属于“他人导向型”，两者作为“陀螺型”与“雷达型”而形成鲜明对比。探讨了在高度消费社会中人类行为现状的这部著作，时至今日依然能给我们许多启发。具有普遍包容性的社会学理论——宏大理论（《社会系统》）以及微观的人类心理的社会学分析（《孤独的人群》）几乎同时被出版，现在想来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代的美国，一阵所谓“红色恐慌”的疾风暴雨正来势汹汹。而无论是帕森斯还是里斯曼都与此类狂热的信徒划清了界限，将视线投注到大众社会的病理探究上。

4月 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解除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之职。

9月 “对日和约”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

1952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在巴黎进行了首演。在连续完成了《莫洛瓦》、《马龙之死》、《无名氏》这三部里程碑式的小说之后，作为一种休息放松而撰写的此部作品却成为现代戏剧中“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而广为流传，对于作者贝克特而言，这令他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嘲

讽”。关于《等待戈多》,M. 艾思林(Martin Esslin)在《论荒诞派戏剧》一书的开头所记录的一段轶事令人颇感意味深长。1957年11月19日,旧金山演员学习班的一批演员在圣昆廷州立监狱上演《等待戈多》一剧。这所监狱自从1913年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来演出之后,就从未上演过任何一出戏剧。之所以选择《等待戈多》作为演出剧目,理由仅仅是出于剧中没有女性登场。说实话,导演H. 布劳(Herbert Blau)也曾经持怀疑态度,在久经文化气息熏陶的欧洲观众中都引起轩然大波的这部戏剧是否能吸引一班囚犯。然而演出大获成功。某个犯人断言“戈多其实就是社会”,还有犯人说“那个叫戈多的家伙其实就是外面的世界”。这些囚犯并不认为这是一部难以理解的作品。当时的报纸被这一事实所震惊,刊登了众多揣测“荒诞剧”的报道。最能理解“荒诞派戏剧”的人竟然是一群监狱囚犯,令人不能不感到意味深长。



贝克特

哈罗尔·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在其所撰写的论文《美国的行动画家们》中将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画家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定义为“动态绘画”,他认为这些画家的作品中“画布上描绘的并非绘画(picture)而是事件(event)”。波洛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起至五十年代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坚韧的抽象绘画的表现力,以纽约为中心逐渐被世界熟知。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世界是抽象绘画的一种全新冒险,堪称美术先锋运动的再现。波洛克于1956年8月11日死于车祸,正如他悲剧性的死亡所象征的那样,这次

运动并未持续多长时间。新具象主义以及波普艺术的出现，令现代绘画逐渐被逼入一条死胡同。

1953

4月25日 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与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报告了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瞬间宣告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1968年出版的沃森的《双螺旋》一书以简单明了的笔触讲述了这项发现的经过。但是该书中也存在着故意歪曲事实的描写。1975年出版的A.萨耶尔(Anne Sayre)的《罗萨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与DNA》一书揭示了默默无闻的R.富兰克林在双螺旋结构发现过程中的杰出贡献。沃森将富兰克林所拍摄的DNA螺旋结构的衍射图像作为搭建模型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证据，这些照片未经富兰克林同意、由她的同事M.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擅自拿给沃森观看。当然在沃森的书中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是，在《双螺旋》一书中，沃森将富兰克林描述成一个顽固的反螺旋主义者，并断言想要从她本人那里看到照片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才不得已让威尔金斯擅自取来照片。然而据萨耶尔所说，对于这一系列情况富兰克林一无所知。早在1951年11月，富兰克林为了准备非正式演讲而做的笔记上就已经记载了关于DNA结构的分析，“是由数根长链构成的大螺旋，外侧为磷酸，磷酸与磷酸构成的螺旋间结合遇水将会被破坏。磷酸可与蛋白质结合”。而且在这段话下划上了下划线。令人遗憾的是，富兰克林于1958年4月16日病逝，终年37岁。

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颁给了克里克、沃森以及威尔金斯3人。由于诺贝尔奖只颁发给在世的学者，因此富兰克林无法享有此项殊荣，但是如果她活着事态又将如何发展呢？按照规定诺贝尔奖是不能同时授予四个以上的受奖者的。将伟大的科学发现视为诺贝尔奖的获奖竞争无疑是非常不慎重的，但是在《双螺旋》一书中相当明显的女性歧视观念，令人对富兰克林的英年早逝更觉惋惜。

3月 斯大林去世。

6月 英国伊丽莎白二世继位。

6月 东德发生反苏暴动。

7月 朝鲜战争休战。

1954

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第一卷由东德的阿尔伏堡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卷于翌年出版。1885年出生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布洛赫先后在慕尼黑大学、维尔茨堡大学学习，1908年获得博士学位。1910年，前往布达佩斯，在那里结识了G.卢卡奇，自1912年起在卢卡奇的介绍下加入了M.韦伯的研究小组。1918年，与W.本雅明相识。出版了《乌托邦精神》一书的布洛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柏林精力充沛地撰写了大量论文、书籍，但是由于希特勒掌握了政权，他不得不辗转维也纳、布拉格等地，并于1938年流亡至美国。其间在1937年，他参加了在流亡至莫斯科的德国文学家创办的杂志《语言》上展开的“表现主义论争”。布洛赫拥护表现主义艺术运动，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与卢卡奇截然不同的立场。1948年，被聘为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教授。原稿有一千六百多

页的《希望的原理》是布洛赫的代表著作，在美国期间他花费了几乎所有的精力创作出这部“希望的百科全书”。在《乌托邦精神》一书中尚未形成体系的、“还未被意识到的事物”以及“生存瞬间的黑暗”等布洛赫特有的秘教概念，作为宏大的、具有末世论情怀的思想，在《希望的原理》一书中被记述下来。最早关注布洛赫所提出的问题的是 J. 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等宗教学家。对 1956 年匈牙利发生的 10 月事件在精神上感到一种连带感的布洛赫翌年被解除大学教授之职，1961 年就任蒂宾根大学的客座教授。移居西德的他积极支持六十年代后半期进行的学生运动。直至 1977 年去世，布洛赫从未放弃支持反权威运动的坚定立场。

9 月　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结成。

1955

8 月 26 日　米歇尔·福柯被聘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法语教师，并兼任法国外交部设立的“法国之家”主任。翌年春天，在那里他遇见了北欧神话学者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ezil）。福柯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的三年间，与杜梅泽尔就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而且相当频繁的探讨，两人因此结下了亲密的友情。福柯通过与杜梅泽尔的交往，切身地学习到了研究中的严密性、查阅古籍文献所需的精确性。此外，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批珍贵的医学史档案、书信和各种善本图书也深深吸引了福柯。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的资料搜集、方法论态度的形成在乌普萨拉大学期间已经基本完成。同时福柯作为法语讲师的工作也完成得非常出色，法国之家的筹备工作也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之后，福柯

雇用了从巴黎来的瑞典学生、年仅 18 岁的 J · C. 奥贝路维担任秘书之职,并与其女友达妮 3 人一起乘坐华丽的米色捷豹汽车四处兜风,肆意游乐。毋庸置疑,此举与福柯同性恋的性取向,令乌普萨拉当地思想保守的居民们为之侧目。福柯任期未满,于 1958 年提前一年前往下一个任职地华沙。

11 月 29 日 巴黎的缪智阿里提礼堂中,召开了一场由法国共产党主办的批判梅洛 · 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的集会。主持集会的是党中央委员 G. 科尼奥(Georges Coignot),参加者有 R. 加洛蒂(Roger Garaudy)、H.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J · T. 德桑蒂、M. 卡庞(Maurice Caveing)、J. 卡纳帕(Jean Kanapa)等人,将此次集会的内容汇集成文时,还编入了 G. 卢卡奇撰写的针对《辩证法的历险》的抗议书。以 M. 韦伯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主要着眼点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论、批判列宁以及对托洛茨基进行重新评价、最后对萨特的"共产主义与和平"进行的彻底的批判(仅这一部分就占到了整部书稿的一半以上),由这一系列内容组成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对于法国共产党而言是无法忽视的重大挑战。然而,如果以今日的眼光虚心地阅读此次集会的记录,你将轻易地发现所谓的对于梅洛 · 庞蒂的批判是如何的愚蠢。以监狱问题为首,梅洛 · 庞蒂对于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极其具有前瞻性,这一点只要阅读了《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便能一目了然。但是,此种毫无结果的论战是如何煞有其事地展开的? 了解相关事实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年,在法国出版了列维 · 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

4 月 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第一届亚非会议(反殖民主义)。

5月 苏联和东欧七国缔结华沙条约。

1956

5月8日 伦敦皇家宫廷剧院首次上演剧作家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的名作《愤怒的回顾》。他凭借这出戏剧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一夜成名。而"愤怒青年"的称呼也正是脱胎于这部戏剧的剧名。此外,C. 威尔逊(Colin Wilson)存在主义批评的杰出作品——《局外人》出版,广受瞩目。"愤怒青年"派的代表作品是A. 西利托(Alan Sillitoe)的《周六晚与周日晨》(1958年)。

在美国,A. 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长诗专辑《怒吼及其他》在这一年出版,与J. 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1957年)共同引领了"垮掉的一代"的文学潮流。

在法国,M. 布托尔(Michel Butor)的作品《日程表》出版,并藉此获得费内翁奖。这部小说与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窥视者》(1955年)、N. 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的评论集《怀疑的时代》(1956年)以及M. 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琴声如诉》(1958年)共同掀起了"新小说"文学的浪潮,在法国文坛拥有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力。

同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公开报告,令全世界为之震惊。I. 爱伦堡(Il'ya Grigor'evich Éhrenburg)于1954年起至1956年创作了中篇小说《解冻》,但是《解冻》一书受到了K. 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的激烈批判。此外,B. 帕斯捷尔纳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在这一年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原稿投至杂志《新世界》,然而却被拒绝发表,1957年

末，由意大利的菲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出版了此部小说的意大利语译本。帕斯捷尔纳克凭借《日瓦戈医生》一书于翌年 10 月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迫于作家协会的压力，他没有前去领奖。正如在匈牙利动乱中所见到的镇压一般，非斯大林化的浪潮还依然未成气候。

10 月　匈牙利发生反苏暴动。

10 月　瑞士动乱。

1957

诺曼·科恩(Norman Cohn)的《千禧年的寻求》一书由英国的瑟克尔与瓦伯格出版社出版。出生于 1915 年的科恩是一位历史学家，这部作品描写了欧洲中世纪以实现至福千年为目标而进行的宗教反抗运动的历史。K. 洛维特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英语版出版于 1949 年、德语版出版于 1953 年)的附录中，有一篇“千年王国”论，题为“约阿希姆(Joachim of Floris)学说的变形”，将侍奉于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the Great)宫廷的弗洛尔的约阿希姆的预言作为中心议题，论述了中世纪后期以启示录的预言为基础的弥赛亚主义的反叛是如何一步一步产生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的？作为一项详尽追溯历史现象的学术研究，这部书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翌年，E. 文德(Edgar Wind)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秘密仪式》出版，自古代末期的诺斯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异端的教义。借助这股潮流，对于神秘主义思想也渐渐开始了重新评价。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句法结构》由海牙的穆图出版社出版发行。将未发表的论文《语言理论的逻辑

结构》进行修改压缩后完成的此部书籍,在语言学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便是"生成语法理论"的起源。1928 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乔姆斯基在当地的大学中专攻语言学、数学以及哲学,获得学位后,作为哈佛大学学术协会一名年轻会员,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其后,乔姆斯基陆续发表了《语言理论中现在的问题》(1964 年)、《句法结构要略》(1965 年)、《笛卡儿语言学》(1966 年)等研究成果。"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在语言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符号逻辑学领域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他在 1968 年出版的《语言与思维》一书中所显现的一样,乔姆斯基的学术视点关注的是近代语言哲学的成立和发展的基础本身。此外,如他在《美国权力与新官僚》(1969 年)中所论述的,乔姆斯基积极支持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对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胆的批评。

3 月 13 日 下达了针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确认译者、出版社罪名成立)。许多文学家对此判决表示批评。

10 月 苏联人造卫星普尼克发射成功。

1958

约翰·冯·诺伊曼的《计算机与人脑》出版。诺伊曼生前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于 1957 年 2 月因病去世,终年 53 岁。《计算机与人脑》是他作为一般启蒙书籍准备撰写的唯一一部作品,然而未及完成而卒。但是阅读其 1951 年的《自动机的一般逻辑理论》以及归纳其未完成的遗稿而写成的《自我复制自动机的理论》一书,可以大概了解他希望在书中展开论

述的理论概要。早在 1948 年,诺伯特·维纳就已经出版了《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信的科学》一书,构想了一个综合了数学、电子工学、通信技术的创造性科学的全新领域,诺伊曼的自动机理论进一步扩大加深了这一构想,其杰出的成就可与维纳相匹敌。automaton(自动机)的复数形式 automata 是指可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自我维持物体,因此它也包含了计算机以及通信网络等人工系统或者是生物的神经系统以及生物个体的生态学系统(生物社会)。与维纳包罗万象的《控制论》的探讨相比,诺伊曼的探讨虽然更具有数学方面的严密性,但却给人以着眼点过于狭窄的印象。但是,在实现了计算机技术飞跃性发展以及通信网络全球化连接的今天,通过与维纳的比较,来进一步评价纯粹地思考"机械与人类共存"的诺伊曼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959

查尔斯·W. 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2 年 3 月年仅 45 岁的米尔斯突然辞世,《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是他生前关于社会学方面撰写的最后一部作品。1916 年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中产阶级之家的米尔斯,在当地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前往威斯康星大学继续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去世之前,他一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之职。米尔斯凭借《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1 年)、《权力精英》(1956 年)等美国社会学论著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重视独特的生活感觉,擅长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挖掘出美国社会的病根。通过米尔斯的社会批判,

暴露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潜藏于繁荣背后的不合理的统治结构。当然，米尔斯批判的视线也投向了同时代的美国社会学。其中帕森斯的社会理论遭到他最为严厉的批判。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他精确地引用了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仔细分析斟酌其内容，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论断“五百五十页的《社会系统》可翻译成大约一百五十页的简单易懂的文章”，他认为这种均衡论的系统无法分析实际社会中现实的、能动的变化，只是讲坛式的学问。那么，米尔斯所希望实现的社会学构想又是如何的呢？很遗憾，由于他的骤然离世，他所计划的宏伟的“比较社会学”只跨出了尝试性的一小步便戛然而止。但是，米尔斯对于“宏大社会学理论”的批判经历了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动荡时期，最终被激进社会学所继承。

1960

3月 第一期《太凯尔》(*Tel Quel*)杂志由瑟伊出版社出版发行。P. 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J·R. 于格南(Jean-Rene Huguenin)、J. 西鲍迪尤(Jean Thibaudeau)等人担任编辑。F. 蓬热(Francis Ponge)、C. 西蒙(Claude Simon)、J. 凯罗尔(Jean Cayrol)等人都向创刊号投寄了稿件。《太凯尔》结合了新小说、新批评以及当时终于被介绍到法国的俄罗斯形式主义批评等，呼吁进行“全新的文学的综合”，堪称六十年代法国文坛的旗手。但是，自五月革命前后起，由于索莱尔斯等人在政治方面向毛泽东主义倾斜，令《太凯尔》失去了创刊初期纯粹的文学杂志的特性。《太凯尔》所具有的排他特性，虽然从创刊初期起并不明显，但却切实存在。创刊号中刊登了于

格南的作品《荒凉的海边》的一部分，但在7月2日于格南却被杂志除名。于格南的恩师J.格拉克(Julien Gracq)曾经评价《荒凉的海边》一书是“法国青春文学的典范”，这给了于格南以温和的鼓励与支持。索莱尔斯与于格南的分道扬镳，预示出二十世纪后半期文学与批评所面临的道路。对于1962年9月22日遭遇交通事故、年仅26岁便不幸辞世的于格南而言，《太凯尔》的激进主义倾向是他死后才发生的事件，但是，对于经历了二十世纪末期的人们来说却不由得发出复杂的感慨。于格南在短短六年的文学生涯中仅仅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随笔集以及自己的日记。然而，时至今日再翻阅这些作品，其中所展现的朝气蓬勃的青春形象令人不禁扼腕长叹。《太凯尔》所规避的朴素与纯真性也许正是文学超越了时代而带有的某种普遍性。



1961—1970

日益崭露头角的结构主义者





1961

8月1日 加斯东·巴什拉给M.福柯寄去了一封信函，对同年出版的《疯癫史》一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今天拜读了您的大作。……社会学家们为了研究一国的小部族而远渡重洋。而您让他们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都带有野性。您是一位真正的探险家。我将清楚地记住您希望探明十九世纪真相的这一伟大计划（‘为了今后的研究，希望留下关于围绕这些疯癫的二律背反的详细探究。但是，如果能够进行这种探究的话，那么十九世纪中的疯癫经历作为一个整体……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恐怕只能依据相关的精确的一览表才能进行吧’——《疯癫史》第五章‘疯癫诸相’）。……我虽然不得不离开精彩纷呈的巴黎，但是10月期间我一定会前来拜访。希望见面后能亲口送上对您的赞美。并且希望能够再次表达在阅读您的大作之时无以言表的喜悦以及我最真挚的敬意。”巴什拉于翌年10月16日在巴黎去世（享年76岁）。

让·科特(Jan Kott)的《莎士比亚，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书出版。此书最初是作为《莎士比亚论集》出版的，1962年出版的法语译本（萨特主编的《现代》丛书中的一册）将书名定为“莎士比亚，我们的同时代人”，此后这一书名便渐渐被全世界所知晓。1968年此部作品的日语版本出版时，《莎士比亚，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书已经被翻译成十二国语言、在二十一个国家出版。由此可见此部作品的影响力是如何巨大。科特是一位出生于1914年的波兰评论家，参加了战时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是亲身经历了纳粹暴行的一代。他由于此书的出版，而获得了维也纳赫尔德奖。全书由莎士比亚的悲剧与喜剧作品评论、两篇论文以及年表构成。在最后的两篇论文《莎士比

亚——残酷的真实》以及《莎士比亚备忘录》中最为明显地体现出本文的主旨——“莎士比亚的同时代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都是科特在斯特拉特福观看了由P.布鲁克(Peter Brook)导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之后引发灵感而撰写的。对伊丽莎白王朝戏剧的重新审视促进了对英国文艺复兴的再次思索。其中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的F·A.雅茨(Frances A. Yates)的著作《乔尔丹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传统》(1964年)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此外，还进行了运用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期的古乐器尝试模拟出原始状态的演奏。作为试图以现代的视点重新把握自中世纪起至近世的过渡时期出现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化运动的开端，科特的著作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同年，前一年去世的牛津大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约翰·L.奥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的著作《哲学论文集》出版。翌年，《语言与行为》、《知觉的语言》相继出版。通过分析哲学构建起的“语言论转变”的基础逐渐完成。

1月 美国，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就任总统。

4月 苏联的加加林(Yury Alekseyevich Gagarin)少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航天飞行，他说：“地球是蓝色的。”

8月 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间修筑“柏林墙”。

1962

6月16日 蕾切尔·卡逊(Rachel Louise Carson)的作品《寂静的春天》开始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9月27日，该书的单行本出版。从这本书进入印刷阶段，就受到了企业方

面的打压，一经出版更是受到众多与农药相关企业的冷酷攻击。但是，揭露了环境破坏的真实状态的卡逊最终取得了胜利。《寂静的春天》成为一部诊断现代文明病状的经典名著。1907 年，卡逊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农业经营者之家，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进入当地的大学专攻生物学。之后又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遗传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决定她未来命运的是她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中进行的夏季研修。自幼对海洋的憧憬以及研修时的经历促使她写下了《围绕着我们的海洋》等"海洋传记"。从她最初的成名作《在海风的吹拂下》(1941 年)到《寂静的春天》，包括摄影集在内，卡逊的著作仅有七本。然而，其影响力时至今日依然巨大。她在书中对于使用名为"杀虫剂"、实为"杀生物剂"所造成的地球生态体系的系统性污染、破坏表示了抗议，但是这部以自然观察为主线的作品语气客观节制，利用大量生物观察的经验进行有力的论证，因此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寂静的春天》一书也是引发六十年代后半期美国"嬉皮士运动"的诱因之一，在这场运动结束之后，这部著作作为环境保护运动的经典依然被继续传阅。但是，卡逊本人并未目睹这场巨大运动的滚滚浪潮，她于 1964 年 4 月 14 日去世，终年 56 岁。



蕾切尔·卡逊

同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他提出了关于科学史的新方法论——范式理论，该理论的出现与《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同在这一年，这

个巧合充满了某种暗示。

4 月 中苏对立表面化。

5 月 埃希曼(Karl Adolf Eichmann)在以色列被处以绞刑。

7 月 阿尔及利亚独立。

10 月 古巴危机发生,美苏对抗。

1963

康拉德·Z. 洛伦兹(Konrad Zacharias Lorenz)的《攻击与人性》由维也纳 Dr·G. 波洛塔·谢拉出版社出版。1903 年出生于维也纳的洛伦兹,自幼喜爱动物,在维也纳和纽约的大学攻读医学,后成为维也纳解剖学研究所的助教,1937 年获得比较解剖学与动物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先后在哥尼斯堡大学以及明斯特大学任职,之后担任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动物行为学院的院长,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兼任该研究所的行为生理学的主任。通过观察野生达乌里寒鸦而确立了“行为先天释放机制”概念的洛伦兹,与 N. 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被并称为现代动物行为学之父。《攻击》一书从珊瑚礁中鱼类之间激烈的种群内部斗争的观察说起,证明了此种攻击是具有维持种群功能的本能行为。而且种群内部攻击的本能经过仪式化的过程,起到了抑制攻击本能的作用。从这个视点出发,通过对于四个动物社会的观察,强调在人类行为的深处贯穿着由自然界的秩序所带来的因果法则。从《攻击》一书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生物学界的想法与见解。例如 J·V. 尤克斯库耳(Jakob Von Uexküll)的著作《生物看到的世界》的影响、关于“生存圈”的论述等。

但是，六十年代之后，洛伦兹以及丁伯根对于文明论的批判与生态学运动的发展一起逐渐被重新评价。1973年，K · V. 弗里施(Karl Von Frisch)、洛伦兹以及丁伯根3人共同荣获诺贝尔医学 · 生理学奖。将保护地球环境作为课题的维持生态系统的运动，竟然成为纳粹统治下德国生物学的源泉之一，让人不得不感叹其中的讽刺意味。

同年，米哈伊尔 · M.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终于再度出版(初版为1929年)。对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重新评价也终于正式展开。

8月　美苏签订停止部分核试验的条约。

11月　肯尼迪总统被暗杀。

中苏论战激化。

披头士乐队风靡一时。

1964

春　海德堡大学召开了纪念M. 韦伯诞辰一百周年的第十五届德国社会学大会。会上赫伯特 ·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作了题为《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演讲，受到了众多学生听众的热烈鼓掌与欢迎。马尔库塞指出西欧的理性堕落于资本主义式的管理、市民业已大众化，韦伯赋予市民们的"政治的期待"已经遭到彻底背叛。在他同年出版的著作《单维的人》中，作为对大众化的高度资本主义管理型社会的批判，同样尖锐地触及了这一问题意识。从形式合理性向技术合理性的转化、从技术的本质——"人类的自然支配"中必然产生的技术合理性向政治合理性的转化等等，是一个早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撰写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就被关注的

“合理性的内在辩证法”。但是马尔库塞使这个视点更为激进化，将“革命的可能性”作为“从被物象化的意识形态中的解放”来重新理解把握。与阿多诺、霍克海默不同，身处美国的马尔库塞非常仔细地观察着“美国梦想”的繁荣与“红色恐慌”的狂潮这两种同时并存的现象。在《爱欲与文明》(1955 年)一书中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对于革命的解释与异化论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开创出独特的对乌托邦的展望。在《单维的人》中，他再次强调从管理型社会的沦陷中摆脱出来、实现真正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只存在于恢复对“先进工业社会”的否定思维这一乌托邦的课题中。这种强烈的否定精神，不仅对美国学生，对德国以及法国的学生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1968 年爆发的全球性动乱的导火线。

同年，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的《理解媒介——人类的扩张》一书出版。这部著作与麦克卢汉的另一部作品《古腾堡银河系》(1962 年)共同论述了从“活字文化”到“映像文化”的转换，并预言二十世纪的“文化的定义”将要求新的参照系统。今天，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正在令麦克卢汉的预言逐步成为现实。

5 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成立。

7 月 美国新公民权利立法。

10 月 苏联赫鲁晓夫下台。

10 月 东京奥运会召开。

1965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弗洛伊德和哲学：论解释》一书由瑟伊出版社出版(原题为《关于解释——关于弗洛伊德

的论文》)。1913 年出生于法国东南部城市瓦朗斯的利科,在雷恩大学攻读哲学,之后前往巴黎索邦大学准备教授资格考试,并于 1935 年通过了考试。当时他深受 G. 马塞尔(Gabriel Marcel)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在方法论方面,胡塞尔的《逻辑学研究》也给了他相当大的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俘虏的利科在战俘营中与同营的法国哲学家 M. 杜弗连(Mikel Louis Duffrenne)一起研读了 K. 雅斯培的存在主义哲学著作,同时还尝试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译成法语。自 1948 年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宣讲哲学史课程的利科,立志实现"意志的哲学"的体系化,通过对人类意志作用进行现象学的分析来检查反省存在的本质。利科试图将马塞尔与胡塞尔综合起来。《关于意志的哲学》的第一卷《意愿者与非意愿者》在 1950 年出版。1956 年就任索邦大学哲学教授的利科热心出席并听讲了法国国家学术学院的梅洛·庞蒂主讲的课程,同时还参加了 J. 拉康的精神分析研讨小组。1960 年作为《关于意志的哲学》的第二卷,出版了《可能犯错误的人》与《恶的象征性》两部著作。通过《恶的象征性》一书,利科的哲学思想实现了从现象学记述的立场向象征解释的立场的转移。同年,在西德,H - G. 伽达默尔的著作《真理与方法》出版发行,与提倡解释学的复兴几乎同时发生,令人颇感意味深长。利科对于弗洛伊德的解读的重点在于将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为"欲望的语意论"来理解把握。对于欲望的心理表现的解释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因此,精神分析具有以事实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特征以及解释事实的解释学的特征这一两面性。关注精神分析的解释学方面的利科对拉康的"无意识如同语言般被结构化"的定式进行了批判,他主张"无

意识虽然在本质上并非语言，却趋向于语言”，在最后一章“辩证法”中，利科笔锋一转，从反省哲学的立场上指出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性。在《解读弗洛伊德》一书出版后，利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结合语言文本、直接解释象征问题。在《活的隐喻》(1975 年)一书中他尝试进行文本解释理论的构建。德国解释学的复兴以及法国解释学独树一帜的尝试，也许是一个应再进一步加以同时探讨的课题。

2 月 美国空军轰炸北越。

11 月 罗马教皇与希腊正教大主教会谈，消除了东西教会的对立。

1966

罗兰·巴特的《批评与真实》一书由瑟伊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开始创作于这一年 2 月。虽然篇幅不长，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法国文学批评的潮流。巴特的另一部作品《论拉辛》(1963 年)出版后备受非议与责难，他希望在《批评与真实》一书中对这种批评作出回应。对巴特大肆抨击的代表人物正是当时学院派文学批评大家 R. 皮卡尔(Raymond Picard)教授。他在《新批评还是新骗局》(1965 年)一书中对于巴特的批判，受到了众多支持旧批评(站在巴特的“新批评”的立场上将其命名为旧批评)的学者们的欢迎。甚至《费加罗报》以及《世界报》都拥护皮卡尔对于巴特的攻击。面对旧批评对新批评的全面攻击，巴特全力以赴地利用《批评与真


巴特

PDG

实》一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巴特集中火力攻击所谓"似是而非的批评",认为此种批评无定义的客观性,仅在无根据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想中才有意义。巴特坚决主张作品批评中"阅读"这一行为的重要性。自《批评与真实》出版之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法国文学批评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继前一年出版的阿尔都塞的作品《保卫马克思》,这一年J. 拉康的《拉康选集》与M. 福柯的《语词与事物》等著作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著作《普通语言学问题》也获得出版。书中收录的《语言学的"构造"》一文,作者写道:这二十年间"成为重要用语的,相比起结构,不如说是更倾向于形容词的结构性",从这种结构性中派生出了结构主义以及结构主义者。之后,本维尼斯特又再次论述了关于"结构语言学的意义与局限"。在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思想界的巨大浪潮之后,今天再回首这段历史,本维尼斯特坚信不疑的观点让人再一次体会到"批评与学术"之间的问题是如何难以解决。

7月　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8月　中国文化大革命,刮起一股红卫兵旋风。

9月　萨特、波伏娃访日。

嬉皮文化盛行。

1967

约翰·K. 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新工业国家》由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美国正陷入越战这一巨大泥沼而无法自拔,国内的反战呼

声一浪高过一浪。嬉皮士、花童(嬉皮士代称)纷纷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意愿,反战摇滚音乐剧《长发》红极一时。在这样一个充满喧嚣的时代出版的《新工业国家》,对于加尔布雷思而言却极为重要,这是他继《丰裕社会》(1958 年)之后的第二部代表作,与《经济学与公共目的》(1973 年)一书共同构成了加尔布雷思经济学著作的"三部曲"。他在《美国的资本主义》(1952 年)以及《丰裕社会》中,将一直以来不受新古典派经济学关注的服务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细致地分析了作为市场内部自动调节机制的抗衡力量与消费的依存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作品中的国家观是反垄断性的,至少是属于中立性质的。然而,在《新工业国家》中被导入的"技术统治结构(technostructure)"却将"工业社会"作为"大企业体制"进行一元化的管理统治,国家以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复合机构的面貌出现。所有一切的努力都仅仅是为了通过国家机构内部的官僚组织来实现这个机构的维持和扩大。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的目的是共同的,因此产生了"官僚勾结",国家的政策介入进一步强化了计划性体制。越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加尔布雷思所进行的探讨无疑是对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的一种彻底的揭露。"反战"的口号清楚无误地显示出国家目的与国家成员的意志的背离。并且,这部作品对于在时代洪流中非现实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学院派主流提出了复兴"作为现实科学的经济学"的要求。这一课题在《经济学与公共目的》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同年,在法国,J. 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一书出版。

6 月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8 月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立。

1968

5月3日 巴黎大学当局封锁了农泰尔分院。自前一年11月起,围绕改善设施等问题,该分院大学当局与激进派学生之间的对立就一直未曾停止。3月22日,以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为领袖的学生们强行举行了校内集会,学校当局招来了警察,由此发生了流血冲突。5月2日,学生们再次占据了分院,校方不得不对校区实行封锁。在巴黎大学索邦本校中,围绕如何处理科恩-本迪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为此学校当局也招来警察驻扎在本校中,结果引发了更多普通学生的抗议。在这一天的冲突中有大约六百名学生被捕,本校也被封锁。11日凌晨两点,抗议封锁索邦大学的学生们筑起了解放区,冲入了巴黎左岸的拉丁区,这一带被熊熊烈火以及滚滚黑烟、催泪瓦斯的淡绿色浓雾所笼罩。这次学生运动受到了大学教职员工会以及劳动总联盟的积极支持,最终发展成为动摇了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政权的政治问题。

“巴黎五月革命”不仅仅是发生在法国的一个孤立事件。在美国,反越战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中国,由红卫兵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的疾风劲雨席卷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意大利、西德、日本学生运动都掀起了一股反对极权的街头运动。另一方面,8月,苏联与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的军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在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第一书记的领导下所发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被无情地镇压了。但是,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的A.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博士在美国的《纽约时报》(7月22日)上发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批判苏联政府的论文,像他一样反体制派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国内也为数不少。

4月 美国,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被暗杀。

5月 法国全境爆发总罢工(五月革命)。

8月 捷克事件("布拉格之春"被镇压)。

在日本水俣病、镉中毒被认定为公害病。

1969

这一年前后,在西德围绕尤尔根·哈贝马斯展开了两场论争。其中之一是与以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为中心的学者们就解释学所展开的论争,另一场是与尼克拉斯·卢曼关于社会体系进行的论争。在解释学论争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对于意图实现以W.狄尔泰为始祖的解释学的现代复兴的伽达默尔、O·F.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等人进行了批判。不仅如此,从C·S.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介绍与分析出发的K-O.阿佩尔也参加了此次论战,由此可知,在充分意识到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日常语言学派语言论的研究的基础上所展开的这场论争,与存在主义论争相同,在战后德国的哲学界,堪称是超越专业领域、引起巨大反响的论争之一。伽达默尔自始至终致力于保持传统方法,但是此次论争却成为德国开始正式研究英美经验论哲学的契机,其作用不容忽视。解释学论争进行之后,"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这一在五十年代末被提及的课题开始被认真地研究讨论,"语言论转向"也被认真地加以认识。

另一方面，信息理论以及控制论所带来的新概念中出现了系统的概念。卢曼使用了这一系统概念，试图批判性地超越帕森斯的社会学思想。六十年代之后卢曼宏伟的社会理论构想同时也刺激了他的对手哈贝马斯，赋予哈贝马斯以强劲的动力去给陷入困境的批判理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这场论战最终促使哈贝马斯实现了自身的“语言论转向”。他将研究的重点转向语言的交流能力。1981 年出版的哈贝马斯的著作《交往的理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卢曼之间的那场论战。

4 月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林彪的领导体制。

7 月　阿波罗十一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登陆月球表面。

1970

艾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的著作《寻求社会学的重生》（原名为“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由纽约基本图书公司出版。此时越南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以 1975 年 4 月解放民族战线的军队攻入西贡（现胡志明市）而告终，但此时反战运动对于学术界所提出的异议正开始迈入更进一步的阶段。出现了针对美国学术领域本身所提出的抗议。而古尔德纳的著作正是引领这股批判潮流的第一波冲击波。正如此书的“序言”中所写的，“今天，社会理论家们在已经麻痹了的城市中心与被摧毁的大学校园内、这些正在一步一步瓦解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工作。……众多反抗的利刃扎进了古老秩序的隐身之处。”充分地说明了美国的激进派学生运动对于学术领域的深度冲击。1920 年出生于纽约的古尔

德纳，此时已经绝对不年轻了。但是，他却迅速看清了这场运动提出了一个撼动美国化生活方式根基的重大问题。其研究成果汇集成《寻求社会学的重生》一书。书中对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论进行了激烈的驳斥，并且表明了对于功能主义方法论的怀疑。此外，H. 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论等新的社会学尝试正在积极进行着，曾经在 C · W. 米尔斯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被简单描绘的“自我反省的社会学”也正在大胆地展开。“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社会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社会学从何而来、将走向何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被一一提出。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动荡局势对学术界造成的冲击，此后渐渐展露出其巨大的影响力。

3月 日本举办世界博览会（大阪世界博览会，—9 月 13 日）

8月 美国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11月25日 三岛由纪夫自杀。



1971—1980

从自我组织化到自创生理论





1971

约翰·B. 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出版。1959年以来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他,在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公民权运动以及学生运动中,致力于实现以“作为公正的正义”为核心的新伦理学构想。对于此前专攻新古典派经济学的罗尔斯而言,此种经济学的学术基础中所蕴含的“功利主义”始终让他心存疑惑。他希望能够在现存的社会利害关系中再一次重新思考“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社会契约说”以及“天赋人权的思想”。由此诞生了提倡“新政自由主义”的著作《正义论》,“新政自由主义”以通过拥护政治自由以及制约经济自由来实现社会福利为目标。这部著作将正在向伦理学用语的语言分析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进行两极分化的英美伦理学的潮流再次引回到“寻求规范的伦理学”的正道上,实现了学术领域的革新。与此同时,围绕《正义论》也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逐渐形成了被称为“应用伦理学”的全新的实践性伦理学领域。

P. 格兰斯多夫(P. Glansdorff)与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合作撰写的《结构、稳定性和涨落的热力学理论》一书由伦敦约翰威利出版社出版发行。普里戈金1917年出生于莫斯科,是国际上热力学、统计力学方面的权威。身为布鲁塞尔学派学术领袖的普里戈金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然而这部关于热力学的、相当专业的研究书籍何以具有如此重大的思想意义呢?这一点可以在G. 尼科里斯(Gregoire Nicolis)与普里戈金合著的《非平衡系统中的自组织》(1977年)、普里戈金的《从存在到演化——物理科学中的时间与多样性》(1980年)、普里戈金与I. 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合

著的《从混沌到有序》这些后续的研究中渐渐明了。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平衡状态的结构分析被扩展至非线性以及包含不稳定性的现象。如此一来进一步拓展了运用流体物理学以及热力学的观点处理生物体系问题的可能性。事实上,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也已论述了作为“复杂性科学”的热力学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发现了“贯穿了波动的秩序”。“自组织化”这一现象的发现启发了普里戈金,他希望通过实验证明在无生命的世界中也存在着生物界中十分普遍的自组织现象。伯格森曾经在《创造进化论》一书中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想象。普里戈金等人的研究乍看之下似乎与伯格森所论及的问题如出一辙,但是却更为科学严密,而且是切合自然现象的构思。当然,此前研究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也确实令普里戈金等人的研究成为可能。值得关注的是科学开始向阐明“具体性这一复杂性现象”的方向发展。

同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尔·德曼(Paul de Man)的文学批评论文集《死角与洞察》出版。这部著作预示着解构主义旋风将席卷八十年代的美国,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

8月 美国暂时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中国台湾驱逐出联合国。

1972

葛瑞利·贝特森的著作《精神生态学》由哈帕和罗出版社出版。1904年出生的贝特森,父亲是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在剑桥大学研读完人类学之后,贝特森前往新几内亚从事田野作业,1935年出版了《纳文》一书。那

PDG

一年，他与玛格丽特·米德结婚（1950年离婚。育有一女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了控制论会议的贝特森，逐渐将视线投向精神医学的研究。六十年代他开始探究自然界中精神存在现状的统一记述。1980年在旧金山去世的贝特森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选取了其中的若干篇编辑成册的《精神生态学》涉及了人类学、精神分裂症、进化论、生态学、认识论等众多领域。尤为著名的是他在解释精神分裂症时所提倡的"双重束缚"概念。由于理性信息与元信息之间存在着逻辑性矛盾，人类往往会陷于无法行动的境地。这与分裂症有着很深的关联性，同时，也是经常出现在日常交流中的现象。贝特森努力地通过幽默以及讽刺的方式来寻求从"双重束缚"中的解放。晚年的他出版了《精神与自然》一书，无论是在这部《精神与自然》，还是其死后出版的与女儿玛丽共著的《天使的恐惧》中，贝特森都提出了将"漫长的进化过程作为精神的进程"来思考，并关注贯穿这种进化过程中的"同源"这一隐喻。贝特森谜一般的遗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没有人能解开其中的奥秘。

同年，在法国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菲力克斯·伽塔里（Felix Guattari）合著的《反伊迪帕斯》一书出版。

5月 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

9月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

10月 罗马俱乐部发表报告书——《增长的极限》。

1973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著作《元史学——十九世

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思想史学领域,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与彼得·盖伊(Peter Gay)是杰出的代表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人都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中接受过F.诺伊曼的教诲。据休斯回忆,诺伊曼曾向他们强调"并非是抽象地使用种种伟大的思想,而应该对重视思想形成的历史环境的'思想社会史'加以关注"。休斯的《意识与社会》以及盖伊的《魏玛文化》都充分地体现了诺伊曼的这个观点。1965年出版、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A·C.丹托(Arthur Coleman Danto)撰写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提出对历史的叙事概念进行革新。继丹托之后,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海登·怀特也在《元史学》一书中论及"历史编撰(Historigraphy)的拓扑学"的方法,再次尝试将历史学家在方法论方面的历史意识的关联性作为研究主题。他将这种方法运用到自黑格尔起直至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为止的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的身上,令全新的"历史主义形成及其危机"的结构浮出水面。之后,在题为"话语的比喻"(1978年)的论文集中,他从更加总括性的视野出发,探讨了"历史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问题。就此,包含思想史在内的历史学,在叙事论的发展中,迎来了全新的局面。S.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塑型》(1980年)的面世,掀起了一股"新历史主义"的潮流,但是开辟了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无疑是丹托以及海特的著作。

1月 美国终于在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巴黎协定》上签字。

10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10月 石油危机爆发。

197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农业资本主义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1930年出生的沃勒斯坦是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在F.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尝试进行宏大的理论构筑。沃勒斯坦提出所谓的"世界体系"指的是内部包含多种文化体制、被单一劳动分工覆盖的广大地域。从历史角度看,"世界体系"是以"世界帝国"或者"世界经济"这两种形态出现的。前者是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而后者只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现代之前的"世界体系",偶尔会以"世界经济"的形态出现,但是最终会发展成为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十五世纪形成的"现代欧洲世界经济"却没有出现之前的"世界帝国"化,而是停留在"世界经济"的形态,这是极其罕见的现象。从这一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布罗代尔史学的巨大影响。比如,将"世界经济"作为"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构成要素来分析的构思,很明显是受到了布罗代尔的启发。但是,相对于此前经济史的考察中将"国民经济"作为自给自足的体系来考虑、将"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混为一谈的做法而言,沃勒斯坦所提出的问题无疑令人耳目一新。之后,他又积极引进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展现出与之前的"世界资本主义论"截然不同的欧洲经济形成的状态。自此时起,从中世纪到现代初期的社会史的探讨与研究日渐兴盛。作为这项研究的奠基之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无疑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

记忆中。

8月 美国尼克松总统由于水门事件辞职。

1975

弗里特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著作《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由穆勒·坡林卡出版社出版。六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唤起了“对东方的关心”。众多的嬉皮士,千里迢迢前往印度朝拜圣地。伴随着对现代合理主义自然观的怀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神秘主义思想。在这种氛围之中诞生了被称为“新纪元运动”的全新科学潮流。这一倾向的代表著作便是此部《物理学之道》。卡普拉在序言“宇宙之舞”中记述了关于成为撰写这部作品契机的“美好体验”。夏末的一个午后,他在海边凝望海浪,发现自己身边的一切现象都在跳着壮观的宇宙之舞。这种舞蹈正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毁灭神湿婆所跳的舞蹈。卡普拉认为量子论的难解之处与东方的神秘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物理学之道》一书尝试将合理的、分析性的思想与充满冥想色彩的神秘体验相结合。在卡普拉提出这一命题的背后,隐藏着A.柯斯勒(Arthur Koestler)所提出的“子整体”概念以及D.玻姆(David Joseph Bohm)的“全运动”和“内藏秩序”的假说。然而,比起这些对自然科学分析方法的批判,对卡普拉产生更为深远影响的当属C.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的巫术论以及J.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的《自我变革的方法》一书。所谓的“新纪元运动”融合了自然科学最尖端的谜题与神秘主义的体验,是一个堪称奇异的名称。这一点在今天已有定论,但在当时,要站在这个魔幻般词语的影

响力的范围之外，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

1976

沃尔夫冈 · 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著作《阅读行为——美学作用的理论》由 W. 芬克出版社出版。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德文学批评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苏黎世大学的 E. 施塔格尔（Emil Staiger）的杰出成就不容忽视。他以海德格尔解释学存在论为研究基础，其研究成果与同样继承了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精神病理学家 L. 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的论著共同成就了西德学院派理论的支柱。生于 1921 年的 H · R. 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 1967 年 4 月新建的康斯坦茨大学就任教授时进行了题为"作为文艺学缘起的文学史"的演讲，对此种学术流派进行了正面的切入与批判。这所大学中，以校长、罗马派学者 G. 黑斯（G. Hess）为中心，聚集了一批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优秀学者与教员，在柏林自由大学比较文艺学系的协作下，展开跨学科的研究活动。每年举办一次的研讨会上，海内外的学者汇聚一堂，在为展示其研究成果而出版的会刊《诗学与解释学》中，也能够感受到该大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热情。1970 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作为文艺学缘起的文学史》一书中收录了姚斯的论文以及其他四篇论文，被称为"鉴赏美学的宣言"。伊瑟尔出生于 1926 年，是康斯坦茨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因此，与身为法国文学教授的姚斯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若干差异。《阅读行为》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伊瑟尔所提倡的"文本解读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历史关联所进行的批判。伊瑟尔从现象学角度出发，研

究存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阅读"行为的意向关系。当然，在这里两者的相互作用是主题。他以当时刚刚出版的胡塞尔的遗作《被动综合分析》为线索，认为"理解文本的行为"正是一种"读书的现象学"，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接受美学理论。

1977

斯蒂芬·J. 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著作《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进化的观念史与发生学的最前沿》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古尔德 1941 年出生于纽约，是一位古生物学家。他担任哈佛大学地质学教授之职，从 1974 年年初起还为《自然史》杂志的连载专栏撰稿，并将专栏中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了《自达尔文以来》(1977 年)、《熊猫的拇指》(1980 年)、《母鸡的牙与马的蹄》(1983 年)等一系列关于进化学说的启蒙书籍，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一书与这些大众化书籍不同，是涵盖了发生学、生态学、形态学以及进化思想史的专业著作。在第一部《重演论》中，古尔德尝试对 E. 海克尔的"个体发育是种系发生的重演"这一学说进行现代的理论验证。之后，在第二部《异时发生与幼态进化》中，通过对幼态持续(由于身体细胞发育的迟缓所产生的幼态进化)以及性早熟(形态上还处于幼年期的生物由于性方面的早熟所产生的幼态进化)的分析，试图说明人类幼态进化的形态是由于发育迟缓的结果所造成的一种幼态持续现象。这部著作从销量而言无疑是古尔德在 1977 年之前所撰写的作品中的代表之作，然而，据作者本人说，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自己与 N. 埃尔德雷德(Niles Eldredge)所提倡的"间断平衡"进化理论来阐明"大进化"而进行的一次"预

先演习"。这部著作的面世在极大程度上刺激了解剖学界的耆宿 A. 蒙塔古(Ashley Montagu),他撰写了《幼态持续:新人类进化论》,论述了新人类学的可能性。由此可知,古尔德的著作堪称是一部与之前的进化思想截然不同的百科全书。

同年,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的作品《后现代建筑的语言》出版,由此掀起一股探讨后现代主义的热潮,人们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此外 J. 德里达与 J·R. 塞尔(John R. Searle)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在美国的文艺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7月 中国,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就任副主席。

1978

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的著作《东方学》出版。1935 年出生于耶路撒冷的萨义德童年大多数时间在耶路撒冷以及埃及的开罗度过,15 岁时前往美国,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之后多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他更深层次地挖掘了"我们如何才能够对异文化进行表述?所谓异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一种明确清晰的文明(人种、宗教)的概念是否有意义?"这一命题。文化这一概念在论述自己的文化时往往具有自我美化的倾向,而在论述"异文化"时却不可避免地充满敌意与攻击。换而言之,文化、宗教、人种的差异比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的范畴更为重要,正是出于这种差异,为观念提供了不言自明的真理以及权威。萨义德提出了这一系列问题,以此验证西欧的东方印象。他的分析巧妙而又明晰,极具说

服力。萨义德致力于阐明文学观念与殖民地主义之间的融合，从中不难看出他作为一名活跃在美国的、代表着巴勒斯坦国民大会的发言人，身上带着激进派知识分子的印记。1994年，他的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出版，在书中围绕海湾战争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与讨论。

同年，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的《真理和其他疑难》一书出版。1925年出生于伦敦的达米特，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师从J·L.奥斯丁，并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1973年，发表了成名作《弗雷格——语言哲学》，此后他表明了自己与以往的日常语言学派稍有不同的立场。达米特认为为了解决"存在论—反存在论"这一形而上学的对立，应该再一次细致地研究"意义理论"。因此，他强调必须重新进行G.弗雷格(Gottlob Frege)与K.哥德尔的研究工作。事实上，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国际上出现了对弗雷格进行再评价的动向，而探索哥德尔思想背景的研究书籍也陆续面世。

1979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出版。这是一部宣告后现代思想到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书籍。在此所说的"后现代的知识"，指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当然，以从D.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开始的思想系统作为研究课题并无不妥之处，但是利奥塔却更为纯粹地论及了先进科学以及先进技术最前沿的变化，并且论述了关于隐藏在"现代知识"深处的危机。为了能够理解这一稍显紧迫的论述，在它层层推进的字里行间所蕴含的作者的真实意图，有必要考虑一下

利奥塔当时的状况。这份报告是利奥塔接受加拿大魁北克省大学协商会的委托所提交的。在“序言”的末尾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希望将此份报告原封不动地献给巴黎第八大学(万森纳)哲学综合研究学院,在高等学府穷途末路的后现代时期,该学院正迎来新的起点。”值得一提的是万森纳的巴黎第八大学正是为了反映五月革命的精神而创办的一所大学。1980 年大学假期期间,校园被拆除,迁往巴黎北部的圣德尼市。法国文化教育当局强横的行为无情地践踏了五月革命的精神。在利奥塔的言论中,透露出他对学校当局向新保守主义的回归抱有极为复杂的想法。日本那些轻率浮夸的新闻工作者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虽然了解这一事实却有意识地将其忽略。因为在八十年代争相引进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解构主义的极为浮夸的大潮中,这部作品无疑是一部“万森纳的悼词”。但是当我们直面今天空无一物的“思想废墟”时,也许有必要再度翻开这一部《后现代状态》。

翌年,尤尔根·哈贝马斯被法兰克福市授予阿多诺奖,领奖之际他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的演讲。此次演讲显而易见是受到了利奥塔思想的触动,但是哈贝马斯却将着眼点放在了后现代知识的新保守主义性方面。这一点,在日本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明确地说那是因为为了实现“虚构的强国”,封杀“现代”、披上“脱现代”的伪装在当时才不失为上策。让人不由得怀念起将哈贝马斯称为“现代主义的堂吉诃德”的揶揄之声。

詹姆斯·E. 洛夫洛克(James Ephraim Lovelock)的著作《盖亚:地球生命的新视点》出版。六十年代初期参与 NASA 火星探测计划的洛夫洛克提出了盖亚假说,其中融入了他从

宇宙看到地球蓝色光芒之时的那份难以抑制的感动。“这个地球的整个生命体系、所有的生物都将成为大气、海洋以及土壤,形成一个能够使生命继续存在的巨大系统”,这一宏大的假说对环境保护运动以及生态学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文明却正在破坏盖亚(地母)的自我调节功能,由此产生的危机感随着这本书籍的面世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探讨的课题。

1月 中美建交。

2月 伊朗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Mussavi Khomeini)回国,掌握实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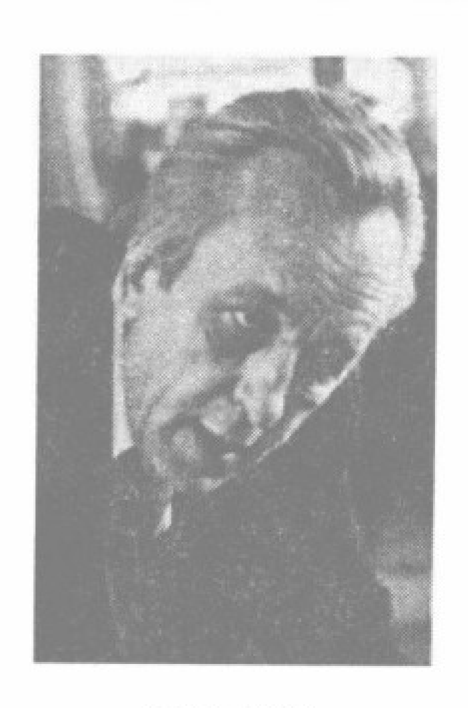
5月 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

6月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东京召开最高级会议。

12月 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0

3月15日 出席“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解散会议的路易·阿尔都塞以“被分析者的名义”,指责雅克·拉康为“极为可悲的小丑”。阿尔都塞自1948年起就患上了严重的躁郁症,不得不频繁地接受心理治疗以及化学治疗。这一年夏天,他也在巴黎接受治疗,但是病况毫无改善,于10月初回到自己家中。11月16日,阿尔都塞在家中扼死了妻子海伦娜(Hélène)。并被立即送入圣安娜精神病院。之后过着在自



阿尔都塞

己家中休养和住院治疗交替的生活，直到 1990 年 10 月 22 日去世。

埃里克·詹奇(Erich Jantsch)的《自组织的宇宙观》一书出版。詹奇 1929 年出生于维也纳，1951 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曾经在多处任职，自 1962 年起担任 OECD 理事会的科学问题顾问，1980 年去世。詹奇的成名作是一份关于技术预测的报告，从开始执笔撰写这份报告起，他就被英国胚胎学家 C·H. 沃廷顿(Conrad Hal Waddington)提出的“后生过程”的想法所吸引，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了生物学以及系统论。此外，他还非常关注 I. 普里戈金等人的非线性·非平衡的热力学耗散结构的研究。詹奇的遗作《自组织的宇宙观》不仅吸收了普里戈金的思想，还参考了 H. 哈肯(Hermann haken)的协同学理论、M. 艾根(Manfred Eigen)的超循环理论以及 H·R. 梅图拉纳(Humberto Romesín Maturana)与 F·J. 瓦雷拉(Francisco Javier Varela)的自创生系统论等各种理论，书中归纳了詹奇独特的宇宙进化论，是一部充满雄心的作品。如同詹奇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他构思这部作品的思想基础是当他投身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校园中熊熊燃起的反叛的火焰中时才获得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自我决定与自我组织化、结构的开放性与柔软性、不断进化的自由”的关注，虽然“看起来暴风雨已经平息，陈旧的结构依然得以维持”，但是既然“我们的心灵结构已经改变”，那么“世界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了”。可以说如果无视这一观点而去评论五月革命之后的思潮，那将是徒劳无益的举动。此外，梅图拉纳与瓦雷拉合著的《自创生理论——所谓的生命系统是什么》一书在这一年出版

了单行本。

9月　波兰工人讨论筹建全波独立自治工会，独立于党和政府的团结工会诞生。



1981—1995

冷战终结。德勒兹、列维纳斯辞世





1981

10 月 10 日 8 月，美国政府宣布将恢复大量生产中子弹，中子弹对于人类的杀伤力远远超过通常的核武器。当然，对此苏联表示了坚决的反对，预计将会配备中子弹的 NTAO 诸国指责美国政府“美苏是否要将战场限定在欧洲?”于是 10 月 10 日这一天，来自欧洲各地的大约三十万人聚集在西德首都波恩，举行了反战、反核武器的集会。此次事件最终发展成为 1983 年 10 月 22 日那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反核武器的运动，当天，西德各地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参加了抗议美制潘兴Ⅱ式中程导弹在西德部署的集会。

12 月 28 日 雅克·德里达参加完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知识分子团体的集会后，在返回法国的途中，到达布拉格机场时，被警察以非法携带毒品为由逮捕。由于以 F. 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为首的众多知名人士的抗议，德里达于二十四小时候后被释放。当时，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发出了戒严令，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多位“团结工会”的干部被逮捕，瓦文萨(Lech Watesa)等工会领导人被拘禁。在东西方政治状态日益紧张的局势中，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当局势必会对德里达的入境感到忧虑。德里达在之后接受采访时曾经饶有趣味地回想起此次事件，认为自己被毫无理由地逮捕与当时正在撰写的关于卡夫卡的小说《在法的门前》的评论文章有着隐秘的巧合。1983 年 10 月德里达来访日本时曾经就这篇卡夫卡论做过专题演讲。1990 年德里达终于实现了布拉格之行。

5 月 法国，密特朗成为法国第一个社会党人总统。

7 月 美国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死亡病例。

PDG

1982

波努瓦·芒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的著作《大自然的分形几何学》出版。芒德勃罗是 IBM 旗下 T·J. 沃森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这部作品的雏形《分形对象——形、机遇与维数》一书是以他 1973 年之后在法国国家学术学院任课时的讲义为基础编写的。“分形”一词是由芒德勃罗创造出来的,此词源于拉丁文 fractus,指的是“不规则的碎片形”。分形几何学是以定量且严密地思考以往的数学不能处理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纠结的”、“怪异的”、“弯曲的”不规则现象为目的的几何学。例如,海岸线复杂而不规则的形状、雪结晶的精致的形状、布朗运动般原子的不规则运动等等,都能够通过分形几何学加以探索追溯。借助计算机解析技术的进步,芒德勃罗的尝试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乱流现象分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混沌现象”之所以被认为仅仅是一种无序的、无意义的现象是由于人类还不具备可以弄清这一现象的分析工具。进入八十年代后,物理学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现状。之前只能在理论物理学范围内,运用统计力学以及概率变数来分析的领域,现在可以从全新的观点出发重新审视。

同年,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题为“生成”的诗集出版。“此处,现在,有一条纽带。还有迷茫的大海……波与涛的起伏、分歧以及反复,节奏或韵律,乱流漩涡的动态。……纽带突然中断,于任何所到之处……脆弱的,不稳定的——那纽带,特色也显现出来”。当读到诗中的这一节时,人们能够感受到在塞尔想要传达的意象中有着与芒德勃罗的“分形理论”相同的东西。

7 月—8 月 在“塞利兹堡国际文化中心”,举办了以 J·

F. 利奥塔为中心、为期十天的研讨会。研讨会上众多学者进行了演讲，其中 J · L. 南希（Jean-luc Nancy）、V. 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J. 德里达、P. 拉库 · 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利奥塔等人的论文被收入题为“该如何判断?”（原题“判断的权利”）的论文集中，并出版发行（1985年）。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这一时期，利奥塔从《判断力批判》以及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出发，深入思考了在他的作品《争论》（1983 年）、《狂热——康德的历史批判》（1986 年）中表现出来的“句与句之间的连锁问题”。当然，在塞利兹堡国际文化中心，利奥塔是如何与康德针锋相对地辩论、又是如何在后现代知识的状况下将其具体化的?众多学者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又认真的讨论。在这之前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 E. 卡西尔的著作的法译本，特别是《象征形式的哲学》一书被重新评价，可以说与这场论争不无关系。

4 月　英国与阿根廷之间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领土主权而爆发了战争。

1983

2 月 23 日　西德政府为了防止酸雨造成的森林枯死，制定了限制火力发电厂排放二氧化硫的法律条文。此后，在 3 月份的联邦议会选举中，1980 年 1 月创办的“绿党”获得了 27 个议会席位，确保了其在联邦议会中的发言权。这一场反核和环境保护运动在西德被称为“绿色选择”运动。自 1977 年起担任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哲学教授之职的G. 波默（Gernot Bohme）的著作《科学的绿色选择》1980 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

出版发行,该书生动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氛围。正如该书序论的标题——“自然科学批判与科学的绿色选择”所表现出的那样,原本对以康德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时代的哲学颇为关注的波默在这部作品中,充满热情地提出人类必须重新掌控处于失控状态的自然科学。书中收录了题为“女性与科学”的章节,显示出这场运动是一次涵盖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崭新而且涉及面极为广泛的运动。

克里斯多福·诺利斯(Christopher Norris)的著作《解构主义的转向》出版。诺利斯是英国威尔士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之前的一年他刚出版了另一部作品《解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一时期的美国,被称为解构主义批判的文学批评方法革命席卷了整个学术界。自《论文字学》一书面世后德里达以旺盛的热情投入了写作工作并且在美国各地频频进行演讲,使一度陷入停滞状态的新批评理论重新焕发出活力,由此带动了解构主义批判方法的发展。借着这股东风,这一时期以耶鲁大学的 P. 德曼(Paul de Man)、H. 米勒(J. Hillis Miller)、H. 布鲁姆(Harold Bloom)等学者为首,众多文学家的著作纷纷出版。此外也有像 J. 卡勒(Jonathan Culler)一样,接二连三出版启蒙性书籍、编撰文选的学者。当然,英国的学术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牛津大学的 T.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自他的著作《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年)出版之后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这一年他的著作《文学是什么——现代批评理论》出版,书中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梳理归纳。可以说诺利斯的两部作品也充分地显示出英国在引进、接受解构主义思想时的某些典型形态。在《解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诺利斯提出结构

主义思想中存在着超越新批评理论的可能性，详细地追溯了德里达的研究工作，强调后解构主义中尼采在思想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在《解构主义的转向》一书中，他结合了维特根斯坦以及奥斯丁、克尔凯郭尔、本雅明的作品进行了解构主义的“解读”。的确，也许时至今日解构主义的热潮已经渐渐平息，但是通过此次运动，二十世纪多种多样的批评运动与哲学相结合，向着全新的“书写”水平发展，这一点作为综合化的尝试无疑将被人们所铭记。



第一次当选议员的绿党创党党员佩特拉·凯利(Petra Kelly) 前排右起第二人。

8月 菲律宾反对党领导人贝尼尼·阿基诺(Benigno Aquino)被暗杀。

1984

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的著作《性别差异的道德

学》出版。作为六十年代充满激荡剧变的后半期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之一，女性主义理论极具代表性。通过对从德里达的“阳性中心主义”（从逻各斯中心论衍生出的概念）产生的哲学史的再解释，最初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所提出的“恢复女性权利”的要求逐渐演变为对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的研究与探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与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伊利格瑞与J.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H. 西苏（Hélène Cixous）3人同为代表法国女性主义的评论家。1956年伊利格瑞在鲁汶大学获得文学和哲学的学士学位，1962年在巴黎心理学研究所获得精神病理学执照，现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CNRS）主任研究员。1974年，她向巴黎第八大学提交了题为“窥镜，作为他者的女人”的博士论文，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性别差异的道德学》是以她1982年下半年在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大学任教时的讲义为基础创作而成的。该书将柏拉图的《飨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学》、笛卡儿的《论心灵的各种感情》、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伦理学》、梅洛·庞蒂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列维纳斯的《整体与无限》等著作作为研究素材，论述了“难以超越的性别差异究竟体现在何种方面”这一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详细地解读了梅洛·庞蒂的遗作，同时细致地分析了“交错与交织”这组难以理解的概念。正因为是潜心钻研精神分析学的女性科学家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出色的研究，这一说法本身也许同样是从无意识的男性视点出发所作的评价吧。

1月 非洲发生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干旱和饥荒。

1985

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导演的电影《浩劫》公映。SHOAH一词是希伯来语转记为拉丁语后的单词,原意为"灭绝、毁灭"、"破裂的局势、悲惨的结局"。这部长达九个半小时的纪实性影片记录了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史实,朗兹曼自1973年夏开始拍摄,耗时十年以上才得以完成。这部影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即1995年在日本全国上映,电视台也曾经播放过。现在我们称其为"纪录片",但是朗兹曼却认为这部影片并非"纪实性影片"。这部影片的画面仅仅是被采访的证人的生活空间以及证言中所提及的灭绝集中营的原址,不使用任何背景音乐,仅有证人的嗓音、沉默以及很少出现的哽咽的瞬间进入观众的耳朵,除此之外只有向着集中营一路奔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列车轰鸣声以及所有的自然界发出的声响。它并不是一部以特定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性的历史电影。当被问及它是不是一部"回忆电影",由于所有的场景都是由证人的证言构成,因此朗兹曼坚决地否决了。"代替死者诉说正是生者的唯一职责",正如他极具哲学意味的见解中所显现的,这部影片是一部"使人回忆的电影",换而言之,它是一部使人回想起曾经发生的"浩劫"的"记忆的电影"。《浩劫》一片先后在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德、英国、瑞典、比利时、瑞士的影院以及电视台播放。在波兰最初是在电视台播放,之后在电影院放映。仅在电影院放映的国家有加拿大、巴西、阿根廷、以色列,仅在电视台放映的国家包括象牙海岸共和国、荷兰、丹麦、挪威、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在日本放映的时间之所以较晚,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问题"与日本似乎关系不大,更重要的原因在

于在日本这个国家很难正视并且讨论所谓“克服过去”，而只欢迎积极地“忘却过去”。不论愿意与否，《浩劫》的画面与声音迫使日本人正视“过去”。我由衷地期待将这部电影所唤起的情感进一步思想化。

3月 苏联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着手进行改革。

1986

7月11日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时代周报》上发表题为“一种损害补偿——德国现代史记述的辩护论倾向”的论文。这篇文章成为所谓的“历史家论争”的导火索。在此篇论文中作者对 E. 诺尔特(Ernst Nolte)在 6 月 6 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刊登的文章《不愿过去的过去——写完却没有发表的演讲》以及 A. 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的题为“两个没落”的文章进行了反驳。在前一年的 5 月，美国的里根总统访问西德时，在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的陪同下参观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原址以及比特堡的二战德国士兵公墓，原本希望通过此举实现“历史的和解”这一政治目的。然而，在这个公墓中也埋葬着 48 名希姆莱的党卫军士兵，因此里根此举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舆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强烈的抗议浪潮从各个方面接踵而至，一时被视作是重大政治丑闻。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新保守主义思想倾向进入德国，将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大量虐杀视为类似于“传说或虚构故事”的“历史修正主义”也在西德被广为介绍。固然，西德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提出如此明目张胆的主张。但是，诺尔特却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问题与苏联的肃清富农以及进行大量虐杀的波尔·波特(Pol Pot)派的行为相提并论，将其称为“二十世

纪的杀戮”，从而使其相对化。而希尔格鲁伯却试图将人们的视线引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间所发生的“德国东部战线的毁灭”，大肆宣扬当时战争中“红军的残暴行为”。哈贝马斯针对这一点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历史学家论争”不仅在西德的新闻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1990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洛杉矶分校也曾经举办了以“最终解决与表象的界限”为主题的研究会议。会上聚集了 H. 怀特、C. 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D. 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与会者讨论了“大量虐杀犹太人”的问题。而电影《浩劫》与 H·J. 西贝尔伯格(Hans-Jurgen Syberberg)导演的影片《希特勒：一部来自德国的电影》(1979 年)也自然而然成为讨论的对象。

4 月 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放射能污染。

1987

10 月 16 日 维克多·法利亚斯(Victor Farias)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一书的法语版出版，C. 让贝尔(Christian Jambet)为此书写了序。法利亚斯 1940 年出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在智利的天主教大学攻读哲学和日耳曼文学，1960 年前往西德的弗莱堡大学留学，并进入到“海德格尔圈”中，自 1974 年起，他进入柏林自由大学的拉美研究所工作至今。据说法利亚斯最初打算先出版该书的德语版，却被多家出版社拒之门外，无奈只能先出版法语版。不料该书一经出版，在法国学术界围绕“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论争便甚嚣尘上，一发不可收拾。报纸上大肆登载该书的相关报道，杂志上关于

这个问题正反两方的辩论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甚至电台、电视台都播放了辩论节目。法利亚斯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德里达关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著作《论精神》一书出版，使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再度升温。利奥塔的《海德格尔与犹太人》、拉库-拉巴特的《政治的虚构——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等著作也相继出版，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海德格尔与纳粹”这一问题进行评论。甚至在该书原本无法得以出版的西德，也难以忽视在法国发生的这一场狂热的讨论，将法利亚斯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加工后的西班牙语原文译成德语，1989 年德译本的《海德格尔与纳粹》终于由德国费舍尔出版社出版，并附加了哈贝马斯的一段前言。而日译本正是以这部德译本为蓝本的。海德格尔直至去世之前，一直都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支持纳粹的态度，法利亚斯将其作为依据的 H. 奥特（Hugo Ott）的《马丁·海德格尔》一书的公开出版，使这一点成为具有充分史料证明的、严峻的历史事实。伟大的哲学家未必是一个充满人性、有气度、有高尚人格的人——没有比海德格尔这一活生生的例子更能充分证明这一论断的了。随着海德格尔与雅斯培往来的书信集以及雅思培与 H. 阿伦特来往的书信集的出版发行，海德格尔卑屈的人格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当然，这并不会贬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对于二十世纪产生的伟大意义。但是毫无疑问它将会成为思考二十世纪“哲学与政治”问题的最重要的试金石。

12 月　美苏签订《消除美苏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8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著作《傅科摆》出版。这

是他继《蔷薇之名》(又名“玫瑰的名字”,1980 年出版)之后创作的第二部推理小说,该书从正面触及了神秘主义以及秘密结社的问题,是一部风格独特的作品。在小说中圣殿骑士团的阴谋一直延续到现代,这样的情节乍看似乎荒诞无稽,但如果考虑到作者撰写《傅科摆》一书时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就能充分了解到这部小说其实与意大利的现实息息相关。1978 年意大利原总理 A. 莫罗(Aldo Moro)被绑架并杀害;1980 年博洛尼亚中央火车站遭遇恐怖炸弹袭击等一系列左翼极端恐怖组织“红色旅”所犯下的罪行;1981 年发现三名在职阁员加入共济会的秘密社团“P2”,造成福拉尼(Arnaldo Forlani)内阁引咎辞职。这一系列的事件将意大利的进步知识分子逼入困境。艾柯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开始筹划撰写这部《傅科摆》。艾柯将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以近代蔷薇十字团为代表的秘密社团的暗中活动作为“现在的问题”加以描写。在他的这种问题意识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迪迪埃 · 埃里蓬(Didier Eribon) 与克洛德 · 列维 · 斯特劳斯的对谈集《由近及远》出版。1953 年出生于法国兰斯的埃里蓬是一名记者。为新闻周刊《新观察家》撰写了大量哲学 · 社会科学方面的报道。如果读过 1989 年出版的他的著作《米歇尔 · 福柯传》,就能了解到一直以来埃里蓬致力于将思想发生的现场重新再现。他确信所谓思想即便裹着观念的外衣,也是一种栖身于思想家身体内部的念头、是生成于琐碎的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如同二十世纪那交通网络与媒体高度发达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诞生出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天才。而所谓思想无非是将满世界交错乱飞的信息进行组织化之后的网络的产物。该如何布置这张信息之网? 可以说其中存在

着思想最初的原型。《由近及远》一书，采取了对谈的形式，清晰地再现了列维·斯特劳斯人生中的各种邂逅，无疑是一部弥足珍贵的书籍。

自此以后，在思想以及文学的世界中传记这一文体的地位被重新评估。L·J. 卡尔韦(Louis-Jean Calvet)进行了一项艰巨的尝试，以他者的视线重新构建连传记都由自己书写的罗兰·巴特的一生(1990 年出版)。让·西鲍迪尤出版了关于《太凯尔》杂志的回忆录(1994 年)、P. 福来斯特(Philippe Forest)出版了《太凯尔的历史：1960 年—1982 年》(1995 年)，大体来说，这些书籍的面世说明了这个世纪绝大部分具有创造性的思想行为都已进入了“历史回想”的领域。在这样一个“历史担负着积极意味的时代”中，像埃里蓬般，于不经意间和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时刻牢记对思想发生的现场投以大量关注的视线的研究态度，难道不是极为重要的吗?

5 月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8 月　两伊(伊拉克、伊朗)战争停战。

1989

阿伦·古列维奇(Арон Я. Гуревич)的著作《同时代人眼中的中世纪欧洲》出版。1924 年在莫斯科出生的古列维奇 1947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1950 年撰写了关于中世纪初期英格兰社会史的博士论文。直至 1966 年之前，他一直任教于加里宁(旧时的特维尔)教育大学的历史系。在“批判斯大林”运动所掀起的“解冻”热潮中，古列维奇不再满足于自 1930 年代起就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以农业史为中心的中世纪历史研究，而将研究领域转向了以挪威为主要地区的中世

纪斯堪的纳维亚，从事探索中世纪人类精神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以塔图大学为据点、正如火如荼展开的苏维埃符号学派的研究活动对古列维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我们在M·M.巴赫金的著作《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庶民文化：佛朗斯瓦·拉伯雷的脉络》中所了解到的，塔图学派一方面以语言研究为出发点，一方面在共时的符号体系中把握和理解从绘画与雕刻中出现的从中世纪开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般民众的世界，排除历史学家的"近代化解释"，研究对象时代中人们的文化符号论的结构。古列维奇同样也抛弃了"精神"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之前的文化史研究中没有被充分关注的中世纪人类的文化意向以及意识习惯上。1966年，回到莫斯科参加科学院历史方法论会议的古列维奇，对于当时勃列日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政权对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毫不屈从，他的两部著作《中世纪文化的范畴》(1972年)以及《中世纪大众文化的诸问题》(1981年)相继问世。不久苏联迎来了改革时期，重返莫斯科大学的他以更旺盛的精力投入了写作工作。《同时代人眼中的中世纪欧洲》一书是能够再次自由地进行研究活动的古列维奇以中世纪宗教说教中所使用的实例为对象，利用画像以及雕刻具体说明人们与"神圣世界"以及"地狱"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著作。

1月 日本昭和天皇去世。

5月 赫尔辛基宣言，全面废除氟利昂。

11月9日 "柏林墙"倒塌。象征着"东西方冷战"的"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东方各国纷纷脱离了苏联的控制，开始探索各自的政治

PDG

体制。

1990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著作《追补的革命》出版。同年 10 月 3 日，东西德国统一。震撼了整个欧洲的中心部位的急剧变动，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之中也引起了巨大的论争。“统一德意志”这一口号唤醒了早已被德国民众忘却了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热情。从八十年代起渐渐强烈起来的、对于“过去”的思念与眷恋在“统一德意志的复活”的局势中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而哈贝马斯却依然表现出与这样的复古主义思想倾向对立的态度。其政治论文集第七卷《追补的革命》一书，收录了他自 1987 年起至 1990 年为止、对政治状况所作的发言。刊登在“柏林墙”倒塌三个月后的《时代周报》上、被收录于这部著作中的文章《德国·马克·民族主义——关于德国人的同一性》表明了他对正在急速发展的西德与东德的合并所体现的非民主性深感忧虑，是一篇充满勇气的论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哈贝马斯的此种忧虑在东德居民迫切希望归属西德的要求面前消失无踪。但是，统一所需的成本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在物质方面固然所需不菲，与原东德秘密警察的合作问题，也令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产生了动摇。在此我们又一次清晰地窥见“学术、艺术与政治”这一二十世纪的困惑。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武士们》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回忆了克里斯蒂娃初到巴黎起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经历。由于采取了小说的形式，所有登场人物的名字都做了改动，但是随着阅读的推进，读者可以逐渐辨认出主人

公——即著者本人、她的丈夫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巴特、德里达、福柯、阿尔都塞等等,那个时代众多思想家们的身影。让我们举个例子吧。欧嘉(克里斯蒂娃)来到巴黎之后不久,与布雷尔(巴特)在"蔷薇花蕾"咖啡店喝 PERRIER 矿泉水时,桑托优(索莱尔斯)也来到店中,盛赞布雷尔撰写的关于巴尔扎克的著作《邦斯舅舅》的稿件。并提议把巴尔扎克与《邦斯舅舅》这两个词拆散字母重新组合,将书名定为"C/S/Z"。一开始布雷尔觉得这个书名"唐突难解"而犹豫不决,桑托优劝说道"如果是想读你的书的人,一定会理解的",最后他接受了这个提议。很明显书中所提到的那本《C/S/Z》指的正是巴特的《S/Z》一书。只不过在现实情况中巴尔扎克的作品并非《邦斯舅舅》而是《萨拉辛》。在《武士们》一书中诸如此类的轶事俯拾皆是。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曲敬献给经历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法国思想界的武士们的安魂曲。

8月　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

10月　东西德统一。

1991

杰·大卫·伯尔特(Jay David Bolter)的著作《写作空间——电子文本时代的书写》出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之后,计算机的高性能化以及小型化急速发展。其结果引发了关于电子文本问题的探讨。加拿大的文学、社会学家 M.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曾经在他的《古腾堡银河系》(1962 年)一书中提出的利用电子工学实现媒介媒体的显著扩大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了现实,个体、交流的选项也已扩

展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伯尔特先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古典学系担任副教授以及乔治亚工业大学的教授，是一位精通计算机与古典文学的学者。为现在的计算机操作在数学方面提供严密定义的图灵机以及冯·诺伊曼型计算机的出现，为拓展古代、中世纪、近代人类文明的进程带来了划时代的无限可能性，在 1984 年出版的伯尔特的著作《图灵人》中，运用了浅显的数学解释以及周密的、文化方面的诠释论述了这一点。《写作空间》一书将这一讨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论述了电子文本的发展催生超文本的可能性。的确，论述超文本的书籍一如既往、依然是古腾堡式的书籍，这一点不得不让人感受到过渡时期特有的、充满讽刺意味的一面，但是，这部作品中展开的探讨无疑是极为认真的，展示出人类记忆法与计算机交叉参照互相协动的可能性。能将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图书馆化为现实的机器这一寓言无疑是一个颇有深意的主题。从 P. 罗西(Paolo Rossi)的著作《普遍的钥匙》(1960 年)到 J. 诺尔森(James Knowlson)的著作《英法普遍语言计划》(1975 年)，重新评价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以及 J. 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研究成果与人工智能的研究正齐头并进。从中的确让人预感到一场全新的文学表现革命即将爆发。

1 月　中东海湾战争。

6 月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

12 月　苏联解体。

1992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历史的终

结》出版。福山 1952 年出生于芝加哥，在康乃尔大学获得西方古典文学的学士学位后，又先后在耶鲁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学位、在哈佛大学取得“苏联外交与中近东问题”方面的学位，现在在华盛顿兰德研究所担任顾问之职。1989 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夏季号上刊登了论文《历史的终结》，此时正值东欧诸国犹如雪崩般纷纷解体，因此该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本书以该篇论文为基础，大约耗时两年才得以撰写完成。福山参照了 A. 科耶夫的著作《黑格尔导读》，科耶夫认为“法国革命的诸原理之所以能够完全得以实现，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各国拥有物质上极大丰富以及政治上安定的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体制”，对于科耶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下讲坛、成为 EC 官员的这一行为，福山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所谓历史的终结，不仅仅意味着大规模政治对立以及纷争的终结，也是哲学的终结”，科耶夫如是认为，福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这部著作证明了纳粹主义等极权主义的统治体制在西欧民主主义面前终将解体。过于天真地确信民主主义的所有方面都值得信赖的这部作品备受好评，让人不由得感到“历史的讽刺”。书中完全没有对于 C. 施米特魔鬼般的国家思想进行回顾。阅读此前一年在德国出版发行的尼古劳斯 · 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的著作《德国人与他们的敌人——卡尔 · 施米特、男性同盟与母权制度神话》，可以了解到黑格尔传承至施米特的思想更加令人不快。尼古劳斯出生于 1923 年，是维尔纳 · 桑巴特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师从科耶夫，参与了 EC 的工作，是一位作家。

4 月 南斯拉夫解体。内战激化。

1993

诺伯特·布鲁茨(Norbert Bolz)的著作《古腾堡银河系的终结》由费因克出版社出版。布鲁茨出生于1953年，现在在汉诺威大学担任教授之职，与F·A.克特勒(Friedrich A·Kittler)齐名，都是在德国国内积极从事写作活动并极受关注的学者。从此书的标题可以看出，这同样是一部以麦克卢汉的理论为出发点、探索超媒体社会产生的可能性的作品，但是该书却有着与伯尔特的主张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布鲁茨担任编辑的《W.本雅明的拱廊街——十九世纪的原历史》(1984年)一书中，收录了一篇他自己撰写的论文《历史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并且，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从脱魔术化世界的出发》(1989年)中，也分析了在M.韦伯的影响之下，德国所产生的左右两派的决断论思想，并将其视为大战期间时代的哲学激进主义。布鲁茨对于本雅明的研究观察视角正是在德国现代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新媒体理论》(1990年)、《混沌与模拟的世界》(1991年)、《哲学终结之后的哲学》(1991年)，在他接二连三面世的著作中，这一点并未发生改变。《古腾堡银河系的终结》一书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特地利用了一章("交流行为的神话")的篇幅对哈贝马斯进行了批判。据布鲁茨说，他阅读了哈贝马斯的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后，发现哈贝马斯根本不理解拉康以及巴塔耶的思想。只不过是将他们的思想生搬硬套到对尼采、弗洛伊德的解读中去，牵强附会地对其进行批判。坚持这种观点的布鲁茨为了思考现在的超媒体问题，一方面对本雅明未能写完的内容进行了增补，同时提出有必要认真考察"人类与机械的共生"。

9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 签订了一项关于给予巴勒斯坦有限自治的协定。

1994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著作《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由伦敦维索出版社出版。齐泽克出生于1949年,是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的教授。1988年在法国出版了关于希区柯克(Alfred Joseph Hitchcock)的论文集,齐泽克担任该论文集的主编,这是他首次受到关注。同年在法国,齐泽克的著作《最崇高的歇斯底里患者》也获得了出版。从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齐泽克一方面将大众艺术的电影、恐怖·科幻小说作为分析的着手点,同时验证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运用拉康的理论分析概念,例如在《最崇高的歇斯底里患者》一书中,他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拉康式的解读。关于前者齐泽克撰写了《斜视》(1991年)一书,而关于后者他撰写了著作《等待否定》(1993年)。总而言之,齐泽克是一位致力于将拉康"研讨会"中研究探讨的精神分析诸概念适用于艺术、哲学内部的学者。如同《快感大转移》一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书中收录了三篇关于因果性的短论以及三篇关于女性的短论。齐泽克以大卫·林奇(David Lynch)以及奥图·魏宁格为素材,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两面战略的具体尝试。这一年,维索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齐泽克题为"映射意识形态"的论文集。可以说这是新兴左翼出版社维索出版社的独家企划。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希望重新考量遭受不合理贬低的意识形态,而以摘录阿多诺的著作《袖珍道德学》作为开头的这部书籍,时至今日已经湮

没于这些出于危机意识而撰写的论文之中。其中充满了与这个纷乱世界抗争的紧张感。据说齐泽克的许多著作时至今日尚未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今后还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书籍面世？真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

1995

11月4日 吉尔·德勒兹从巴黎住处的窗户跳楼自杀。终年70岁。在德里达为德勒兹撰写的悼文中写道："思想家德勒兹首先是一位事件的思想家。也是一位经常思考（自杀）这一事件的思想家，从最初到最后，一直如此。"同时回忆起德勒兹的著作《意义的逻辑》中，作者自身提及的J. 布苏克(Joë Bousquet)的诗句"我对于死亡的嗜好是意志的挫折"。在德勒兹自己的作品《消亡》中有一节也论及了死亡。德勒兹引用了贝克特的话"人们最好向我要求难以实现之事。这正是我所期望的。除此之外，还能要求我些什么呢？"他在书中写道"他耗尽了那些可能之事，从而使自身消亡。反过来也可以说，他耗尽了在可能之事中无法实现的东西。在所有疲劳的彼岸，他终于与可能之事诀别"，并以贝克特的"为了彻底终结"一语作为结尾。但是，无论德勒兹对于死亡的省察是如何深刻，都无法改变他的自杀这一突发事件。

12月25日 埃曼纽尔·列维纳斯在巴黎去世。享年89岁。与E. 芬克(Eugen Fink, 1975年去世)、L. 朗德格雷伯(Ludwing Landgrebe, 1991年去世)一样、曾经直接接受过胡塞尔教诲的最后一位现象学家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

12月30日 德国剧作家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由于癌症去世，终年66岁。他的辞世给德国文学家带来了巨大

的冲击。米勒的老师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去世时年仅58岁,两人都可谓英年早逝。人们对米勒抱以厚望,希望他在德国统一之后能够大有作为,因此他的辞世对于德国戏剧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谨以此文代替后记

笠井市子

这一天还是到来了。1999 年 3 月 17 日傍晚六点十四分，我的丈夫笠井雅洋(矢代梓)由于身患喉癌逝世，终年 53 岁。在前一年的 2 月我们搬入了新建的住宅，仅仅过了两个多星期，他便因病入院，此后的一年，笠井一直过着反反复复入院出院、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

和笠井在一起的生活常常让我感觉到自己似乎嫁给了书本，由始至终，大量的书籍无时无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对他而言，休假日中最大的乐趣便是逛旧书店，在家中只要有空，毫无疑问他一定是在阅读，无论去何处他总是背着装满了书本的包，由于长期负重，他的右肩一直微微下斜。发生地震的时候，如果他正离家在外，打回来电话时也总是最先询问“书没问题吧?”而每逢这种时刻我的首要工作就是撬开由于变形而无法开启的书房房门，如同掏挖泥石流中的砂土般，将书本挖出搬入房间。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建造新房时，笠井的第一目标就是建造藏书室。十五坪的地下室中，从笠井还是个小学生时所购买的学习杂志到最后一次出院时让家人按照他的剪报前去购

买的、弟弟(笠井洁)新出版的书籍,超过两万册的书籍正静静等待主人归家。此外还有尚未整理、书架上堆积如山的书本,小说、漫画、音乐、美术、哲学、科学等,包罗万象,现在该如何处理它们,令我束手无策。

笠井在入院之前曾经期待早日康复回家,亲手摆放这些书籍。此外他还有一件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将这部《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的原稿加工润色,尽快出版。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能如自己计划的那样,将其修改完稿。但是,此次承蒙今村仁司先生充分酌量了笠井未能成文的思想、盛情撰写了解说文,使其能够作为《现代思想的冒险者们》系列丛书的姐妹篇顺利地付梓出版。在此请允许我代表笠井深表谢意。

家人眼中的笠井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从不生气、沉稳、乐意宽恕任何事的人。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人,他很少会持否决态度,从他嘴里很难听到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行、什么什么不好等。正如今村先生在卷头的解说中所写道的"这无疑是笠井本身的写照",从我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在这一点上"正是我丈夫笠井的生活态度的写照"。

笠井虽然是一个对事对人都不善拒绝、乐于接纳的人,但是在他的宽容大度之中却隐藏着极为坚决的意志,在他患病后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中我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在他暂时出院的十天中,别说是食物了,就连清水都几乎难以吞咽,消瘦衰弱的他卧床不起,可是他对于自己的病痛辛苦只字不提。住院期间他也曾一拔下打点滴的针头就离开医院前往兼职的大学讲课,我陪伴着他讲完课程返回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连呼吸都很困难了。即便如此他还是一直说"我可不能把课停下",实在不忍心看到他这么辛苦的我向校方说明了情况,校

方让我转告他可以不用再去上课了，这时他才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谢谢”，笠井就是这样一个人。

笠井直至临终都以顽强的意志孜孜不倦追求的事只有两件——读书与写作。在他患病后期，由于一只眼睛丧失了视力，他已经无法再读书了，笔谈用的笔成了他与文字之间唯一的联系。直至临终前，他在病床上始终牢牢地握着笔。时至今日当时他用力书写着什么的样子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不知道笠井是否想写下些什么。但是我认为正如今村先生所写道的，这部作品中“年表”的事项、它的字里行间包括空白之处，笠井所记述的文字以及未能化成文字业已消失的思想，哪怕只有一个读者能够读过，笠井也就能够心满意足了吧。

关于书库，前几天我正在读高中的大儿子的朋友在我家留宿之时，看到了地下室中的书籍后大吃一惊，当天晚上以及翌日清晨都征求我的同意“我可以进去吗”，然后兴冲冲地钻进书架之间而乐此不疲（他的目标好像是与神秘主义相关的书籍）。自己一个人进入书库、接触笠井的藏书，这件事于我而言恐怕尚需时日，但是，看到旁人欣喜地阅读书籍的样子让我不由得感到笠井似乎尚在人世，觉得由衷的喜悦。我正在考虑过一阵子拜托朋友帮忙，将书库中的藏书以及收放在另一个房间中的CD、LD进行整理、编写目录，之后对外开放，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可以使用这些书籍资料。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部《年表》出版之际，承蒙今村先生以及《现代思想的冒险者们》系列丛书的编委三岛宪一先生、鹫天清一先生、野家启一先生垂览，并对相关要点一一指正。

此外，笠井多年来的朋友作品出版社的高木君、钢琴演奏家青柳泉子女士、白水社的平田纪之先生也热情地给予了指教。各位在百忙之中还不忘关注此书的出版事项，我在此深表谢意。

如果此书在细节处仍有问题，责任当然在于笠井。此外，为了撰写这部《年表》他参考了许多文献资料。原本他打算在卷末列出参考文献的书名并表谢意，但文献清单尚未列出他已与世长辞，因此无法将这些书籍作为参考文献明确标注，对此还望多多谅解。

在笠井生前对他关照有加的各位前辈或友人、阅读过笠井文章或者著书的各位读者，以及积极推动这部《年表》出版的讲谈社编辑部的各位工作人员，让我再次由衷地向大家表示感谢，并允许我谨以此文代替后记。

1999 年　夏　笠井市子

